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2

一九六六年

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剖析..... 张其光 蒋祖缘 (2)

从《海瑞罢官》看吴晗同志宣扬

封建道德的反动性..... 林铭鈞 叶汝贤 齐 云 (12)

『海瑞罢官』
笔 谈

狡辯掩盖不了《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 杨荣国 (21)

讀吳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 朱杰勤 (23)

談海瑞与一条鞭法..... 梁方仲 (26)

从阶级斗争看海瑞..... 董家遵 (28)

海瑞是个“灰溜溜”的历史人物..... 杨 嘉 (30)

学习焦裕禄 改造世界观..... 凌 云 (36)

论改造世界观和改造思想方法的关系..... 严克柔 (39)

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重讀《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魯 阳 (45)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黄祖示 (51)

深入实践，和工农结合..... 梁 葵 (56)

在文艺理论课教学中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饒芃子 (60)

略论勤俭节约反对浪费..... 王冕农 (65)

谈谈流动资金的节约..... 赵 桓 (70)

邓望成生产队增产增收情况的分析..... 广东经济学会农村調查組 (75)

对《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必然一致吗?》的商榷..... 萧 凡 (82)

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楼 栖 (87)

评李渔的戏曲理论..... 黄海章 (92)

蹲 点
通 讯

从分配工作中体会到的一些问题..... 孙 孺 (96)

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 张 庆 (100)

动 态

广东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34)

广东哲学学会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35)

毛主席語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里，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剖析

张其光 蔣祖緣

我們同意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严肃批評，吳晗同志的《海瑞罢官》确是一株毒草，它歪曲历史，攻击现实。我們尤其同意方求同志对《海瑞罢官》的論断，它的确是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而吳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並沒有真正承认錯誤，并未触到問題的实质。他自称“誠心誠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評”，不过是一种飾詞。

我們认为，《海瑞罢官》历史剧是吳晗同志的資产階級历史观点的突出表現，这种反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貫穿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我們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坚决同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捍卫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史学領域里的“兴无灭資”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須坚决把它进行到底。

极力宣扬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反动的英雄史观

不少同志指出了吳晗同志歪曲海瑞，美化海瑞，指出他把封建統治階級的大官僚、明朝皇帝的忠臣义仆装扮成“农民的救星”，完全歪曲了海瑞的階級本质、階級地位、階級性格。这是个根本性的錯誤。吳晗同志这个錯誤是立场、观点与方法一系列的錯誤。

怎么可以把皇帝的忠臣說成农民的救星呢？把两个階級的代表人物溶为一体，只能是階級調和論、超階級論的唯心主义的虛构，而客观上是沒有也不可能存在的。吳晗同志笔下的海瑞是他心中的海瑞，而不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海瑞。

在吳晗同志笔下，海瑞十分可爱，因为他敢于罵皇帝，敢于死諫。“海瑞大罵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以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这是当时青年人对他的評價。”（吳晗：《海瑞罵皇帝》）其实这是吳晗同志对他的評價。海瑞的《治安疏》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吳晗同志看来是“为人民，罵皇帝，不怕死”，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海瑞不是为人民而是为封建王朝，他不是罵皇帝而是爱皇帝，他不是不怕死而是准备以死来博取功名。同一史料，两种看法，就有两种評價。《治安疏》的出发点在于：“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守，其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海瑞集》第二一九页）《治安疏》的直接效果就是明世宗感叹地說：“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明史》卷二百二十六）“罵”了皇帝，皇帝却說他象比干一样的忠心耿耿。海瑞死了沒有呢？沒有死。为什么沒有死？就是

給他“大罵”的那个明世宗不要他死。“亡何，肅皇帝崩，庄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李贄：《太子少保海忠介公傳》）吳晗同志打了埋伏，不采這條史料。他在好幾個地方只講海瑞在肅皇帝（世宗）死后便出獄復官，偏偏不提“遺詔”。可見，歷史唯心主義者對待史料并不如他自己所宣稱的“實事求是”^①。這決不是偶然的。歷史唯心主義者就是隨心所欲地選擇和編排他們認為“有用”的資料，而不顧客觀事實，更不問事情的本质。

說他不問事情的本质，一點不冤枉。海瑞上疏在本质上是忠君的，害民的，反動的，吳晗同志卻把它說成是為人民的好事。海瑞“罷官”，如果真是按照吳晗同志所主張的：“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識形態強加于古人”、“應該從發展的變化的觀點去理解歷史人物，而不應該拿今天的政治道德標準去評價”^②，就決不能把“鬥爭的一生”、“一生反對壞人壞事”、“一生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為民謀利”，一總強加于海瑞；就決不能想象有一個什麼“深入群眾、領導群眾、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的海瑞。”（吳晗：《論海瑞》）從發展看，海瑞罷官的後果是升官，也就是說，後來他之所以獲得“浹歲三遷，俱出特簡，海內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為主上特達之知。”（王弘誨：《海忠介公傳》）正是由於海瑞在江南“剛直不阿”地執行封建王法，才得到格外獎賞，才得到“特達之知”。海瑞因罷官而升官，到了七十三歲，“帝察公忠誠，……仍用公為右都御史。”（《海忠介公年譜》）這是效忠封建王朝的結果，事情的本质本來很顯然。但吳晗同志存心美化海瑞，就不問本质，也不“從發展的變化的觀點去理解歷史人物”。真是出爾反爾！

海瑞為何罷官？在吳晗同志看來，是由於“除霸”、“反鄉愿”，是由於“退田”、“平冤獄”、“為民謀利”。總之叫作“反對壞人壞事”吧。吳晗同志唯獨不顧海瑞本身是個忠君的封建官僚，他吃的穿的（無論怎樣“清廉”）都來自剝削農民。海瑞處處事事都要執行“王法”（吳晗同志也承認他所作所為並未超出封建統治階級所能做到的範圍），那末，這個“好官”又能做出什麼真正的好事？可見他的所謂“好官”、“好事”是沒有什麼階級界線的，而且他有意模糊階級界線，極力打破階級界線，以宣揚階級調和論、超階級論，但無奈階級界線是階級社會的客觀存在。歷史唯心主義就是這樣混淆好壞，顛倒是非。

海瑞是“好官”、“清官”？從何說起？這是封建統治階級自己製造出來的好名詞，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封建官僚內部存在着大貪小貪、大奸小奸，以至明搶與暗偷，惡霸與偽善等等之別。“清官”是封建制度的忠誠的衛道士，是地主階級專政的有力工具。所以“好官”、“清官”都不是人民的真正的語言。吳晗同志老是把“好官”、“清官”看作“人民”的鑑定。在封建統治階級精神統治下的一些農民跟着封建統治階級代言人贊頌“好官”、“清官”，得些“小恩小惠”而“有口皆碑”，並不能證明封建時代的“好官”、“清官”的真實存在。歷史唯物主義者必須揭去“好官”、“清官”的偽善面紗，還它以本來面目，暴露“好官”、“清官”的階級本质及其所作所為是執行着地主階級的階級政策，而決不允許把封建國家的代表冒充農民的“救星”。

①② 吳晗的《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問題》提出八條意見，其中第八條即“實事求是，反對浮夸”。其中第七條，如引文。

周予同先生认为吳晗就是“清官”。（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上海《文汇报》）如果詮釋为“封建时代的清官的化身或代言人”，我們也可以同意的。周先生还担心清官貪官被一律看待，那么，就連解放前的好教授坏教授也被一样看待了。这是不能混为一談的。那是形而上学的錯誤的类比。还有人认为：連海瑞这样的历史人物都不能肯定、歌頌，就沒有什么历史人物可以肯定和歌頌的了，簡直沒有什么历史研究可做了。世間本无鬼，历史唯心主义者心中都有鬼。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待历史人物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作一分为二的辯証分析，要求从历史唯心主义的歪曲中还他本来面目，要求重新研究人类全部历史。因此，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历史科学一定更加繁荣起来。真正應該肯定和歌頌的历史人物要被肯定被歌頌。但被肯定被歌頌的同时，必須指出他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許多历史人物都必須严加批判然后可以适当地肯定他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活动。我們應該大书特书的是人民群众和人民英雄。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吳晗同志却竭力抬高帝王将相的历史地位，片面夸大帝王将相的历史功績以宣扬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造时势論”。难道不应当予以严肃批判嗎？

毛主席說：“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② 我們必須遵循毛主席这一指示，着力揭露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考察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怎样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吳晗同志却一方面誣蔑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使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吳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而另一方面又不去考察某些历史人物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政策，而醉心于封建时代极少数的帝王将相的某些精神品质，美化它，吹嘘它，当作支配历史的伟大力量，要求今天的广大人民群众向他們学习。难道不应当予以严肃批判嗎？

吳晗同志美化海瑞到了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步。他所捏造的海瑞只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表現了这个历史唯心主义者对于帝王将相偶像崇拜的一种狂热。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这些帝王将相才“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吳晗：《談武則天》）沒有了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吳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所以他說的历史人物其实只是帝王将相，除了帝王将相，就沒有什么历史人物，不歌頌帝王将相，就沒有什么历史人物可以歌頌，就根本談不上评价不评价。吳晗同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特色便是英雄史观。这种货色原是很陈旧的破了产的“英雄造时势論”。在他看来，英雄豪杰之所以能造时势，就是因为他們有“伟大精神”、“崇高品质”。总之，把人神化了，把人观念化了。历史唯心主义者一方面抹杀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真正伟大作用，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推动者，是历史的主人，而另一方面总要把他們所膜拜的人物夸大到异常荒誕的地步，一定要神化了他們，观念化了他們，这样，才符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頁。

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理論”，归根到底，才符合历史唯心主义者所代表的剝削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

閹割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精神實質的“八点意見”

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有沒有階級斗争的观点。毛主席指出：“階級斗争，一些階級胜利了，一些階級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

吳晗同志正是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这里有必要把他的关于历史人物評價的“八点意見”再翻一次版。

請看他的“八点意見”：

“一、評價历史人物，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假如評價不是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那么历史人物可能会沒有一个及格，可能得到的結論是我們的祖先全是坏人，我們都是坏人的子孙。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要从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出发。历史是从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人物是从斗争中成长的。……海瑞的对于坏人坏事的斗争，况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都是例子。通过这些历史人物吸取某些有益的經驗、優良的品質，学习、提高，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也就是古为今用，使古人为今人服务。

三、应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从几千年民族共同大家庭出发来衡量历史。

四、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方面看，而不应从私人生活方面看。

五、……要根据当时当地人民的意見，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

六、要注意階級关系，但是，也要指出階級出身不是評價历史人物的根本条件，人是可变的，一个地主官僚階級出身的人很可能成为坏人，但不一定都是坏人。曹操、武則天、海瑞出身全不好。

七、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識形态强加于古人。……应该从发展的变化的观念去理解历史人物，而不应該拿今天的政治道德标准去評價。

八、实事求是，反对浮夸。……本来这人只有五、六分好，你却說有九分、十分好，以至連他做的坏事也說成好事，这就是不真实。”（摘自吳晗：《关于历史人物評價問題》，載《新建設》一九六一年一月号）

吳晗同志这“八点意見”，有的是真話，有的是假話，有的是搬用馬克思主义詞句，掩飾自己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真是五花八門，样样齐全；而归根到底，他的这“八点意見”是以“历史主义”为核心，而他的所謂“历史主义”实际上是資產階級的历史主义。他借口“历史主义”来抵制和反对对于帝王将相的批判。他借口“历史主义”来販卖他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这一名著里指出：“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給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辯証法的发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頁。

导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們向前看。”^① 所以對於历史文化遗产，“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②。而吳晗同志这“八点意見”正是閹割了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最根本的原理和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就是說，閹割掉階級斗争和階級分析的观点，閹割掉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实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

吳晗同志生怕(实在是丑詆)历史唯物主义的階級分析作出“祖先全是坏人，我們都是坏人的子孙”的“結論”！一句話，只可美化帝王将相，不准說这些“祖先”的坏話，讲坏了帝王将相，正是讲坏了“我們的祖先”，我們自己也成了“坏人的子孙”！这是什么“理論”？吳晗同志論証“我們的祖先”，便是姜太公、老将黃忠、秦始皇、隋煬帝、曹操、武則天、談迁、海瑞、况钟之类。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把过去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看成今天的劳动人民的祖先，而只有帝王将相才是“我們的祖先”。吳晗同志也讲几句“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之类的似乎目中尚有“人民”的話，但他所指的“人民利益”到底是些什么人的利益？他在“自我批評”中說：“历史上的海瑞的立场沒有錯，是我的立场錯了。”既然这样，吳晗同志的海瑞研究何曾“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他所謂“人民利益”正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何良俊說：“海剛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海瑞集》第六三三頁）看来，这个非馬克思主义的古人却比之假馬克思主义的吳晗同志，老实得多。海瑞的立场是反动的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场，“沒有錯”？这个“双关語”太妙了！吳晗同志为什么会錯摆了海瑞的階級立场呢？由于吳晗同志的立场錯了。錯在那里？为什么会錯，都沒有說。我們也不妨說，吳晗同志的立场沒有“錯”，因为他原是資產階級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因此，才会把海瑞的立场摆錯了。吳晗同志站在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立场上来研究历史，所謂“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实际上是从当时地主階級的利益出发，从地主階級的反人民的利益出发。

吳晗同志声言：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出发”。那末，他的所謂“階級斗争”是怎样的一种階級斗争呢？他在这一点意見里指出：“海瑞的对于坏人坏事的斗争，况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都是例子。”原来，他所讲的階級斗争是根本排斥了被压迫被剝削階級反对压迫剝削階級的階級斗争，而是专指統治階級的內部斗争。因此，他的所謂“历史是从斗争中发展的”，也就是从統治階級的內部斗争中发展的，他的所謂“历史人物是从斗争中成长的”，也就是从統治階級的內部斗争中成长的。吳晗同志用他这套“理論”去研究海瑞，于是海瑞的“退田”，便可以使农民“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历史不就是发展了么？而海瑞的“斗争的一生”，不就鍛炼成长为“古往今来一个真男子”了么？但是海瑞的“斗争的一生”，只是統治階級各个集团在如何维护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手段上的分歧的斗争。海瑞主张“退田”、“平冤獄”，其目的是緩和階級矛盾，消弭农民的革命斗争。而吳晗同志在这一点里談到海瑞、况钟的例子之后还繼續指出，要“通过这些历史人物吸取某些有益的经验、优良的品德，学习、提高、运用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1、700頁。

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也就是古为今用，使古人为今人服务”，不就是明明白白地起了宣扬历史上的反动統治經驗，并加以提高，作为資產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經驗么！

吳晗同志主張評價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方面看，而不应从私人生活方面看。”不对！要看对待怎么样的历史人物，不能一概而論。对帝王将相的評價，为什么不應既从政治方面看又从私生活方面看？难道两者沒有联系嗎？吳晗同志从海瑞的政治方面看也看錯了，而他也从海瑞的私人生活来歌頌他美化他嘛！吳晗同志写道：海瑞“作了多年官，过的是穷书生的日子。在淳安，有一天买了两斤肉，为他母亲过生日……罢官到京听調，穿的衣服单薄破烂……。”从这里可以看出，凡有利于美化海瑞的，即使是私生活方面的材料，他也认真用上了；但史料中有沈德符《万历野获編》載：“（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无故而縊其女，是皆异常之事。”（《海瑞集》第六四五页）吳晗同志对此却熟視无睹。

吳晗同志认为，評價历史人物要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見”，不对！历史研究是在用唯物主义原理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才成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为指导，而决不能根据什么“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見”，更何况他的所謂“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見”，就是指的官僚地主及其代言人的意見。他在《論海瑞》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对于海瑞“总的評價是当时的人民說他好，当时的大地主說他不好”；而他在文章里列举說海瑞的好話的，却是梁云龙、王宏海、何乔远、李贄、王鴻緒、汪有典、顾允誠、彭遵古、諸寿賢等官僚地主。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怎么能以官僚地主的意見作为評價历史人物的定論呢？如果这样，不就直接取消了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么？不就使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变成封建主义的資產阶级的旧史学了么？

吳晗同志所謂“要注意阶级关系”，又是个幌子。他的“但书”倒是实质所在，即：“阶级出身不是評價历史人物的根本条件，人是可变的……”。他用資產阶级的历史主义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手法，确是暴露无遗了。对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評價为什么不应该不可以把他們的阶级出身阶级地位作为評價的根本条件之一呢？他們会“变”，究竟是怎么样的“变”？改变了阶级成分、阶级地位？改变了世界观？决不容許把我們今天也反对“唯成分論”作为借口，来替帝王将相搽脂抹粉。把帝王将相的阶级本质认真揭露，从阶级斗争的关系的根本意义上来評價他們，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必須坚持的原則。毛主席說：“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① 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有阶级的烙印，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的阶级烙印必然更深，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嗎？

吳晗同志強調历史人物的可变性，实质上是追求历史的偶然性。他說：“这人和那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思想意識、行动和作用完全相同的人，以此，分析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頁。

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代替对其他人物的分析。人很复杂，不象解剖一个猪就可以了解猪的生理那样。……必须对不同历史人物作逐个的具体的研究、分析和评价。”（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追求历史的某些现象的偶然性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色。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有着偶然性，但是，偶然性包括在必然性之中，必然性是透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秘的法则的。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① 吴晗同志之所以要强调历史人物各各特殊的偶然性，就是要把历史人物从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中把它抽出来，从所谓人的本身中去得到理解，抹掉历史人物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为美化帝王将相大开方便之门。历史唯心主义者任意夸大历史现象的偶然性来否定历史的必然性，实质上是以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来反对承认历史规律客观性的决定论。任何历史唯心主义者最后必然陷入神秘主义的泥坑，正是这个道理。

吴晗同志的所谓“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所谓“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等等庄严戒律，却由他自己亵犯糟塌无遗了。“本来这人只有五、六分好，你却说有九分、十分好，以至连他做的坏事也说成好事”，这种谴责回敬给美化海瑞的吴晗同志，不是很公允吗？如果还有不够公允的地方，那就是海瑞这人是否有五、六分好，还大成问题。

说穿了，吴晗同志的所谓“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所谓“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乃是反对历史研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对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就是他在《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无的放矢地攻击说的，“不从历史的具体实际研究出发，而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实际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也正是他在《论历史人物评价》一文中所指責的，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研究历史是“片面化”、“庸俗化”。

可以看出，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实质是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稽文甫先生在《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中给胡适的思想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实验主义实际上是马哈主义的一个变种，是‘爬行的经验主义’。他口口声声讲事实讲证据，但讲来讲去只是些片面的、表面的偶然现象，全不见事物的本质和事物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他口口声声讲科学方法，却根本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而认为客观实在不可知。他口口声声讲为学问而学问，为证据而证据，而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欺骗青年的政治阴谋。”（引自一九五五年《新华月报》第三号）这番话拿来批评吴晗同志，也是非常适合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点同胡适的历史观点一脉相传。所不同者，吴晗同志口口声声讲“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出发”之类的更富欺骗性的言词罢了。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

反对史学革命，妄图复活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的亡灵

吳晗同志的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六点意見”、“八点意見”，都是针对史学革命而发的，因此，检查了他在史学上主张什么之后，还须检查他着力于反对什么，这样，问题就更为清楚。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随着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历史科学领域里也开展了深刻的学术思想革命。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的批判精神，同历史唯心主义进行了严重斗争，进一步打破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旧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逐步在史学上占领了阵地，开拓了发展历史科学的正确途径。

史学革命震撼了吳晗同志的美化帝王将相、英雄造时势的资产阶级历史观。清除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的影响又无异是对吳晗同志思想上感情上的最大冲击，使得他非常苦闷，非常恼火，于是，他急忙挺身而出，反对史学革命，大喊“糾偏”。

吳晗同志要“糾”什么“偏”呢？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知識普及問題》一文中，认为历史人物评价問題的討論，“存在两个方面的偏向”，他置身事外地輕描淡写地說：“一方面，是对历史人物的过分頌扬”；然后着力地痛責：“另一方面，是对历史人物的一概否定。有的历史书，对帝王将相，很少說他們的好話；有的甚至不敢写，怕写多了犯錯誤。在戏剧方面，也是如此。……不敢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或者不敢写个人、特别是地主阶级分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不科学的。”——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史学革命中如何替帝王将相、地主阶级分子打抱不平，为他們爭气叫冤。必須注意，吳晗同志玩弄辯証法，他装成反对两方面的偏向的样子。实际上他反对歌頌人民群众和真正的人民英雄，而自己却不只“过分頌扬”而且精心美化帝王将相。他攻击那些“不敢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地主阶级分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史书为“不科学”。

吳晗同志誣蔑地攻击“胡乱替古人作阶级鉴定”。他說：“沒有正确理解阶级分析的方法，胡乱替古人作阶级鉴定，結果，把一些地主阶级的历史人物一笔抹煞了，历史时期的帝王将相即使曾經作过好事，也因为阶级成分而不敢提到或很少提到。这种情况，不能不造成許多方面的混乱”。（吳晗：《論历史人物评价》）其实，真正造成許多混乱的倒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們沒有給帝王将相作“阶级鉴定”，簡直不把帝王将相看作封建統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却把他們看作孤立的游离于社会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之外的神物。吹捧神物大有“貢獻”，又有“优良品质”，还号召今天人們向它学习，如学习海瑞的“上疏”、“除霸”、“退田”、“平冤獄”，以至“罢官”，难道这样才不“混乱”？

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人物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員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这絕不是什么“阶级鉴定”、“唯成分論”，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客观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存在。吳晗同志借口批評“沒有正确理解阶级分析的方法”，攻击

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的观点，是非常恶毒的。

吳晗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猖狂进攻，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观爭夺史学陣地的斗争多么激烈，暴露了吳晗同志妄图复活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的亡灵的活动多么积极！

吳晗同志把希望寄托在胡适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要不然，他就不会那样使劲地“为年青的讀者”和“孩子們”来“請命”了。他說：“例如某些人对历史人物，除了农民战争的領袖以外，大部分都采取否定态度。或者虽然加以肯定，但是在結論又千篇一律地加上‘限于时代的局限性，沒有能做后来的人所做的事’云云。有的历史教科书……也很少說他們的好話，結果是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越来越少了。……千篇一律的論述，不能不使年青的讀者感到厌烦、沉闷、只好束书不讀了。”（吳晗：《論历史人物评价》）

他又說：“教材的編写人看来极力想避免对帝王将相的歌頌，以免喪失立场，結果除秦始皇而外，对象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較全盛的时代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喪失了，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了漆黑一团，灰溜溜的。这种叙述的方法，在我看来，也是不全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由于历史上的光明面写得少了，黑暗面多了一些，我曾問过孩子们的意見，他們說尽是这个坏、那个坏，要爱祖国的历史，怎样也爱不起来！”（吳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吳晗同志对史学革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階級观点階級分析的方法怀有多大积忿，他对“极力避免对帝王将相的歌頌”的教材編写人多么痛恨。

既然吳晗同志那样积极那样坚决的“为年青的讀者”和“孩子們”“請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学工作，以及青年学生們都要記住列宁这一提示：“对青年的那些假朋友提高警惕，他們正在用革命的或唯心主义的空話，用革命派和反对派間的激烈爭論是有害的和不必要的这种悲天憫人的蠢話，使青年忽視认真的革命教育……”^①

至于吳晗同志对历史教材的“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了漆黑一团”的咒罵，只能暴露资产阶级“历史家”并不“文明”，当触动到他們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时，他們就暴跳如雷，显出他們对馬克思主义是何等的深恶痛絕。

吳晗同志专为帝王将相“請命”起来了，他說：“历史就是人在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活动，把历史里面的人排除出去，就沒有历史了。……不能因为他这个人是皇帝、是国王、是宰相、是將軍，他的階級成分不好，就不承认他在历史上的貢獻；也不能因为他这个人成分很好，一无所有，貧雇农出身，可是他一輩子沒有成就，也把他写在历史上，这样历史就太多了，讀不胜讀了，也就取消了历史了。”（吳晗：《学习历史知識的几个問題》）——人們又可以清楚地看到吳晗同志对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貢獻”多么眷恋，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426頁。

而对“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的貧雇农”多么鄙視！那么多历史知識的吳晗同志，对于封建时代的貧雇农一辈子做牛做馬养活了一大批帝王将相这个事实似乎毫无所知；对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創造者这个道理也似乎一无所知！

吳晗同志十分不滿人們批判帝王将相的历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他认为：“局限性不限于古人，是任何时代人都有的，不只是我們自己有局限性，将来的人还会有，拿这个来要求，批評古人，我看并不是合于原則的。”（吳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这是迷了心窍的类比。历史上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局限性，不仅表現在历史时代的局限，更主要的是階級性的局限。如果說劳动人民有什么局限性，也就是被剝削被压迫的局限，决不能同剝削階級的局限性混为一談。至于无产階級則根本不存在什么階級的局限性。

历史上，当資產階級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制度的时候，他們的先进分子就曾經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如恩格斯所說：“他們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来，或者辯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① 資產階級尙且为了本階級的利益对封建主义进行无情批判，为什么无产階級就不應該对历史上的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批判呢？用无产階級的宇宙观，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毫不姑息地批判各种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旧传统，这是我們历史科学中极其重大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战斗任务。

历史人物是一定的經濟关系的产物，个人活动为階級关系所决定；对于剝削階級历史人物的評價，必然同剝削制度、思想學說等等相联系。因此，对于历史人物的評價特别是对帝王将相的評價，必須在批判的基础上作“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沒有彻底的批判，就談不上給予这些人物以一定的历史地位；沒有彻底的批判，就談不上向前看，而只能是向后看；沒有彻底的批判，就談不上同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的彻底决裂。

毛主席指示我們：“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 在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我們史学工作者必須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再胜利而斗争！

1966年2月10日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頁。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26—27頁。

从《海瑞罢官》看吴晗同志宣扬 封建道德的反动性

林銘鈞 叶汝賢 齐 云

关于《海瑞罢官》的大辯論开展不久，吳晗同志就先后抛出了兩篇所謂“自我批評”。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中，吳晗同志竭力掩盖自己真实的創作意图，把政治与学术截然割裂，力图証明《海瑞罢官》同政治斗争无关；同时进一步充实、論証原来的錯誤观点。以《是革命，还是继承？》为题的关于道德問題的“自我批評”，主要精神也是这样。兩篇“自我批評”的共同基調是：抗拒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錯誤的批評，进行新的挑战。

吳晗同志既然坚持錯誤并发动新的挑战，我們就接受他的挑战，繼續同他辯論，分清大是大非。很多同志已就《海瑞罢官》所宣扬的政治观、历史观进行了分析批判，我們想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分析《海瑞罢官》究竟宣扬了什么階級的道德观，宣扬这种道德观是不是他一时“糊涂”的結果，这种宣扬是为誰服务，企图达到什么政治目的。

—

《海瑞罢官》的創作意图怎样，它宣扬什么階級的思想观念，企图在现实中达到什么目的？我們认为，《海瑞罢官》的出現是现实的階級斗争在意識形态領域的反映，它是资产階級、封建残余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支毒箭，它宣扬反动的政治观、历史观和道德观，代表着一种借古非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吳晗同志拒絕这种批評，他辯解說：“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我們认为，吳晗同志的辯解、掩飾是徒劳的。吳晗同志自己申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敗所吓倒，失敗了再干的坚强意志”。“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應該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們今天学习的。”^① 吳晗同志說得很明白，他写《海瑞罢官》就是为了向讀者和观众推銷海瑞的“好品德”，而推銷这种“好品德”的目的，則是要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下面我們就先看看《海瑞罢官》是不是宣扬一种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念，然后进一步考察吳晗同志宣扬这种道德观念的目的和作用。

^① 吳晗：《海瑞罢官》（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新編历史剧，在文艺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观点不是直接的宣传出来，而是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故事情节等表现出来的。海瑞是剧本的主角，是吳晗同志心目中的英雄，是吳晗同志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精心塑造出来的。

在《海瑞罢官》中，吳晗同志把海瑞的形象塑造得非常高大非常完美。海瑞本来是封建皇朝的封疆大吏，是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实工具，吳晗同志却把他描繪成“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們的救星”，“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贊扬，……謳歌传頌”。这不是历史上的真海瑞，而是吳晗同志理想中的英雄、“大丈夫”的化身，是吳晗同志的观点、思想和情感的結晶。

一个封建統治者，为什么能够成为人民的“救星”呢？吳晗同志在剧本中告訴人們，这是因为海瑞有着与众不同的“好的品德”，“这些品质，都是我們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这些“好的品德”是什么呢？吳晗同志在剧本中借海瑞自己的一句話說出来了，海瑞在答复其妻王氏的劝阻时说：“我海瑞如顾私恩而忘国法，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就点出了海瑞的“好品德”是忠（对皇上）、孝（对慈母）、仁义（对百姓），忠孝仁义是海瑞思想、品质的核心，是他的一切行为的道德原則。

海瑞对封建皇朝、封建制度和封建統治階級的长远利益是无限忠誠的，吳晗同志在剧本的許多地方着力地宣扬了这一点。海瑞未出场时，作者就借郑愉之口宣扬他“上本直諫，忠君爱国”的罵皇帝事件。海瑞一上场，就唱出了“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的理想。在与家人爭辯后，他表示坚持“要申三尺皇家法，杀尽貪官污吏头”的做法。在升堂断案时，他又表示“今日升堂，定要整頓紀綱”。在徐阶求情和以罢官相胁时，他又慨然陈詞：“太师不必多言讲，海瑞精忠对圣皇，纵然丢官不見諒，清名千古永流芳。”毫不动摇。最后，被罢了官，他仍然是“丢烏紗心胸开朗”，“除奸賊整頓綱常”，坚决杀了徐瑛等，并表示“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紀綱”。海瑞的一切思想、行为，都是以“报圣上”、“申王法”、“整紀綱”的“忠君”观念为指导的。

海瑞不仅是忠臣，又是孝子。吳晗同志特辟“母訓”一场来表現海瑞的孝道，他对母亲的教誨，百依百順，身体力行。其母謝氏教訓他說：“讀圣贤书，行圣贤事，国法要申，民困要救，我儿只管依法秉公而行，上答圣明，下安百姓。”而海瑞的全部行为，都是貫徹这个教誨的。从这里我們也看到了忠与孝的联系，尽孝为了尽忠，尽忠就是尽孝。吳晗同志也大肆宣扬、贊美海瑞的仁义，通过海瑞本人和其他剧中人的口，竭力歌頌他的“为民作主”、“为民除害”、“除豪强平民愤”。他的仁义表現在“冤獄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的行动上。他的仁义出于“民为邦本”的思想，也是为忠君服务的。他的“为民”是因为“民已穷財已尽国脉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

忠、孝、仁义是海瑞的“好品德”的核心，其他所謂“清廉公正”、“刚直不阿”、“不畏豪强”、“百折不挠”等“大丈夫”气节，都是由此而来的。海瑞为什么有这些“好品德”

呢？剧本告訴我們，这是“讀孔孟詩书”、“希圣希賢”的結果。海瑞自己指出，“二十年寒窗下苦学文章，說孔孟讀詩书取法先王”。其母謝氏也反复強調，“想当年撫孤子夜半含悲，課詩书教忠孝非礼勿窺”，“五十年勤苦讀孔孟詩书，……古今人是榜样何必躊躇？”

通过整个剧本，吳晗同志要告訴人們，海瑞虽然是一个封建統治者，但由于他“讀孔孟书”、“希圣希賢”，具有了忠、孝、仁义等“好的品德”，因此他能够“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为民作主”，搞“退田”、“平冤獄”，反对地主豪强和封建官僚，使农民“有好日子过了”！而徐阶等霸占民田，魚肉乡民，就是因为他們沒有遵守封建道德，“装道学讀礼义宵子胸怀，……假仁义真乡愿一点不差。”吳晗同志极尽美化、宣扬以忠孝观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之能事。这不是通过艺术形象鼓吹封建道德“万能”和封建道德“万岁”嗎？这不是典型的封建道德“永恒論”嗎？

封建道德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組成部分，它适应封建經濟基础的需要产生，为巩固封建經濟基础服务。忠孝观念是封建道德中最腐朽最反动的部分，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历代封建統治者、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思想家，都极力鼓吹封建的忠孝观。他們說：“国之有忠义，犹天地之有元气也。天地非元气不运，国非忠义不立。”^①又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經》）封建統治阶级宣扬忠孝观念，是因为它在维护封建統治，巩固封建經濟基础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謂忠孝，就是要求忠于君，孝于上，不得“犯上作乱”，实质上就是要忠孝于封建制度，忠孝于封建統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因此，封建統治阶级才把它吹捧得这样高，看成是立国之本，是关系到保持封建統治的元气的大問題。吳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把忠孝宣扬得如此“重要”、“万能”，这完全是重复封建統治阶级关于忠孝观的反动的陈腐的調調。

以忠孝观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在历史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封建統治阶级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一方面，他們把封建剝削和封建統治說成是合乎道德的，天經地义的，而把反抗封建剝削和封建統治的思想、行为說成是不道德的，以封建道德作为制裁被剝削阶级的反抗的工具；另一方面，竭力宣扬封建道德，麻醉被剝削阶级的心灵，腐蝕被剝削阶级的反抗意志。在封建統治阶级的残酷剝削、愚民行为和血腥镇压中，封建道德都起了帮凶的作用。魯迅在《狂人日記》里一針見血地揭露、批判了封建道德的本质和罪恶作用：“凡事总須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②“吃人”！这就是封建道德的本质和作用。

由于封建道德的极端反动、腐朽，早在我国民主革命初期，革命者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道德”的战斗口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今天，吳晗同志却竭力美化、宣扬这种“吃人”的道德，把它叫做“好的品德”，号召人們学习忠、孝、仁义这种“好的

① 《創立精忠庙碑記》，見《岳忠武王全集》。

② 《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12頁。

品德”，要人們学习这种道德象海瑞一样去“为民作主”，“退田”，“平冤獄”，反对“豪强”、“乡官”。这到底为的是什麼？下面我們把吳晗同志的言行和现实的階級斗争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二

意識形态、特别是文艺这种意識形态，是时代的风雨表。现实的階級斗争的变动，总要反映到意識形态領域中来，而意識形态領域的斗争，也就必然成为整个階級斗争的一部分。吳晗同志在“自我批評”中竭力表白他創作《海瑞罢官》是“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政治”，是“为古而古”，就是害怕把《海瑞罢官》和階級斗争联系起来，因为把它們联系起来，就会揭露吳晗同志不可告人的隐私。为此，他在前一个“自我批評”的开始处，把他这几年写的文章排了一个時間表，力图掩盖他的創作、理論活动同政治的关系，掩盖其真实的意图。但是，意識形态的斗争是階級斗争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态的斗争同階級斗争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掩盖、抹煞的。

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①又說：“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种办法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②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不甘心死亡，一遇风吹草动，就要起来同无产階級、社会主义較量。这几年来来的现实生活完全証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些論断的正确。

在反右派斗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踏步前进时，帝国主义、現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我們的三面紅旗展开了进攻。在国际階級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国内反动階級蠢蠢欲动，也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进攻，这次进攻是由党内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首先开始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吳晗同志写出了《海瑞罵皇帝》（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說“罵皇帝，那是沒有听說过的”、“真有人罵了，却也痛快”。又說：由于“海瑞大罵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这实际上是給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鼓劲、打气。后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吳晗同志紧跟着写了《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和《海瑞的故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这些文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26—27頁。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29頁。

章中，吳晗同志搜羅了一切最動聽、最崇敬的詞句，歌頌海瑞“一生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為民謀利”；“一生反對壞人壞事”；“一生不向困難低頭，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對封建統治者和封建道德極盡頌揚、美化之能事，公開號召向封建統治者和封建道德學習。這些論調一則用於麻痹人民群众的鬥爭意志，再則用於鼓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百折不撓”地干下去。鬥爭的結果，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被徹底粉碎了，有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罷了“官”。這時，吳晗同志編了歷史劇《海瑞罷官》，对被“罷官”的人大唱“萬家生佛把香燒”的頌歌，勉勵他們“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紀綱”。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間，由於現代修正主義的破壞和連續三年嚴重自然災害的影響，我國人民遭到了暫時困難，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聯合掀起了反華高潮，國內資產階級、封建殘余勢力又以為有機可乘，他們的代言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乘機向党反扑，共同發動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進攻。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積極鼓吹什麼“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掀起了“單干風”、“翻案風”。農村封建殘余勢力也大肆進行破壞活動，大肆宣揚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他們用講忠孝、講仁義來對抗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有的地富分子極力頌揚昔日帝王將相的“愛民如子”和“崇高品德”，以此來影射和攻擊黨的領導。

在這一種階級鬥爭的形勢下，吳晗同志加序出版了《海瑞罷官》（一九六一年八月），發表了《說道德》《再說道德》《三說道德》（一九六二年五月至一九六三年八月），還發表了關於歷史研究和歷史人物評價的一系列論文。吳晗同志本來“不懂京戲”，但他堅決要“破門而出”；劇團本來要求他“幫助寫提綱”，但他怕“說不清楚”，“越寫越上勁，索性寫起戲來了”。可以說，《海瑞罷官》不僅是給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唱頌歌，而且是吳晗同志直接參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進攻的工具。《海瑞罷官》反映了吳晗同志對當時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發洩了他對社會主義現實的不滿，宣揚了他作為資產階級代表的政治主張。當我們碰到暫時經濟困難時，牛鬼蛇神到處出現，資產階級、封建殘余勢力及其代表人物按照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主觀估計，把社會主義現實看成漆黑一团，認為人民活不下去了，共產黨要垮了，無產階級政權要完蛋了。於是他們自以為是“人民”的代表，要起來“為民請命”、“為民作主”，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要求復辟資本主義。《海瑞罷官》在政治上完全與他們同一個調子。吳晗同志借海瑞之口對社會主義現實進行了惡意的詆毀，他在劇中提出了“為民作主”的口號，要求“退田”、“平反冤獄”，“行新政”，以“為民除害”、“替黎民申雪冤枉”。這與資產階級提出的政治主張本質一樣，為“單干風”、“翻案風”推波助瀾，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

可見，吳晗同志的時間表，只是弄巧成拙，它使我們更加明確地看到，吳晗同志如何隨著階級鬥爭的激化，一步緊似一步地走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最前面，這不是恰好證明吳晗同志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最積極、最忠實的工具嗎？

作為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吳晗同志為什麼以封建道德為武器？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特點和階級鬥爭形勢所決定的。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在政治上又从未独立掌握过政权，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也从未形成过自己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也从未占过统治地位。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在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时期，它曾进行过反封建的斗争，也曾反对过一下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弱点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当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道德观也就同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融合在一起，来对抗无产阶级思想及其道德观。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在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利益是共同的，因此资产阶级能够利用封建思想、道德观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就是资产阶级能够运用封建道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

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中，用什么样的道德观教育人民，是个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用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观教育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引导广大人民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清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基础，这对资产阶级的生死存亡无疑地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因此资产阶级必然要想尽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来同无产阶级抗争。就思想领域来看，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往往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用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观，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影响、腐蚀人民，诱使人民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封建思想、道德观念已形成一整套的顽固的传统力量，具有很大的腐蚀性、欺骗性，并且这种传统力量在人民中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就借用封建思想、封建道德来作为腐蚀人民的武器，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开辟道路。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两方面是相互补充的，其根本目的是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马克思指出过，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活动中，曾经借助于旧的传统来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他说：“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①。现在，历史似乎在重演，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复归。过去资产阶级是借助旧的传统来进行反封建，今天资产阶级是借助旧的传统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们可以从似乎是历史的重演中，看到资产阶级阶级利益和政治目的的狭隘性反动性，看到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的狡猾和虚伪。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从其虚伪、狡猾的形式中，揭露其反动的本质，进行彻底的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吳晗同志美化、宣揚封建道德，不僅在政治上是不動的，理論上也是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海瑞罷官》的理論基礎之一正是吳晗同志大肆宣揚的“封建道德繼承論”，這個理論是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對於這個問題，他在關於道德問題的“自我批評”中，表面上給自己戴了一些“帽子”，實際上毫無認真、深入的檢查。他輕描淡寫地把自己的“錯誤”說成是“混亂”和“認識不清”，相反，費了很多筆墨和力量強調自己“有的地方說對了”。更惡劣的是，重新論證他宣揚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都沒有錯”。因此我們必須徹底揭露和批判“封建道德繼承論”的不動性。在這裡，着重就“封建道德繼承論”歪曲共產主義道德形成的來源，用封建道德取代共產主義道德這些錯誤觀點進行分析批判。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它不僅要在經濟戰綫上進行徹底的革命，而且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進行徹底的革命，也就是要徹底消滅階級。《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因此，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批判的旗幟，徹底地同各種陳腐的思想、觀念、習慣、傳統決裂，是無產階級在為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的過程中，必然要提出的戰鬥任務。完成這個戰鬥任務，是無產階級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即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根本條件之一。

今天我們正面臨着這樣的戰鬥任務。封建道德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陳腐的思想、觀念、傳統和習慣中最不動最腐敗的觀念之一。第一、它是封建制度的集中的反映，是從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利益中直接引伸出來的，是建立在剝削、壓迫和奴役農民基礎之上的；第二、它是封建地主階級神秘主義、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社會歷史觀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第三、在封建社會中，作為封建法律的補充，它起了政治法律所不能起的毒害農民、直接維護封建剝削制度的不動作。因此，封建道德完全是糟粕，根本沒有什麼可取之處，在封建時代，站在農民的立場，就應該堅決把它打倒。到了今天，封建道德更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嚴重的障礙。社會主義革命要發展、要前進，就必須徹底消滅這種封建道德。正當我們着手掃除這些垃圾的時候，吳晗同志卻跑出來大叫不能摒棄封建道德，要全面向它學習。這不是抵制、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又是什麼呢？

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要破除舊道德，而且還要創立新道德，即共產主義道德。這兩個任務是相反相成的，破舊正是為了立新，只有破舊才能立新。毛澤東同志曾經明確地指出：“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不動作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不動作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① 封建道德是極端不動作和腐敗的，是應該加以徹底打

①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88頁。

倒和消灭的东西。不打倒、铲除封建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吴晗同志的观点根本违背毛主席这个指示。他說：“无产階級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統治階級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末，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階級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創造了。問題是在古代，无产階級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創造呢，也不大可能……”^①在他看来，剝削階級的道德观，是建立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源，我們只要钻进故紙堆，勤讀孔孟詩书，向封建統治者学习，共产主义道德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这完全是奇談怪論。

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来源呢？无产階級是怎样建立自己的道德观的呢？列宁說：“我們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利益。我們的道德是从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②就是說，无产階級的社会存在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是形成共产主义道德的源泉。吴晗同志无视經典作家的指示，硬說共产主义道德是在继承过去剝削階級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說来，封建道德观念越多的人，就越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而年青人不学习封建道德，就处在“空地上”，根本不能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这不是要用封建道德来取代共产主义道德，又是什么？

吴晗同志辯解說：“我們所說的继承，应该是批判的继承，是继承其中好的部分，决不可以认为連地主階級的剝削、压迫也继承下来。”^③

吴晗同志这个辯解难道掩盖得了他的真实企图嗎？前面我們說过，从今天无产階級階級斗争利益来看，封建道德完全是腐朽的反动的东西，根本没有好的部分。何况在吴晗同志的心目中，所有的封建道德都是好东西，我們都可以向它学习，“移用”于今天。吴晗同志說：“例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道德观念是为过去的統治階級服务的，但也可以把它改造，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④众所周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是封建道德中最根本的规范原則，是核心部分，这些规范原則正是封建地主階級用来压迫农民，维护封建剝削制度的主要工具之一。既然封建道德最腐朽、最反动的根本原則都可以继承，那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继承呢？可見吴晗同志的所謂“部分”继承是全面继承的幌子，实际上是要毫无保留地继承封建道德中最根本的东西。

吴晗同志所謂“批判的继承”也是假的、騙人的。我們从他研究的海瑞和新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样板”中，就可以明了他这种所謂“批判继承”的本质。在《論海瑞》一文中，吴晗同志是怎样“批判地继承”封建官僚海瑞的“好品质”的呢？他在对海瑞进行一番頌扬以后說：“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頌他一生反对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設想，为民謀利；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結論是：“这些品质，都是我們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在吴晗同志的笔下，一个

①③ 吴晗：《再說道德》。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8頁。

④ 《学习历史知識的几个問題》，載《新聞业务》1962年第7期。

封建官僚居然具有“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人生观，我們今天就是要学习、提倡和发扬这些封建官僚的“好品质”，在这里，阶级界线沒有了。試問：这里难道有半点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批判的气味么？这也不奇怪，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对任何一个問題都可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不管“批判的继承”也好，“部分继承”也好，在吳晗同志那里就是全面接受、肆意美化、极力頌扬。吳晗同志在他的关于道德討論的“自我批評”中說：“我的思想深处，却无论如何不肯对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名詞割爱，硬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道德品质，塞进封建时代的道德名詞里去”^①。难道只是不肯对一两个名詞割爱嗎？不，應該說在吳晗同志的思想深处，不肯对封建道德割爱，骨子里就是要以封建道德来排斥、取代共产主义道德。

共产主义道德是全新的、彻底革命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道德，就其核心來說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就其社会作用來說是为消灭剝削和压迫、为全人类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斗争服务，就其理論基础來說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試問，这样全新的、彻底革命的道德观，怎么能够从继承过去剝削阶级的道德观中建立起来？相反，共产主义道德正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在同过去一切剝削阶级的道德观的对立和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吳晗同志却相反地认为，共产主义道德只有在继承和吸取封建道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不是完全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嗎？

当然，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不是同历史上的道德观毫无批判继承的关系。但是批判继承什么，一定要从今天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过去一切剝削阶级的道德都是糟粕，无产阶级根本不能在这种垃圾堆中寻找批判继承的对象，对这些东西只能坚决、彻底、干净地清除，清除得越彻底，无产阶级前进的步伐就越快。无产阶级只能批判地继承过去一切劳动人民的美德。吳晗同志說无产阶级若不继承封建道德，就是凭空創造，这完全是一种誣蔑。

无产阶级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創造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封建残余势力的形形色色的抵抗和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认为气候适宜时，总是要发动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企图在进攻中捞到什么东西。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等待他們的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的苦果。毛泽东同志教导我們，有毒草就要鋤掉。吳晗同志既然端出《海瑞罢官》和“封建道德继承論”，并在所謂“自我批評”中进行新的挑战，我們就要通过辯論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通过辯論，进一步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和道德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識形态和共产主义道德。

^① 吳晗：《是革命，还是繼承？》。載《前綫》1966年第1期。

✧ 笔谈《海瑞罢官》问题 ✧

狡辯掩盖不了《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

杨 荣 国

文艺界、史学界、哲学界的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揭露了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进而批判了他的历史观、道德观和政治观；就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自我批评”，而文章的内容却是想用“糊涂”和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来抹掉《海瑞罢官》的真实的创作意图。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狡辩，抵赖。这叫做玩弄花招。

谁都知道，吴晗同志在躊躇满志的时候，他在《谈历史剧》、《再谈历史剧》等文章以及答《戏剧报》记者问里，大谈历史剧是“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这个时候，他何曾有半点“糊涂”？又何曾有半点“为写戏而写戏”？

就在《〈海瑞罢官〉序》里，吴晗同志还说他在“动笔之前”，就“决定了”写作的“基本原则”：“不写海瑞的一生，只写海瑞斗争生活中的一段”，以免“犯平淡”和“不

容易突出”的毛病，并以“退田”和“除霸”作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而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又再次谈到“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生怕剧情“犯平淡”和“不容易突出”的毛病，冲淡了“退田”和“冤狱重重要平反”的反社会主义的“主题思想”；特别强调丢了官也不怕，“失败了再干”，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重振旗鼓，卷土重来。用这种决不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灰溜溜的”斗士精神来刻画海瑞，歌颂海瑞，这又何曾是“为写戏而写戏”？这又何曾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吴晗同志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而决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的政治。不仅没有脱离，而且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鼻孔出气，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吴晗同志在给繁星的信里，说他写《海瑞罢官》“一直改写了七遍”，就是一定“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写历史剧“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

态度如此坚决，立场如此鲜明，目的如此明确，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可是，当人们揭露了《海瑞罢官》反映着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和不平，妄图恢复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愿望这种实质的时候，他在“自我批评”里便一反以往的腔调，硬说他“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这种无可奈何的狡辩，很足以说明他的历史剧为“活人服务”的“活人”，是见不得世面的人，是见不得阳光的人，是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的人。谜底就在这里。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首先把《论海瑞》搬了出来，然后煞有介事地说：“我的《论海瑞》……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而“《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一）我吴晗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二）《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而《海瑞罢官》又“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只能说《海瑞罢官》在学术观点上有些错误，不能说它是一株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们认为，《论海瑞》决帮不了《海瑞罢官》的忙。

如果象吴晗同志所说的，《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那末“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也应该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而决不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走向“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的道路上去。我们认为，问题恰恰在于《论海瑞》只有几句游离于文章的主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空洞词句，而文章的实质则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

的，而《海瑞罢官》则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论海瑞》一文的毒素，成了一个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吴晗同志承认了《论海瑞》与《海瑞罢官》的相互关系，但又不承认这两个作品都是反社会主义的，而后者比起前者来得更露骨，更恶毒，更阴险。所以，他越辩护，越破绽百出；越辩护，越变得语无伦次。

我们知道，现代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现代的修正主义。而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的。如果《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那就必须以明代的具体历史事实，揭示出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然而《论海瑞》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着力描写大官僚海瑞是“站在人民方面的”，“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而广大农民呢？也用不着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反抗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只要向海瑞告状，凭借他执行封建王法就“有活路了”。这种既不反对阶级调和论，反而宣扬阶级调和论的做法，恰恰是和右倾机会主义一个鼻孔出气！

我们知道，现代修正主义是从自己害怕革命到否定革命到进而不准别人革命的。而改良主义也是害怕革命和不准别人革命的。因此，这两者很有一致之处。至于《论海瑞》又恰恰是宣扬了改良，否定了革命。特别是在国家观这个根本问题上，把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渲染为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器。海瑞这个封建国家的代表成了农民的“救星”。广大农民依靠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救灾”、“丈田”这些改良主义的也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

的措施，問題也就解決了，根本用不着革命，用不着打碎旧的封建国家机器！这种极力宣扬階級調和和改良主义的主張，恰恰是右傾机会主义的主張！

我們還知道，一九五九年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大喊大叫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要砍掉人民公社，要恢复单干；而《論海瑞》的主要内容也不外乎談的是“退田”，和学习海瑞的“剛直不阿”的封建道德，狂妄地要以封建主义的道德来渗透和代替共产主义的道德，要以海瑞来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要以海瑞来代替党的领导，这明明是在支持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甚至表明：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敗下陣来了，吳晗还在为他们打气、撑腰。

我們還知道，吳晗同志在《論海瑞》一文里是把海瑞当作伯夷来歌頌的，說海瑞“象伯夷，象伊尹，象柳下惠”；而伯夷是

一个怎样的人呢？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唐朝的韓愈写过‘伯夷頌’，頌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負責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領導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頗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毛主席早就指出，唐朝的韓愈頌伯夷是頌錯了，为什么今天的吳晗同志反要把海瑞当作伯夷来歌頌？

凡此种种，都說明了《論海瑞》反对右傾机会主义是假的，是一个幌子；而給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撑腰、打气、唱贊歌，倒是名符其实。这就是《論海瑞》和《海瑞罢官》的相互关系，而《海瑞罢官》又在这个基础上深化了，发展了，使它成为一个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而这种深化和发展，只能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国际、国内階級斗争形势的一个大反复的反映。

讀吳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

朱 杰 勤

吳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里說，他的《論海瑞》是讀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的公报、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右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論、《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的《伟大的号召》的社論而后写的，目的“是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和歪曲海瑞的”。

姑勿論吳晗同志写这篇《論海瑞》是否

受上述党的各项文件所启发，但如果他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实质，就决不会把研究海瑞、学习海瑞以及表扬海瑞来反对右傾机会主义者。我們只能坚持馬列主义的真理向右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决不能把一个反动階級分子抬出来反对今天的右傾机会主义者。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挂着馬列主义，行动上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也不至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命海瑞”，吳晗同

志何必反对假冒、歪曲海瑞呢？說他們“自封为反对派”吧，作为一个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的海瑞，除了反对农民階級之外，究竟反对过誰呢？說他上疏諫过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嗎？但他聞皇帝死，“即大慟，尽呕出所飲食，隔絕于地，終夜哭不絕声”。（明史本傳）說他反对地主階級嗎？正如吳晗同志承認，“他又是为本階級長期利益”打算。說他反对大地主嗎？大地主当權派的張居正，他沒有正面反对过。吳晗同志把徐階列为海瑞反对的主要对象，但从海瑞給徐階的书札看来，海瑞对徐階恭維备至，一則說：“无不以伊、傅、周、召惟公頌者。且曰：幸有是人，今日倚賴。”再則說：“补其偏，救其弊，乘便因时，一事而为一事之計，則公可自为力，亦天下人所見为公誉也。”（均見《启閣老徐存翁》二札）奉承惟恐不及。海瑞要求徐階退田，态度上也是很温和的。徐階退田后，海瑞复了他一封信說：“近閱退田冊，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數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复徐存齋閣老》）而海瑞此舉，仍然替徐家长遠利益打算，所以他說：“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靜計也。”（《复李石麓閣老》）根据史料，极力反对徐階的不是海瑞，而是徐階的政敌高拱。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状。”“拱再出，扼阶不遺余力，郡邑有司希拱指，爭齟齬阶，尽夺其田，戍其二子。”（《明史·徐階傳》）如果認為海瑞反对徐階，就是反对大地主階級，那末，高拱反对徐階更为坚决，高拱是不是大地主階級的反对派呢？吳晗同志強調，海瑞以地主階級的“左”派，反对地主階級的右派，我們从未聞地主階級

有“左”右派之分，又未知吳晗同志以什么政治标准来划分。吳晗同志居然把海瑞封为“左派”，硬要把他拿出来反对右傾机会主义者，正如火上加油，只能助长右傾机会主义者的气焰。

我們从《論海瑞》和《海瑞罢官》两篇作品中，看不出吳晗同志捍卫社会主义，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目的和作用。相反地，只能够看见作者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立场，标榜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海瑞，抹煞階級斗争，为右傾机会主义者张目，与社会主义制度唱对台戏。吳晗同志这些文章的反社会主义本质被揭露出来了之后，便在“自我批評”中，特別声明《論海瑞》一文，是在公报、社論发表后写的，表示动机还是純洁，政治立场是穩的，不过学术立场和方法还有問題而已。其实吳晗同志通过海瑞研究对群众散播毒素、給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損害，岂止学术上的立场問題而已。

吳晗同志关于“清官”問題的看法，他在“自我批評”中坚持“还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以說明他今天对海瑞的看法还没有改变。海瑞是不是如吳晗同志所說的是“站在人民方面的”农民的“救星”呢？絕对不是。他对于来告状的人，“除发府县外，衙門前尝不絕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候月滿发驛充徒。曾有解审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脱逃，解人告称，聞此重处声也。”（《启刘石圃誠意伯》）从海瑞处理告状的事看来，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反人民的階級本质。海瑞有时口头上还談些民間疾苦的空話，但对于穷而无告，不受法律制裁的人，就加以无情的鎮压。例如他对于被官府压迫而进行反抗的矿徒，实行驅逐和鎮

压。海瑞告誡下屬說：“矿徒本县屡行晓諭，令其遣散，毋扰害地方。彼回稟狀，公称近日差使繁疊，又加軍門錢糧，苦无所出，是以盜矿取利，以应差役。据言亦可哀憫。但小人趋利，彼势寡則恬靜，彼势众，或缺油糧，或矿利微小，不免嘯呼行劫。……彼等稟狀不可輕信哀詞，遂忘防守驅逐也。”（《興革條例》）他明知矿徒为圖生計，但又建議僉兵围剿。（見《保甲法再示》）海瑞曾經为統治階級提出“平黎”的計劃。由于汉族封建統治势力与黎族封建地主互相勾結对黎族人民高度压迫和剝削，激起黎族人民的反抗。一五三九——一五四四年（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三年）的万州鷓鴣啼峒黎族那紅、那黃领导的与崖陵郎孟陈那任、陈那紅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大削弱明朝在海南的統治力量，引起統治階級的內部爭吵。海瑞认为：“琼州一府，颯颯独居海中，其地綿亘一千余里，黎岐中盤，州县簇海旋于外。譬之人，黎岐心腹，州县四肢，黎岐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将必浸淫四潰，而为四肢之患，州县无久安之理。”（《平黎疏》）主张派大兵鎮压后，开通十字路，設县所城池，以便于加强控制，并建議利用黎族封建地主为里甲长来压迫黎人。

总之，海瑞对于鎮压人民是不遺余力的，人民有违背統治階級的利益举动，他就进行血腥的鎮压，企图用鮮血来淹沒人民的革命，他在历史上基本是一个黑暗人物。

吴晗同志认为海瑞有意識地办了一些好事，如退田、除霸、修河。其实要大地主退出一点田来，不是海瑞站在农民方面去搞的，而是封建法律所规定，为和緩阶

級斗争，制止农民逃亡，增加賦稅，便于徭役征发而实行的。当时明代的賦稅徭役的确太重了，农民弃田逃亡来逃避沉重的賦稅和徭役，甚至有些中小地主也大率以田产寄托于大戶，因大戶可以利用特权逃避賦稅。以淳安县來說，海瑞指出“近日錢糧繁重，百姓多以田致累，富者多买地与山开垦成田，以避繁差，此則实享田利而州无田稅也。田地利微稅重，山地利厚稅輕。”（《僉大戶申文》）如果不根本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土地和賦稅制度，尽管把大戶兼并的田地退回給农民，农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海瑞勒令大戶退田有两种办法：第一“令乡官自行退田”；第二“許献田者贖田。”乡官自行退田，一定不能彻底清退，而且可能对农民有附帶苛刻的条件；許献田者的贖田，献田者未必有錢来贖。而逃亡在外的农民又未必有机会回来接受，他們愿意与否还是疑問，因为有一部分人不甘受土地束縛，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斗争了。所以海瑞自己承认，实行九个月后，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不见得对退得田的农民有好处。

关于吳淞江及白茆河的疏浚問題，也应该作具体分析。

我們知道，当时北方的韃靼，南方的倭寇，多次入侵，封建王朝忙于对外，而国内的农民起义，又此伏彼起，嘉靖年間，和平龙南一带，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率众占据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明朝受到倭寇的牽掣，一时还无力应付。隆庆年間，惠州藍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諸良宝，琼州李茂都领导起义，震撼明朝統治基础。在階級斗争尖銳的情况下，明朝統治階級手足无措，只有

千方百計和緩階級鬥爭。加以隆慶三年，廣大的土地面積遭受水災。海瑞指出：“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霪雨為害，霜降後水漸淌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濕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亦不生。今距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尚十有五六淹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絕望于今日矣。且災只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因此統治者不能不撥款賑濟飢民，防飢民暴動，正如海瑞所說：“飢民尚苦無處趁食，青黃不接，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又說：“今水荒之後，無從取米，飢民嗷嗷。”可見賑濟飢民是和緩階級鬥爭的一種措施，而並非統治階級對人民的關懷愛護，海瑞還進一步利用飢民雲集，利用他們處境的困難，要他們開吳淞江和白茆河才給予接濟，美其名為以工代賑。吳晗同志還說：“用的錢是海瑞從各方面張羅而來，沒有加重人民負擔。”試問開河的工銀，從何而來的？我看除從老百姓身上剝來之外，沒有其他途徑，就算統治階級拿出來，歸根到底還是從勞動人民榨取得來。我們一看海瑞開白茆河疏便

明白了。他說：“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所謂倉庫之積是歷年老百姓所納的糧，“羊毛出在羊身上”。吳晗同志為什麼說沒有加重人民的負擔呢？

吳晗同志所謂“這些好事是和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當前利益一致的。”這是完全沒有階級觀點的看法。在階級社會，基本對立的階級的關係，並不是人與人互助合作的關係，而是人對人壓迫剝削的關係，在這樣的壓迫剝削關係下，階級和階級利益是敵對的，對一個階級有利的事情，另一個階級却大為不利，封建階級的長期利益決不可能和人民當前的利益一致。如果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利益一致，就是把敵對階級合二為一，就是顛倒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關係，也就會得出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進行剝削是完全為了被剝削階級的利益之錯誤結論。吳晗同志說海瑞辦了好事與廣大人民當前利益一致，模糊了階級界線，是階級調和論。

談海瑞與一條鞭法

梁方仲

對海瑞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在這次討論中有不少文章都牽涉到他和一條鞭法的關係這一問題，我也提出一些粗淺意見，請同志們指教。

明代的一條鞭法，如果只從它的名稱出現那天起計而不管其內容實際，到了明末至少也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個歷史過程中，它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所起的

作用，在初期与后期是不相同的。从嘉靖初年开始，已有些官吏在一些地点分别试行一条鞭法了，继而不断推广于各地，到了万历中年遂成为全国的制度。尽管在施行细节上，各地不尽相同，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解决明政府的财政困难因而不得不对旧日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亦即是明统治阶级怎样去制订一套更便于榨取人民的赋役方法的问题。固然，我也不否认在改制初期也曾作出了一些比旧制较为进步的措施——例如海瑞在福建兴国县及应天十府所施行的一系列办法，在客观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也未尝不暂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个制度的封建剥削本质更是不容否认的。甚至海瑞自己也认为一条鞭法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下策”，他尝说：

“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坏而不复，惟有亟夺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下下策矣。然犹井田遗意。”可见他施行一条鞭法时本来就没有要改变当日土地占有不平均状态的企图，它只是在充分承认既成事实的条件下而制订的一种改革措施而已。吴晗同志《论海瑞》一文中却说：“一条鞭法并不是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办法”，岂不是多余的废话吗？他又说海瑞的一条鞭法“是有民主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我以为说它比旧法进步还是可以的，但“进步意义”一词已嫌不大恰当，说它有“民主意义”，就更暴露出吴晗同志的阶级观点的糊涂了。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说象明朝的况钟和海瑞等历史人物都“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

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学习的人物。”那就让我们看看海瑞在施行一条鞭法时究竟作了些什么“好事”？据吴晗同志在《论海瑞》这篇文章中列举出来的，我并加以补充，大致不外以下几个措施：1.他采取了随田间粮、随粮征役的办法，使得田多的大地主的赋役比旧日增加，从而相对地减轻了中、小地主以至一般自耕农民的负担（注意，明代佃户原来就不编入税户之中），2.实行雇役法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生产，3.没有田地的工匠户和商户不须编徭银，田赋实物课税和力役的大部分都改征银两，有利于工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4.禁止官府需索各种苛例和陋规，5.禁止“典借银谷多取利息者”，其有“倍称取利，许贫民指告以凭重治”。（见《海瑞集》第一七九页、第一八九页）好吧，就算这些都是“好事”，可是“好景不常”，不到几十年间，特别是到明末时，一条鞭法便弊端百出，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害。况且大地主徐阶也是一条鞭法推行人之一，隆庆二年由江西巡抚刘光济议订的行于本省的一条鞭法方案，明户部把它作为全国的典范公布了，此事尚在海瑞之前，而刘光济只不过是牵了徐阶“承上（嘉靖帝）意旨”的指示来办事罢了。（万恭：《洞阳子续集》卷四《仁政祠记》）关于一条鞭法在初期推行的经过，海瑞固然也起过一些作用，但是不宜过高估价的。

我以为对于海瑞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应当从他的阶级立场来作检查。海瑞一生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忠诚地服

务，这是絕无問題的。他是封建統治階級中比較有遠見的人物，為了維持封建制度的長遠利益也作出一些比當時的一般統治者對人民較為有利的事情，這點我也同意。但有些同志把他和嚴嵩等量齊觀，甚至比嚴嵩更壞，這是我不同意的。我認為還需要把海瑞的其他主要的政治活動實際及其具體效果進行深入一層的分析、檢查，才能下判斷。然而即使他比當時的官僚較勝一籌，最多也只能肯定他在當時的歷史地位，這並不意味着他是我們今天學習的榜

樣。我們今天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依照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點，對各個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才有教育意義，才可以為當前政治服務。

吳晗同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中，提出了封建統治階級中的個別分子作的“有些好事是和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當前利益一致的”，究竟這個說法在歷史上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我認為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從階級鬥爭看海瑞

董 家 遵

吳晗同志在《論海瑞》一文中說：“海瑞是站在人民方面的”，“他一生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為民謀利”，“是當時被壓抑、被欺侮、被冤屈人們的救星。”我們認為，吳晗同志對海瑞的評價是是非不分，敵我不分，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

究竟應如何評價海瑞，我以為首先要看他的階級立場。海瑞處於封建時代，出身於地主家庭，並作了封建王朝的大官，因此，他不可能成為超階級的人物，他的活動必然打上階級的烙印。他表面裝成非常公正的樣子，但這只是一種假象，如果分析他的階級立場和主要的活動，就不難看透他如何忠心地維護封建統治者和封建國家。因此，評價海瑞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看他在階級鬥爭的洪流中，何去何從？在社會矛盾激化中，採取什麼態度？他主

要的活動是為誰服務？對誰有利？

海瑞所處的時代，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激化的時代。他在《革募兵疏》中說：“臣籍琿山縣，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入官，歷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海瑞集》上冊第二三五頁）他所說“親見兩廣兵事”，“正當寇亂時節”，即指當時的農民起義而言。他是怎樣對付農民起義的呢？他主張用反革命的兩手，鎮壓革命的農民，並認為這是他獨創的貢獻。他做江西的興國知縣時，在《申軍門吳堯山便宜五事文》中的第三事說：

“南贛軍門，至今人所稱許，自上而下，必曰陽明，陽明外無稱焉。然天地間止是一箇天理人心，夷狄盜賊亦止是此天理人心，無二道也。陽明削平諸巢，一以詐術行之。濟一時之急則可，若謂其可以感化而招徠，使彼心悅誠服，恐於天理人

心不合也。竊謂陽明功則高，名則盛，大略近似管仲，比迹孫、吳，不足為本院今日道也。誠能動物，威德並行，聖賢正路，本院當別求之。隨聲附和，不求之吾心，而信之人言，不可也。”（同上，第二一一頁）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什麼叫做“威德並行”？這一點好在海瑞自己曾做了答復，他在《復總督凌洋山》的信中說：“威之也，化之也，蠶食之也。”（《海瑞集》下冊第四四七頁）也就是說，對於起義的人民，要用兩手，一手用軍事來鎮壓，一手用欺騙來感化，這樣才能把他們慢慢吃掉。這是多么毒辣的陰謀啊！同時，他在《復總督殷石汀》的信中，說得更明確，他認為對付瑯崖的各族人民的聯合起義，官方必須“殺伐撫綏，並舉不遺。”（同上，第四四八頁）這就是一手拿箭（殺伐），一手拿橄欖枝（撫綏），兩手可“並舉不遺”。海瑞在給劉帶川的信中又說：“用兵安民”，可以“並行不悖”。（同上，第四三七頁）用兵是治標，安民是固本。他的主張正是一邊鎮壓被壓迫者，一邊安慰被壓迫者。實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兩手政策，海瑞反對農民革命的立場也就非常明顯了。

海瑞還把自己的主張和王陽明對比，說他的辦法已超過王陽明，其陰險惡毒，可想而知。他認為王陽明的鎮壓農民起義（削平諸巢），做得還不夠到家，他是“詐術”，是“濟一時之急”，只能比“管仲”“孫（臆）吳（起）”，不能與海瑞相比。他自以為他提出的反革命的兩手，更有欺騙性，利用了它，才是所謂“聖賢正路”，才能使起義的人民“心悅誠服”。他一貫地，數十年如一日地推銷他的主張，他的反動的頑固性，可謂比之王陽明，有過之，無不及。

但他所自夸的超過王陽明的政治主張，其實，他是抄襲了王陽明的手法。我們知道王陽明一生中主要的活動之一，即是鎮壓農民起義。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六年至一五一八年）粵、贛、湘、閩的邊境，出現了以謝志珊、池仲容等為首的農民起義，王陽明曾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的身分，去鎮壓這時的農民起義。他以殺光的辦法，殘殺了數以萬計的農民，（《王文成全集》卷九）同時對於少數民族的起義，也主張“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海瑞所採取的也不過是王陽明的那一套，並非他的獨創，這表明用反革命兩手政策來鎮壓農民起義，是地主階級一貫所採取的政策。

海瑞特別重視保甲制度，任淳安知縣時，曾連續公布《保甲告示》和《保甲法再示》，任興國知縣時，曾陳述便宜五事，其中最後一事，即申請補助里甲的費用。（《海瑞集》上冊第二一四至二一五頁）同時，在《諭老人》中，要里長協助知縣維持封建的秩序。任應天巡撫時，制定了《督撫條約》後，又續定條約九條。其中第一條，即指出選擇里長的重要性。（同上，第二五四頁）其實，加強保甲的目的，也是對付農民的，利用保甲，企圖加強地主的武裝力量，以鎮壓農民的起義。關於這點，他在《革募兵疏》中，主張用本地居民為兵，以加強守戰的任務。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責之彼地居民保甲保長。”（同上，第二三六頁）

保甲制度，大約起於宋代。明、清兩代，也有類似的措施，海瑞把它當做法寶，大力推行。曾國藩之流，也推行過這些把戲，後來國民黨反動派利用它作為法西斯

統治的基層制度。說清楚了它的发展，可知海瑞的保甲法的階級本質了。

此外，海瑞還毫不隱諱地威吓農民說：“毋作強賊，毋毆殺人，毋从白蓮教自殞其生”。（同上，第二七六頁）

为什么農民信从了白蓮教，會自殞其生呢？原來白蓮教即白蓮社，盛行于蒙古統治下的元朝，公元一三〇八年“武宗至大元年，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元史·武宗紀》）公元一三二二年，“英宗至治二年，……禁白蓮佛事。”（《元史·英宗紀》）从此，白蓮社便成為秘密的宗教團體。這個秘密組織很受農民的歡迎，後來逐漸擴大為農民起義的組織。元末徐壽輝等的紅巾軍起義，就是利用白蓮教組織起來的。明初利用這些組織來發動起義的，也大有其人。例如：永樂七年（公元一四〇九年）陝西有金剛奴的起義，（《明成祖實錄》卷六十五）成化十一年（公元一四七五年），貴州有苗人石全州的起義。（《明史》卷三一六）到了嘉靖時，這些秘密組織活動更為活躍。李福達稱弥勒佛与郭勛相親暱，引起一場大風波。嘉靖末年（公元一五六六年），蔡伯貫的起義，

就是用白蓮教在四川組織群眾，建大唐大宝的年号，并連破了大足等七個州。後來為御史劉自強所鎮壓，劉氏“搜捕其党与數百人，悉案杀之。”（《明世宗實錄》卷五六二）海瑞在做應天巡撫時，也嚴禁白蓮教的活動，禁止白蓮教，就是預防農民的起義，因為參加白蓮教，可處以死刑，所以說會“自殞其生”。這裡海瑞不得不收起牧師的脸孔，充當劊子手的脚色了。

列寧說：“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职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职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职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痛苦和犧牲的远景……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冲淡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列寧全集》，第21卷，第208頁）而海瑞為了維持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一貫地採取了這種反革命的兩手政策，他是明代封建統治者反革命兩手政策的執行者和推動者，是狡猾而虛偽的人民的階級敵人，絕不是人民的救星，也不是“站在農民一邊的”。

海瑞是个“灰溜溜”的历史人物

杨 嘉

吳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言中，“認為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緒很消沉，沒勁頭。”他一再擔心人們對海瑞會有灰溜溜之感，于是把最後一場戲“改為公堂判斷，勁頭會大一些，也不至于灰溜溜。”

在他的另一篇《關於評價歷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見》中，也認為歷史學界對農民起義推翻統治階級談多了，是“一片打倒聲，歷史幾乎成為漆黑一團，灰溜溜的。”總之，他很怕人家把封建統治階級看成（或

写成)是灰溜溜的。他认为历史是(或者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创造的,把这些人物打倒了,历史也就变得漆黑一团了。这可不得了!于是他通过海瑞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往他脸上贴金、涂红,在“漆黑一团”的历史中豁出一块“青天”来,以“突出”(这是在序言中再三强调的)海瑞作为“左派”的好品德,好显示他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这样的一种观点,集中地反映在《海瑞罢官》这部剧作中,典型地表现了吴晗同志对于海瑞的评价,也就是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在戏剧中如何表现这些历史人物的问题。

海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灰溜溜的可悲人物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是必须首先弄清楚。因为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立场;反映在文艺作品上,也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两种不同的美学观。

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史料,对海瑞生平的一件大事来进行一些浅略的分析。第一件,是他在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曾上《治安疏》直谏皇帝,也的确骂过“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并且直接指出朱厚熜的错误甚多,其中主要的是不理朝政,专事修醮。但他的这种冒死规谏,并非与封建皇朝采取对立的态度,也没有丝毫怨恨的情绪,更绝不是想要反对或推翻这个“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熾”的封建极权统治。恰恰相反,他正是要誓死保卫封建皇朝的利益,希望明世宗能够重振朝纲,巩固大地主阶级的寡头统治,挽救衰落败亡的命运。他在疏言中一开头就表明了这种态度:“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

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其后又说:“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海瑞一贯来的忠君、崇上、尊长的封建道德观念是十分顽固的。他看到朝政腐败,国事日非,不满“大臣持禄而外为諛,小臣畏罪而面为顺”,便以一个忠臣孝子的身分,独自不諛不顺,挺身而出,其目的也只是一心一意地“昧死竭惓惓为陛下”耳,其愚忠犬顺的心情的确是异常突出和罕见的。第二件,是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迫令徐阶退田,也就是《海瑞罢官》所写到的事件。为什么海瑞当时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曾经是自己的“恩人”和“上司”的徐阶,毫不徇情念旧,非勒令退田过半不可呢?从表面上看,海瑞是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但其根本目的,是因为当时以徐阶一家为首的乡官及大地主兼并和掠夺田地太多了,民不聊生,逃亡甚众,这样下去将无可征之兵,无可收之粮,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税餉收入,也动摇了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海瑞为了确保皇朝的利益,所以才不念徐阶的私情,不顾自己的得失,胆敢搏击豪强,宁可牺牲他们一些暂时的部分的利益,也正是为了缓和隆庆皇朝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势成水火的阶级矛盾,扶延明朝的万年大业。等到乡官的部分田地已退,官粮税餉可增,(包括修水利的措施在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暂得缓和,这事件便已作罢。至于剧中描写海瑞处斩徐瑛的反霸斗争,则是硬凑上去的。第三件,是海瑞晚年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对大贪污集团头子房寰的斗争。海瑞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犹东山再起,回朝任职,主要是认为“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遇到有可以为“主上”效力报恩的机会,即使

自己已經衰老垂死，他也絕不輕易放過。房寰當時任提學御史，依恃神宗的寵信，大肆搜刮民財，這事顯然是與朱翊鈞的恣意揮霍和修建定陵有關，得到他的支持的。朝官及進士多人先後彈劾都沒有效果。海瑞便上疏萬曆皇帝，愿比古人尸諫之義，希望他厲精圖治，匡復搖搖欲墜的皇室統治。海瑞還極力主張恢復先王之法，企圖用嚴厲的法治來維繫朝綱，使免于分崩毀滅。朱翊鈞終于不得不罷免房寰，結果仍是換湯不換藥。這時海瑞也漸漸悟出一些道理來了，發覺到層層的官吏受制于上，都是替皇帝辦事的，因此最終的問題還是在于皇帝。反來反去，事屬徒然。這又有什么辦法呢？因為海瑞并不是反對這一傀儡戲的演出，而且自己還是一個積極參與演出的角色，他從中喝幾句倒采，主事人只好掉換另一傀儡上場，如此而已。海瑞也就不得不帶着這個不能解決的矛盾，抱恨而終了。

綜觀海瑞一生的這几件較為突出的大事，他的確是自始至終、堅定不移地站在忠君保皇的立場，成為封建皇朝利益的忠心耿耿的衛士，這是他一貫為官做人的準則，也是他一切言行的出發點。許多傳統戏曲如《生死牌》、《五彩輿》，甚至和他没有什么直接關係的《十奏嚴嵩》等等，都表現了海瑞所謂主持正義的精神，同時也是以一個封建制度的強有力的捍衛者出現的。他採取某些改良性的政治措施，例如丈田、均徭、行保甲、禁侵漁、興水利、議鞭條等，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根本利益，不惜對某些嚴重破壞封建法制的地主、鄉官進行抑裁，既暫時滿足了部分群眾的要求，企圖緩和階級矛

盾和消弭階級鬥爭，也穩定統治階級的危機，增加朝廷的收入。當時的大地主何良俊說：“海剛峰之意無非為民。為民，為朝廷也。”這是實話。為民，是手段；為朝廷，是目的，是最本質的一面。這些措施，有的在當時確曾起過某些為民的影響，在歷史上有過一些固本安民的作用，但總的來說，移諸今天就沒有什麼值得效法的意義，其中有的還是十分反動的。

海瑞這樣苦心孤詣的一心為了皇朝的利，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制度，畢生盡忠竭力，但遭遇卻不幸，下場也可悲。就以上述的三件大事來說，他上《治安疏》落得被囚下獄，几至喪生；他勒令鄉官退田，自己只當了九個月的欽差大臣便被罷黜，歷史上這樣的事例也并不多見；他斗朝官貪污，去叶不除根，自己也跟着郁郁而終。歷史無情，早已用事實宣判了他是一個“灰溜溜”的失敗者，吳晗同志又怎能以他一支歪筆來塗改、勾銷歷史呢！

馬克思當年寫給斐·拉薩爾的信中有一段這樣的話：“西金根和胡騰之不得不滅亡，就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革命者（對於葛茲就不能這樣說），而且完全象一八三〇年有教養的波蘭貴族一樣，一方面成為當代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事實上代表着反動階級的利。”并指出西金根這個人物是“在某種程度上作了不以他個人打算為轉移的衝突的犧牲品。”恩格斯在寫給同一作者的信中又再指出西金根這類人物的性質：“然而這裡就有着悲劇的矛盾：一方面是堅決反對解放農民的貴族，另一方面是農民，而他們兩人就站在這兩者之間。在我看來，這就構成了歷史必然的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的沖

突。”(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第一卷,第32、34、41頁)拉薩尔写的历史剧《佛朗茨·林·西金根》和吳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当然情况和內容都不同,西金根和海瑞两个人物也无从相比。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断对于我們去認識海瑞和《海瑞罢官》都极有启发和幫助。当时一方面是农民群众对极端腐敗的专制統治憤恨不滿,一方面是尽力在維護巩固这种反动統治。海瑞自以为替人民办了好事,事实上却是代表着反动階級的利益;他“反对”的正是他效忠的主上;他“攻击”的正是他拥护的制度;他竭力要挽救的又正是趋向衰亡的糜烂皇朝。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又說过:“当旧制度自身相

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是合理的时候,旧制度的历史就是悲剧性的。”海瑞不仅相信,而且正是以他毕生精力来支撑这种旧制度,以抗拒历史的发展潮流,于是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不以他个人打算为轉移的冲突的牺牲品”,成为历史上一个“灰溜溜”的悲剧人物。这是由海瑞自己的階級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了的,也是由当时的階級斗争形势和历史条件决定了的。吳晗同志违反历史的真实,凭主观愿望通过《海瑞罢官》来捏造一个假海瑞,同党唱对台戏,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也是由吳晗同志自己的階級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了的。

广东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 《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一月十八日，广东省社联邀请部分学术工作者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商承祚、王起、容庚、梁方仲、刘节、戴裔煊、董家遵、黄海章，省文史馆胡希明副馆长，华南师院教授刘昆群、萧兰瑞、陈千钧，暨南大学教授王德辉等十多人。

在座谈会上，一些同志认为：（一）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是狡辩、抵赖和自我表扬，说什么他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然而《论海瑞》不仅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还宣扬了改良主义，宣扬了封建道德。可见，《论海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个幌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撑腰、打气、唱赞歌，倒是实实在在的。（二）吴晗同志竭力掩盖《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说他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是“不清楚的”，是“糊里糊涂”。这种狡辩和抵赖是徒劳的。他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历史剧是有创作意图的，研究历史和写作历史剧都是为了“古为今用”。事实上，在《海瑞罢官》里不让海瑞“罢了官”走得“灰溜溜的”，鼓吹“失败了再干”，不正是要右倾机会主义者失败了不泄气，要它们卷土重来！（三）吴晗同志还说他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只不过学术上的立场还有些问题。如果说，吴晗同志的阶级立场站稳了，为什么他写的东西不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呢？为什么他不拥护学术革命，而反对学术革命呢？（四）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还继续宣扬阶级调和论，把农民告状也说成阶级斗争的低级形式，企图再一次证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告状来解决的，是用封建王法就可以解决的。一些同志认为，我们和吴晗同志的这场大辩论必须继续进行到底。

在座谈会上，也有一些同志对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没有花言巧语和诡辩。他政治上站稳了立场的，由于他的学术观点上还有问题，很多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影响到他的政治立场。他还认为海瑞这个历史人物是应该肯定的，是值得学习的。海瑞允许农民告状，是要给穷苦人撑腰的，只是农民告状只能到府、县，而不能越级申诉。研究明史的人知道，在那个时候，这确是很大的撑腰，因为那时老百姓要去告状很不容易。海瑞的政敌就指责他允许下告上，小民告豪强。由此可见，这是有进步意义的。要求海瑞成为无产阶级战斗英雄是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封建道德是可以继承的。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是爱国主义者，这是优良传统。不要认为岳飞、文天祥忠于宋君，我们也要弄个宋君出来。过去忠于君，现在则忠于人民。古代人好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学习。优良传统可以继承，形式的东西可以不继承，要批判继承。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在当时能讲这些话真不容易。这是不是优良传统？海瑞也是如此。当时无官不贪，而海瑞就是不贪污。这是值得表扬的。这点，我们现在看来很容易，但他是四五百年前的人。他做的事情，有些比我们现在的人做的事还好得多。当然对海瑞也要批判。

有人认为，封建道德是可以继承的，它并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拿“三纲五常”来说，“三纲”是糟粕，是要批判的；五常是可以继承的。象海瑞的“刚直不阿”、勤俭廉洁就是可以继承的。海瑞是四五百年前的人，他不贪污、不怕死，向他学习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广东哲学学会討論道德的批判继承問題

最近，广东哲学学会举行了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座谈会。会上，除了对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论海瑞》，以及他在谈道德的三篇文章中所宣扬的封建道德进行揭露和批判外，还就剥削阶级的道德能否批判继承的问题初步展开了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几种不同的意见整理如下：

一、认为剥削阶级的道德只能打倒，不能继承。理由是：第一、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一定阶级的利益中直接引伸出来，并为其服务的。封建道德作为地主阶级的行为规范，是直接地、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他们用以统治农民的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的道德则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为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服务的。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道德，各有不同的好、坏、善、恶的标准。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必须同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实行彻底的决裂，而绝不是要去继承它。第二、道德与哲学虽然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却与哲学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表现在：从它们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道德是直接地、从阶级的经济利益中引伸出来的，而哲学则是比较远离经济基础、比较曲折地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它包括自然观和社会观两个方面，因此，在古代的剥削阶级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在他们的自然观方面，有可能包含着某些科学性的东西，如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思想等等，但其社会历史观则是唯心主义的，而道德恰恰是属于社会历史观的范畴，是属于糟粕这个部分，是不能批判继承的东西。其次，从它们的作用来说，也是有区别的。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它直接地影响于人的行动，而且是作为法律和政治的补充的，从历史上来看，道德与法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忠君”，它既是封建的道德，同时又是封建的法律，不忠君就是“叛逆”了。而哲学则是通过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影响而起作用的。据此，他们认为，不能以哲学上存在的批判继承关系作为剥削阶级道德可以批判继承的论据。

二、认为在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中有着某些带民主性的东西，这些民主性的东西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他们认为，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剥削阶级在道德和哲学方面编造出某些“普遍形式”，这些“普遍形式”并不单是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它多少有着反映被剥削阶级愿望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一定民主性的。如资产阶级，当它处在封建贵族的统治之下的时候，提出了“平等”的口号，这个要求同无产阶级的要求是有共同之处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要求政治的平等；但又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只限于政治的平等，而无产阶级则进而要求经济上的平等。又如岳飞的爱国主义，忠君这个方面是要否定的，但他的不住民房，“还我河山”等等，又是要肯定的。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地去考察道德问题，那么，就可以在剥削阶级的道德中看出某些带民主性的东西。

三、认为封建道德不能批判继承，但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所提倡的某些道德则可以批判继承。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封建道德与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所提倡的道德虽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比如说，封建地主阶级当它还处在上升的时期，他们为了反对奴隶主的统治，不能不争取人民的支持，不能不向人民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物就有可能接受人民的道德的影响。象周公这个人，本来从他是剥削阶级的一员来说，是好逸恶劳的，但他为了争取人民支持他推翻奴隶主的统治，他却告诉他的后代要知“稼穡之艰”。这是由于受了劳动人民的道德影响的结果，而不能把它说成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我们批判地继承这些东西，也还是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而不是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

四、认为封建道德是不能批判继承的，但其中的一些思想资料却可以考虑批判的吸收下来，如我们引用的一些封建思想家的言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学习焦裕禄 改造世界观

凌 云

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誦讀了焦裕祿同志的光輝事迹，心中無比地激動。焦裕祿同志是我們黨的好黨員，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毛主席的好學生，我們時代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他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典範，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解決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問題的典範。他在帶領蘭考三十六萬人民與嚴重自然災害作鬥爭中，表現出來的無產階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極大地鼓舞着我們，我們一定要學習焦裕祿同志，以他為榜樣，從他的光輝事迹中汲取巨大的力量，在知識分子革命化的道路上加速前進。

學習焦裕祿同志，對我們知識分子來說，最根本的就是要學習他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持興無滅資的鬥爭，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世界觀。

焦裕祿同志真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自己，樹立起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的 world 觀，他的一言一行無不閃耀着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光輝。他心裡裝着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他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人民，一心為革命，對黨無限忠誠，對人民鞠躬盡瘁，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蘭考的群眾，交給了蘭考的鬥爭，他把一切艱難困苦、生死病痛完全置之度外，堅持工作，“不達目的，死不瞑目”。焦裕祿同志不愧為毛主席所說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以焦裕祿同志為鏡子，對照檢查我們自己，首先就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心裡裝着什麼？看來，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區別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最鮮明的標志。焦裕祿同志和一切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們心裡裝的只有人民兩個字，只有革命兩個字。他們的胸懷如此寬廣，唯獨容納不下一個“我”字。而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與此完全相反，他們心裡充滿了私心雜念，歸根到底是離不開“個人”兩個字，或者說一個“我”字。心裡充塞着“我”字的人，什麼人民的利益，什麼革命的利益，在他的心裡當然是沒有位置的。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世界觀，在我們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為名為利的思想。這是有它的社會歷史根源的。大家知道，我們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來自舊社會，解放前受的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教育，個人主義思想根深蒂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

他們“十年寒窗”，为的是能够“金榜题名”，他們讀書，为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資產階級是資本的化身，它一心一意就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潤，在劳动人民的白骨残骸上建立自己的“金字塔”。“人不为己，天誅地灭”，“人对人是豺狼”，这就是資產階級的信条。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虽然不直接掌握生产資料，不对劳动人民直接进行剝削，但絕大多数受雇于資產階級，而为其服务，成为資產階級剝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抹去了所有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上面的神圣光采。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詩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依附資產階級而生存的，他們只有服从資本家榨取利潤的意志，才有可能活下去，才有可能过資產階級式的生活。因而他們在政治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而其思想意識也浸透了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它表現在狂热地追求名利地位，以取得資產階級的嘉奖和賞識，从資產階級那里多分得一些残湯剩飯。这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階級烙印的最根本之点。

要克服个人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个人主义，是旧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旧社会的經濟基础虽已被摧毁，而要彻底肃清旧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却要經過好几代人的斗争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无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人的思想里，只要有階級存在，意識形态的階級斗争也就不会完結，国际国内的資產階級总是要散播其思想影响的，他們总是要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来毒害人民，为实现和平演变准备条件的。这就是个人主义存在的社会条件。从我們本身的情况来看，十多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大多数知識分子在改造思想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进步。但是由于个人主义是根深蒂固地存在头脑中的一种頑症，在这个时期、这个問題上克服了，又会在那个时期、那个問題上发作出来，非經過长期的頑强的斗争，是不可能彻底克服的。我們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虽然一般地了解到个人主义的危害性，但是在行动上却还没有与它完全决裂的勇气。有的人甚至还是相当爱好这种“低級趣味”的。有的人还企图化臭为香，化腐朽为神奇，用各种“美丽”的招牌，来裝飾个人主义。最近，在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辯論中，在我們知識分子队伍中，不是还有人提出什么“有技术，才有发言权”，“有技术，才有实力地位”等等的論調嗎？这些不就是把业务技术知識当做猎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本钱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嗎？

和焦裕祿同志的光輝事迹相对比，我們痛切地感到，我們中的許多人在革命化道路上前进步伐之所以迟緩甚至停滯不前，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受到名缰利鎖的羈絆，沒有做到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

这是因为，有个人主义的人，是不可能象焦裕祿同志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在其未和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結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如果把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当作个人的“資本”，作为图名图利的手段，而不是把它当作为

人民服务的手段，那末，必然就只会对他认为有利的事才干，不利的事就不干，小利的事不大干，而把人民的利益抛諸脑后，这和党和人民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我們一定不能在文化科学上搞任何“私有财产”，而要做文化科学战綫上的无产階級战士。只有做文化科学战綫上的无产階級战士，才能象焦裕祿同志那样，勇于挑重担子，才能象焦裕祿同志那样，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紧密地結合起来，坚持革命实践，不“吃別人嚼过的馍”，走自己的路，做文化科学战綫上的闖将。許多事例說明，只有清除个人主义杂念，才能使自己坚定和聰明起来，敢拼敢闖，敢于胜利，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

現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一步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正处在新的高潮时期，国际階級斗争的形势正在胜利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我們彻底抛弃个人主义，树立无产階級世界观，既当国内的彻底革命派，又当国际的彻底革命派。这是历史赋予我們中国人民的光荣責任，我們一定要学习焦裕祿同志，把自己的有限的一生貢獻給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

学习焦裕祿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那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思想改造上狠下功夫。思想改造是兴无灭資的过程，不破不立，只有破資产階級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做到不为名，不为利，才能立无产階級集体主义思想，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

在思想改造上狠下功夫，我們就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敢于正視矛盾，正視缺点，而不能諱疾忌医，掩盖矛盾，掩盖缺点。我們要敢于把思想上的包袱亮出来，把那些发臭的个人主义名利地位思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用毛泽东思想把它冲洗干淨。我們要有人民解放軍敢于“刺刀見紅”的勇气，向自己的思想最痛处开刀。毛主席說：“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难过，难道我們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錯誤不能抛弃嗎？”（《論联合政府》）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焦裕祿同志的光輝形象面前，重溫毛主席的教导，我們感到必須痛下决心，与資产階級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最彻底的决裂，做一个又紅又专的无产階級知識分子。

論改造世界觀和改造思想方法的关系

严克柔

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問題和做好工作，这已日益成为我們知識分子的迫切要求和热烈行动。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指針，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世界革命、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旗帜，同时也是每一个革命者进行自我改造的强大思想武器。我們必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我們每一个知識分子，要想真正成为一個革命者，要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真正發揮自己的积极作用，首先必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破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唯物辯証法的思想方法。現在，已經有愈来愈多的知識分子体会到这个真理，从而积极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地改造思想了。但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認識不一致的問題。其中，对于改造世界观和改造思想方法的关系問題，就有不同的看法：是改造世界观为主，还是改造思想方法为主；是先掌握世界观，还是先掌握方法論；理論和实践对于改造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各有何种重要的作用，等等。这些問題，决不只是学习的方法問題，从根本上說，它是学习的指导思想問題，因而有探討的必要。笔者想就这一問題发表一些粗淺的意見。

一

我們知道，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存在着辯証統一的关系，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旧的世界观和旧的思想方法，都是我們在把自己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前进过程中的絆脚石，两者都要搬掉，两者都要改造，不可以只改造世界观而不改造思想方法，更不可以只改造思想方法而不改造世界观。但是，在改造两者的过程中，那一个是重点呢？

有人說，就大多数的知識分子而言，改造的重点不是世界观的問題，而是思想方法的問題，不是革命不革命的問題，而是如何革命的問題，当急之务是解决方法問題，是改造思想方法、提高認識能力的問題。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錯誤的，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是十分有害的。与这种看法相

反，我們认为，对大多数知識分子來說，世界观的改造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在目前形势下，改造世界观更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大家知道，我們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来自旧社会，許多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受封建主义、資本主义思想的毒害很深，大部分人的世界观是資產階級的。解放后，許多人虽然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絕不能說改造世界观的問題已經解决了。改造世界观，树无产階級世界观，破資產階級世界观，对知識分子來說，是一个脱胎換骨的过程，必須經過在革命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长期地与工农兵相結合的过程才能实现。从我們大多数知識分子的現状来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还是很不够的，与工农兵比較起来，差距很大；而深入革命斗争实践，与工农兵相結合，許多人根本沒有做到或做得很差。許多人的思想深处仍然还是一个“資產階級的王国”。这样，我們怎么能說，已經不需要着重地去解决世界观改造的問題呢？就拿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他們也还会受到社会上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和侵蚀，也就要不断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否則就不能真正成长为新型的无产階級知識分子。

資產階級世界观，是和社会主义經濟基础根本对立的。不解决世界观的問題，也就沒有真正解决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革命的問題。因为資產階級世界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不彻底清除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让它保留在灵魂深处，它就会象毒菌一样滋长着，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会恶性发展起来使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观的人，是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它在革命順利时鬧个人名利地位，而在革命遭到困难或挫折时发生动摇，以至叛变革命事业。因此，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需要，以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乃是知識分子的严重的任务。

毛主席說：“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因此改造世界观的斗争，不仅是对于我們知識分子來說是一个根本問題，而且它本身也是我国社会階級斗争的一个根本問題。社会主义革命愈是深入发展，思想战綫的斗争愈是深入发展，也就要愈接触到这个根本問題，从而把世界观問題提到斗争的首位。我們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无产階級世界观，才能辨别、抵制和清除各种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其次，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建設高潮正在到来。任何一个革命者，只有掌握无产階級世界观，大破个人主义，培养旺盛的革命精神，充沛的革命干劲，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工作中才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完成党和人民交給我們的任务。再次，改造世界观問題，还是关系到国际上階級斗争的大事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人民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現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全世界正在經歷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組的过程，这反映在意

識形态方面，也必然是思想的大分化、大改組。国际上反动的資產階級正在用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腐蝕革命人民，因此，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必須更自覺地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侵蝕。從上面所說的看來，改造世界觀問題是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了。我們知識分子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更自覺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可見，在当前的革命形勢下，任何一個人，都不但不能忽視對世界觀的改造，而且需要更自覺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這是時代的要求。所以，拋棄資產階級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乃是“當急之務”，就是十分清楚的事情了。

有的人把世界觀和政治態度混淆起來，以為在政治態度上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世界觀的改造就算是差不多了，從而忽視改造世界觀的重要性，要知道解決了政治態度的問題，並不等於解決了世界觀的問題，就我們大多數的知識分子而言，基本上是解決了政治態度問題而沒有解決世界觀的問題的。以為世界觀改造得差不多了，就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急之務是解決思想方法的問題了。

然而即使就解決思想方法問題而言，由於不懂得改造世界觀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割裂改造思想方法的重要內容。因為世界觀是統率方法論的。有些人所謂改造思想方法，也只是著眼於吸取一些具體的知識和具體的方法，而不是著眼於掌握一種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唯物辯證法。有的人學習毛主席著作，就是企圖從中增長知識，學習具體的工作方法。這當然談不上思想方法的改造。

我們認為，改造思想方法，就是樹無產階級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破資產階級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歸根結底來說，這仍然是兩種世界觀的鬥爭。一個忽視世界觀改造的人，怎麼可能了解和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呢？

二

有人說，我們並不輕視改造世界觀的意義，但是世界觀畢竟是比較抽象的，而方法論是比較具體的，為了對付工作，首先要掌握方法論，這樣對於改造世界觀也可以有一個正確的方法，同時，通過學習方法論，還可以對改造世界觀起潛移默化的作用。這種看法對不對呢？我認為也是不對的。

我們知道，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論。所謂世界觀，就是人們對世界、對社會、對一切事物总的看法。而對於世界上的主要問題又有各種各樣的觀點。拿這種觀點轉過來去認識和解決世界的問題，這就是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又是無產階級的方法論。我們常常說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立場、觀點就是指的世界觀，方法就是指的方法論。而立場、觀點是決定方法的。辯證唯物主義既具有科學性，又具有階級性，它把立場和觀點結合在一起，具有無產階級的立場才能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而辯證唯物主義又是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的。觀點和方法又是結合在一起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集體觀點、群眾觀點、革命觀點等等，都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拿這種觀點去認識和解

决問題，就要有階級分析的方法、群众路綫的方法、調查研究的方法、集体領導的方法、蹲点劳动的方法，等等，这就是无产階級的方法論。这与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論是根本对立的。

所以，要首先解决世界观問題，然后才能解决方法論的問題，否則，本末倒置，抓不到根本性的东西，是无法解决問題的。我們要解决方法論的問題，就是要破形而上学的主观性、絕對性、片面性、表面性，树立唯物辯証法，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也只有具有无产階級立场、观点才能办得到的。

没有无产階級的立场和观点，而只有資產階級的立场和观点，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主观性、片面性、絕對性、表面性的錯誤。用資產階級的立场和观点看問題，就必然輕視群众、輕視劳动、輕視实践，对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不感兴趣，和广大劳动群众格格不入。这样，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群众，就得不到正确的認識，因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正确認識的来源。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群众，認識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認識不到客观事物发展的規律，不能从实际出发，而只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去看問題，只能把感想当成实际，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整体，树木当成森林。形而上学和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唯我主义的世界观是結着不解之緣的，如果不打倒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唯我主义的世界观，是不可能破除形而上学的鬼魂的糾纏的。

有些人即使能够接触实际，也能听到群众的意見，但是如果他具有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也就不能无阻碍地認識客观規律，也沒有胆量去承认真理和拥护真理。只有毫无个人主义的杂念，才能够对客观事物作出辯証唯物主义的分析。辯証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无緣的。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常为个人利益而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彷徨动摇，自觉或不自觉地抹煞、掩蔽和歪曲真理。

只有先改造世界观，才能学好方法論，只有在思想意識修养上成为一个无产階級的战士，才能真正地学会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在毛主席的著作中，世界观和方法論是結合在一起的，不仅鮮明地表现出无产階級的革命立场和观点，而且閃耀着唯物辯証法的革命光輝。但是，无产階級的立场和无产階級的世界观，是統率着方法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果不首先領会和学习毛主席的最坚定的无产階級立场和最彻底的无产階級的革命精神，以及在任何强大敌人、任何艰巨的困难面前毫不动摇的革命意志；如果不首先学习毛主席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不能領会和学习毛主席如何从无产階級的立场出发，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問題和解决問題，領会和学习毛主席是怎样敢于正視和揭露客观事物中实际存在着的各种矛盾运动，并且善于制定正确的政策、路綫、战略、策略和运用最灵活、最巧妙的斗争艺术，来发动、組織和指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来促进矛盾的解决，促进事物的发展和变革。如果我們撇开了貫串在毛主席著作中的无产階級的立场和观点，而着眼于方法論的学习，那是不可能理解著作的精

神和实质的，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也不会学到手。可以說，这种先学方法論，后学世界观的主张，实际上也是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作是猎取知識的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先专后紅”或“只专不紅”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反映。至于說什么通过学习方法論可以对改造世界观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也是不对的。改造世界观是一种兴无灭資的阶级斗争，不打不倒，不破不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是要打才能倒的，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只有破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树立起来。“潜移默化論”不过是逃避思想斗争的一个借口罢了，这种看法对改造世界观是非常有害的。

当然，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紧紧地結合在一起的，改造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是，根本問題在于改造世界观，这是絕對不能动摇的。

三

有的人說，要改造世界观，只要通过实践鍛炼就行，用不着学习理論；而改造思想方法，掌握唯物辯証法，就非得讀書不可。

我认为，这种把理論学习和实践鍛炼截然分开的說法也是不对的。無論改造世界观和改造思想方法，都是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过程。知識分子改造的道路，一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二是到革命实践的斗争中去鍛炼。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通过实践的鍛炼，特别是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实践，无疑地对于改造世界观有很重大的作用。因为要改造世界观，首先要改造阶级感情，一个知識分子取得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是很重要的，如果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沒有感情，那是談不上世界观的改造的。知識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阶级感情起变化开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沒有阶级感情的变化，便不可能有世界观的真正改造。知識分子只有到工农劳动群众中去，和他們一道进行三大革命斗争，才能不断地丢掉旧感情、旧习惯，换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新感情、新习惯。因此，和工农群众相結合，到实际斗争中去鍛炼，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前提条件。

但是，阶级感情起了变化，并不就等于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的。必須经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在自己的头脑里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也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有收获。因此，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必由之路。

如果认为不用学习或者不用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完全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可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那是完全錯誤的。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思想意識的改造，取消了世界观的改造。

当然，学习毛主席著作决不可以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因为这样做也是达不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須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以毛泽东思想之矢，

去射革命实际之的。这就是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雷锋同志的学习公式“问题——学习——实践——总结”，就是带着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再把毛主席著作的指示，应用到实践中，然后用毛泽东思想来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这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认识论公式的实际运用。这个公式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意识，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也是普遍有效的。

思想方法的改造，也是不能靠死读书的。有人以为唯物辩证法，讲什么规律，讲什么范畴，这些原理、原则、公式，只要背熟它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学习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而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除了读书，还要实践，而且实践是更重要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你怎样才证明你掌握的辩证法是否是真理，就只有通过实践，看你学到的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不合，那是假辩证法，如果符合，才是真辩证法。同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领会和掌握辩证法。比如要提高分析能力，不通过实践的锻炼，只死读几本哲学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只有深入实际，在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不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们才可以熟悉生活，对于具体的矛盾才有真正的了解，这样也才能有中肯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我们改造世界观和改造思想方法的过程也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造的过程，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好主观世界以便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这样互相结合，不断提高，就有可能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战士，这样就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和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重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鲁 阳

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名讲话，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毛泽东同志发表这篇讲话的时候，正当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百万大军围攻的紧要关头。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①。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个任务，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向全体革命工作人员，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名讲话中，着重地提出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观点，对于关心群众生活与完成革命任务的关系，讲究工作方法与完成革命任务的关系，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深刻的论述。

今天，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要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准备随时打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积极做好战备工作，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毛泽东同志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完成革命任务与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把完成革命任务与讲究工作方法密切联系起来，充分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便不断地争取革命事业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非常丰富和深远的，这里，只就其中的某些方面，谈一点我学习的粗浅体会。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如何对待和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家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群氓”，“阿斗”，当作是自己的工具。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首创作用和伟大力量，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总是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

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条件。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坚信群众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①

为什么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呢？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③“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④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是社会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人民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唯一泉源。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它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它在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方面，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泉源。“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⑤

和革命人民完全相反，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可怕，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它们脱离人民，同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它们愈是坚持进行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战争，它们就愈会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而使自己完全陷于孤立，遭到失败以至灭亡的结局。

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坚强的信心，他在革命力量还小的时候，就敢于蔑视一切敌人。他对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的命运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⑥三十二年来，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无不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英明论断的正确性。中国人民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我们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能无敌于天下。在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个铜墙铁壁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都只能以自己的彻底失败告终。

我们共产党人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始终不渝地捍卫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力量的唯一泉源，把充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④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而要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今天，我们要充分做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准备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打各种战争、在几条战线上打。我们要把全部准备工作建筑在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基础上。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用人民战争来对付它们。人民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发动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能够真正实现全民皆兵，做到敌愾同仇，人人誓死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战，就一定会把美国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备战如此，建设也如此。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靠什么？最根本的也是靠提高人民的觉悟，靠调动起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生产力。人的因素第一。只有把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物的因素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只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地发动起来，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创造奇迹，生产和建设就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大庆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大寨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其他许多取得生产和建设上的显著成绩的先进单位的经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依靠人民，一切就有办法，脱离人民，就将一事无成。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①

时刻关心群众利益

关心群众利益，这是共产党人的职责。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群众的长远利益，一方面是群众的当前利益。我们为人民服务，就是既为群众的长远利益服务，也为群众的当前利益服务。无论是进行革命和建设，还是解决群众当前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时刻关心群众的痛痒，关心群众的利益，是有无充沛的无产阶级感情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②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为我们提出了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原則。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关系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事情，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这是关系人民群众当前利益的事情。一切工作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这就是说，当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但是，群众实际生活问题的解决，又能够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推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

动革命战争的胜利开展，所以在关心群众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必须时刻关心群众的当前利益。把这两者的关系正确地处理好了，就一定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同志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①因此，关心群众生活并非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是有关保证胜利完成革命任务的大事情。因此，“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②

当然，强调要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并非可以只是把群众的眼光局限于当前利益的小圈子里，而忘掉了要引导人民群众为完成革命任务和达到远大的革命目标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③我们强调要突出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是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要通过群众的切身体验，更好地教育群众认识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为了谁，革命同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的道理，从而更大地提高革命积极性，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贡献一切力量。

正确处理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这是我们党制订任务、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积累了处理两者的关系的丰富经验。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动员、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持抗日战争的前提下，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正确地实行了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迅速壮大了抗日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提出了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必须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教导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④按照这个原则去处理分配问题，就既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又可以使群众的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

当前我们要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加强战备工作而奋斗，必须坚持在一切工作中认真贯彻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相结合的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1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

④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8页。

則。拿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來說，不发展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改善就失掉了依据，因此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地发展农业生产；反过来，只讲发展生产，不管群众生活，就会脱离群众，損害农民的积极性，其結果也就不能搞好生产。因此，我們在一手抓生产的同时，也要认真抓增加社員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把生产和生活对立起来，把关心群众生活和艰苦奋斗对立起来，认为既要重視关心群众生活就不要提倡艰苦奋斗了，那是不对的。我們的人民公社，不仅是群众生产的組織者，而且是群众生活的組織者，如果既把群众的生产领导得好，又同时把群众的生活組織得好，經過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农民群众就会更加亲切地体会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党的领导的正确，他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会更大地提高，从而把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迅速推向前进。

我們党提出的关心群众生活，同現代修正主义主张的“物质刺激”，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我們所說的关心群众生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方面，而他們所謂的“物质刺激”，則是让少数的特权阶层加强对劳动人民剝削的一种工具。我們所說的关心群众生活，是在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前提下，更好地調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和实现远大的革命理想而奋斗，而他們所謂的“物质刺激”，則是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則，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引誘群众忘掉阶级斗争和远大的革命目标。我們所說的关心群众生活，是为了要正确处理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而他們所謂的“物质刺激”，則是借口群众当前的物质利益而損害和牺牲了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党的关心群众生活和現代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是根本对立的，我們一定要分清其中的界限，既要积极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又要坚决反对实行“物质刺激”。

遇 事 和 群 众 商 量

进行革命和建設，改善群众生活，这是我們的两大任务。“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①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任务和革命工作方法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形象的描述：“我們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沒有桥或沒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②

我們党一貫坚持的工作方法就是群众路綫。遇事和群众商量，就是群众路綫的主要精神。無論是决定党的政策的时候，貫徹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检查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时候，都得要同群众商量，了解群众的要求，傾听群众的意見。也就是說，無論是“从群众中来”，还是“到群众中去”，都离不开遇事同群众商量。

走群众路綫，有事和群众商量，就可以把群众的經驗和智慧集中起来，把广大群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頁。

的革命积极性調动起来，成为各項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証。

有事和群众商量，就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放手把問題交給群众去討論，广泛地把各式各样的意見都集中起来，择其善者而从之，对其不善者則解釋之，做到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見，都依据情况，組織群众加以实现，对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見，則通过耐心說服的办法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对于群众的正确要求，都要认真对待，及时解决，对于一些暂时还办不到的合理要求以及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教育群众划清取舍界限。这样，就可以不犯或少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如果不听取群众的意見，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自己热心什么就抓什么，想搞什么就要求群众干什么，或則包办代替，或則强迫命令，那么就一定会脱离群众，出偏差，犯錯誤。

有事不同群众商量，那末，首先，所布置的任务本身就往往不会是正确的；其次，即使任务是正确的，但群众对于执行任务也会抱着消极、怀疑的态度，不乐意接受；第三，有时任务似乎也“完成”了，但成績也将是不巩固的，还有可能丧失；第四，群众的积极性就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会受到挫折和損害，造成深远的恶果。

能不能走群众路綫，遇事同群众商量，归根到底是一个世界观問題。如果认定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員，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群众經常負胜利之責，承认群众是一切智慧的泉源，承认群众只有依靠自己力量才能解放自己，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作主，那么，就会站在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見。相反的，如果不承认群众的伟大創造力，把群众当成“阿斗”，那么就会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輕視和抹煞群众的意見，偶尔做了一些好事，就自以为是对群众的恩賜，把事情办坏了，引起群众的不满，就又常常埋怨群众“落后”。如果相信事物是在矛盾中运动和发展的，任何事物都有几个方面，都与其它事物相联系，那么，就会自觉地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見，既听正面的意見，又听反面的意見，既听贊成的意見，也听反对的意見，既听多数的意見，又听少数的意見，这样就可以通过分析、比較和揣摩，看出各种意見的不同階級內容，看出其中的差別与矛盾，看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然后加以选择和綜合，使自己的認識更正确些更合理些。如果不相信这些，不愿这样做，其結果就会使自己的認識陷于表面性和片面性。

遇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綫，是我們党的优良传统，要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这就要求我們繼續保持謙虛的态度。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繼續做学生，才能繼續做先生。我們要有这样的决心：做一辈子的人民勤务員，也要做一辈子的群众的小学生。

我們的一切革命工作，都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依靠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走群众路綫，遇事同群众商量，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倾听群众的呼声，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激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这样，就能創造出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来；就能促进革命和建設工作的順利进行，使我們的革命事业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指导员 黄祖示

只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才能 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才能尝到学习的甜头，增强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我刚学毛主席著作的时候，走过一些弯路。一下看完了十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看完了，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思想问题也没有解决。后来，领导帮助我学习林彪同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指示，这五句话里，就讲了三个“用”字，都是要我们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从那时候开始我试着用，结果真是一用就灵。当新兵时，学习《为人民服务》，克服了碰到困难打退堂鼓的思想；在训练场上，愚公移山的精神鼓舞了我，成绩不断地上升；当了班长，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改进了领导方法；当了干部，用毛主席关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导去指导实践，办法就多了，就把“难”字赶跑了。年去外出执行新的任务时，老骨干少，新兵多，技术复杂，任务艰巨，时间又紧，面临着这种情况，怎样在短的时间里，使同志们思想过得硬、作风过得硬和技术过得硬，一切符合实战要求呢？我们想到毛泽东思想威力最大，威信最高，便启发大家遵照

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的教导，充分发动群众，大胆地干，刻苦的练，互教互学，边研究，边实践，完成了任务。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就是我们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甜头。这段时间，我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体会是：

（一）要用得大胆，坚定不移。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无往不胜，别人能做出来的事，我们就能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我们也能做到。要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二）要用得踏实，不怕反复。复杂的事情细心去做，重要的事情认真去做。要办好一件事情，必须反复地实践，多出一分力量，就多一分收获。我们为了打有把握的仗，办事有把握和把握性很大，主要靠毛泽东思想。

（三）要不断总结，才能有所提高。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要好好总结。我们做完一个课目，练完一个动作，处理一个问题，都要求总结。个人需要总结，单位更需要总结。总结不等于开药单，要精，要管用，要是实的，而不是空的，避免烦琐哲学。总结好，大有益。总结的过程，是一个找差距、找动力的过程，提炼经验的过程，也是用毛泽东思想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过程。要提高，就要去总结。不断总结，才会有所发展。

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甜头是說不完的。个人是这样，連队也是这样。我們連队的四好是怎样創来的？全靠毛泽东思想，全靠打好兴无灭資的思想仗。

总之，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就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用，学不起来；不用，坚持不下去；不用，就达不到学习的目的；不用，就不懂得毛泽东思想。一句話，不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主席著作是学不好的，毛泽东思想是学不到手的。

我是怎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实践中我主要是用在三个方面。

（一）用于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于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懂得人生在世，为谁活着、怎样活着，生为革命、死为人民的彻底革命世界观。这是最根本的問題，必須狠下功夫。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們的头脑，才能彻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样才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心一意为革命，才能有最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坚决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干到底。要达到这一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須长期不懈地用毛泽东思想刻苦地改造自己。毛主席告訴我們，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着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人的思想总是自始至终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自己就是这样。我的头脑中有无产阶级思想，但是也有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剛来到部队，学习上碰到困难，就想打退堂鼓；受

到班长批評，不高兴，鬧思想問題；当三年兵就以为完成了自己保卫祖国的任务，時間一滿就想回家；受了表扬沾沾自喜，心眼里舒服；评为积极分子后，工作怕出洋相，影响领导和自己的威信，干起工作来前怕狼，后怕虎，縮手縮脚，一事当前，先替自己着想；当领导严格要求自己，群众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又感到当积极分子太麻煩。所有这些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我出身是个貧农，长在毛泽东思想的紅旗下，又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还会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呢？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懂得了，在我們的国家，剝削制度虽然消灭了，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至于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更是永远存在的。这些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到自己的头脑里来。几年来要不是經常学习毛主席著作，领导和同志們的經常帮助，在自己的头脑里不断地开展兴无灭資的斗争，很可能会陷在个人主义的泥坑里，爬不起来。

能不能战胜脑子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关键在于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銳利的武器来进行改造。人的脑子就好象一个战场，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好象敌对双方的两支军队，它們是誓不两立的一对矛盾，双方的力量，不是不变的，也絕不是合二而一的，最后的結果，是兴无灭資，还是其反面，就看我們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話，經常进行两种思想的斗争。非无产阶级思想露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毛泽东思想来斗争。

几年来，我初步体会到，要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是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勇于自我革命；其次是要有高标准，严要

求，要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求自己；再次是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第四是要长期坚持，不断革命，思想改造也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要步步深入，不断提高。

(二)用于做好工作，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要做好革命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仅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也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好的工作方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用毛泽东思想作指针，不断实践，不断斗争，不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调查研究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等有关论述，克服工作中的主观片面，少走了不少弯路。

(三)用于观察分析国内外形势，明确自己彻底革命的崇高责任，随时准备打仗。用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使自己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犯大错误。用毛主席这些教导观察分析国内外形势，归结起来使我理解到四点：

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对他们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必须树立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打不倒，现代修正主义不斗不垮。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必须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

的思想武器，必须练好杀敌本领，把一切工作立足于“打”字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几条战线上打，打胜仗。

三、面临着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全世界革命力量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相互援助。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应该身在祖国，胸怀世界，时刻想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把支援他们的解放斗争当作自己不可推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四、革命就要革到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直到全人类彻底解放为止，不能半途而废。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必须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为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奋斗到底。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 几点初步体会

几年来，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有几点初步体会。

(一)为用而学，认真读书。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革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要用于革命，为革命而学，为人民而学，为用而学。但是，要用，首先就得学。毛主席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②。我想，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象我这样“一穷二白”的人，更应努力读毛主席的书。一定要用毛主席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给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已提出了两条要求：第一，学习要打持久战，第二，行动要打歼灭战。学习要打持久战就是坚持天天读；行动要打歼灭战就是坚持事事用，处处用，时时用，用得准，用得好。时间长了学的东西就多了，用起来就方便了。几年来，我坚持了这两条原则。象我这样刚刚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要用得立竿见影，还要有重点地学习。要带着经常需要用的问题，反复学习，重要的观点要弄懂。对一些警句，要象林彪同志指示的那样把它背熟。因为毛主席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毛主席著作中的根本观点，是经常起作用的。对这些根本的东西，只学一次是不可能学好的，要经常带着不同的任务，不同的问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才能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象“老三篇”这样的文章，我学了好几年了，也不知看了多少次，但一次比一次深刻，读一次有一次收获。我觉得，毛主席著作，是常读常新，常用常好的宝书。

(二)学了就用，勇于实践。毛主席告诉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①学习毛主席著作，关键在于用不用，干不干。因此必须做到学一点，用一点，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行动不开台纸条，嘴里不放空头炮。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在书本上学，在脑子里想，在手里做，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要做到这一点，又在于见艰苦就上，见难题就斗，见缺点就改，见好的就学，见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做。我体会到，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用得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要狠在做好艰苦的工作，狠在解决难题，狠在

敢于挑重担，狠在思想彻底革命化，狠在世界革命思想牢。温室里不能培养出参天的大树，冰雪中才能锻炼出耐寒的青松。舒适的生活不能培养出勇敢的战士，斗争的烈火才能锻炼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我觉得，勇于实践，敢挑重担，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去工作，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基本环节。

(三)边学边用，边用边学。我每读了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学了一个观点，学了一条语录，都要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进行检查对照，找出那些对，那些不对，用毛主席的观点，分清是非，辨明真假，识别香臭。对的、好的、香的坚持干下去，错的、假的、臭的坚决改掉。要勇于暴露自己的问题，找出差距，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改正缺点，缩小差距。

学了毛主席著作，找到了毛主席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定要自己提出问题来，想出自己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想得具体、细致，在行动中才会落实。每当自己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时候就要给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要开展思想斗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的过程。如果对自己没有严格的要求，就谈不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泽东思想就学不到手。

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总结，这样才能用得更自觉。每做完一件工作，要总结出经验来，总结出办法来，总结出努力方向来。在用中注意总结，才能用得更加自觉，才能步步加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

(四)消除杂念，彻底革命。林彪同志指示，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狠”字，照我的体会，就是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搞彻底革命。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样的武器只有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掌握。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几年来我有三条体会：

- 一是：心怀中沒有“我”字，革命第一；
- 二是：行动上沒有“懶”字，工作第一；
- 三是：脑子里沒有“驕”字，謙虛第一。

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从这三方面狠下功夫，同“我”、“懶”、“驕”三个字作坚决的斗争。

听毛主席的话，首先要跳出“我”字的框框。“我”字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有了“我”字，既在思想上束缚人的头脑，又在实际行动中捆住人的手脚。心中有了“我”字，就会怕苦、怕累、怕死，就不敢革命。

心中有了“我”字，行动上必然有“懶”字，“懶”字就是“我”字的具体体现。干革命是懶不得的，要打倒旧世界，建立一个完全的新世界，不能懶。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拣重担子挑、勇于实践等教导，懶人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人懶了沒有出息，人懶了一事无成，只能当革命的“敗家子”。“和平演变”就是从懶字开始的。行动上懶了，就根本没有办法把毛主席的教导用于行动。

心中有了“我”字，脑子里必然有“驕”字，“驕”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它是革命工作的大敌，是个人进步的大敌。毛主席教

导我們：“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经常想，一个人有了进步，干出了成绩，对脑子里沒有“我”字的人来说，是一种鞭策，一种鼓舞，对脑子里有“我”字的人来说，则是一个包袱。有成绩有进步是比较而言的，按低标准来说，我入伍几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一些进步；按高标准来说就不行了。想想革命先烈、想想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王杰等同志对革命、对人民的贡献，比比为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学学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制成的总结，比比大庆、大寨革命同志的雄心壮志，就觉得自己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了。特别是想到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还没有解放，还需要自己贡献力量时候，更觉得需要自己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体会到，在成绩和进步面前，一定要运用一分为二这个锐利的武器在脑子里打一仗，彻底防止和克服“驕”字，时刻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足不单是个虛心的问题，而且是个实际情况。任何人都有成绩和不够的两个方面。如果脑子里有了“驕”字，丢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忘记了自己的不够，夸大自己的作用，忽视群众的力量，办事一定会主观主义，必定会放松学习，放松思想改造，老是蹲在“我”字的框框里，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我想，先进转化为落后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脑子里有个“驕”字在作怪。脑子里沒有“驕”字，虛心第一，才能前进，才能不断革命。

总而言之：心怀中沒有“我”字，革命第一；行动中沒有“懶”字，工作第一；脑

子里没有“驕”字，謙虛第一。这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促进革命化，狠下功夫的突破口。

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刚刚开始，特别是在“用”字上下功夫，还不够狠，对毛主

席著作精神实质理解不深，有时学得被动，用得也被动。我决心向王杰同志学习，象王杰同志那样具有“最根本的觉悟，最高度的自觉，最刻苦地锻炼，最广泛地学习，最严格地要求”，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深入实践，和工农結合

中南林学院副教授 梁 葵

过去工作为飯碗，今天工作为人民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在旧社会，我干过許多年的林业实际工作和教学輔導員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被迫改行当一个穷公务人員，政治上受欺凌压迫，听人摆布，飯碗經常朝不夕保，遭受过四次失业，自己离乡背井，一家挨餓受冻，受尽凄凉。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使自己思想上存在着为飯碗而工作的雇佣观点和严重的自卑感。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也把这些錯誤思想带来了。在一段时間內，自己对革命工作的意义是認識不清楚的，也不敢大胆批評和自我批評，自己明知不对，也沒有勇气去克服，对坏人坏事，也不敢开展批評斗争。

在党的教育下，自己的觉悟逐步得到提高。一九六四年，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意义。过去工作为飯碗，今天工作为人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在旧社会虽然卖命工作，但仍然受到压迫和歧视，过着痛苦的

生活，现在政治上翻了身，党信任自己，把我从教輔人員直接提升为副教授，一家吃飽穿暖，三个儿女上学念书。我从回忆对比自己的两种不同的遭遇中，深深感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与新社会的幸福，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了，也迫切地感到需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所以在工作中，虽然苦一点，累一点，我也觉得不算什么。如爬山越岭，有时我肺气肿发作了，的确难受，但我仍然顶住宅，坚持完成任务。又如一九六四年三月，为了支援白云山风景区林分改造，我去白云山蹲点，和工人三同，睡在临时搭的工棚中，在三个月中，既要在白云山上搞工作，又要下山回到学院給同学讲课，往返爬十数里山路，有时大风大雨，山路泥濘难行，我照样坚持到各个点检查工作，坚持回学院上课，虽然被雨淋得浑身湿透，气喘病有时也要发作，但我工作得很愉快。

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之后，我就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认识到，解放前我国

林业遭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滥伐和掠夺，树不成林，林业极度凋蔽，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林业，许多新的林业基地建立起来了，许多森林也恢复了葱郁林荫的景观。但是我国林业建设还远远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奋发图强，尽快地提高林业科学水平，势必阻碍祖国社会主义林业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我感到祖国在召唤。

深入实践，和工农结合

由于我一向是从事林业教育的实际工作，大部分时间与山、林打交道，虽然在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总觉得自己的实际经验不一定比读书的人强，还不很明白“认识来源于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的道理，也看不清工农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因此，一直在盲目地工作。近几年来，经过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才比较懂得了毛主席所教导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所以我总是自己上山采标本，自己下点搞科学研究。在实践中，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①。所以我很注意向林区工人学习。我在海南岛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通过访问，从一些工人那里了解在亚热带地区种植橡胶必须具备依山、靠林、静风、近水等几条经验。海南岛的森林中，木兰科有两种苦梓树，茶科有一种苦梓树，都很相似，不容易分辨出来，但木材性能和价值不同，究竟那种是最贵重的？我请教工人，他们一语道破说：“味最苦的就是最贵重的”。又如热带树种“青楣”，在书本上和

一些权威都说它仅仅分布在较高的山区，我也曾爬上高山去寻找，可是农民不但在高山能找得到，而且带我在低山上找到。我感到从工农群众那里，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些事实使我了解到自己对现实生活和生产斗争知识的贫乏，也使我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教导的：“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②。

过去我在森林调查识别树种时，是采取花果分类法的。运用这个方法，要爬上树，摘下花来，把它切开解剖，看它里面的子房是上位还是下位，是侧膜胎座还是中轴胎座？要数花被花蕊有多少等等。方法既繁杂，效率又低，而且在无花果季节，或者遇到硕大高耸的树木，人爬不上去，采不到花果，这种花果分类法就不灵了。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进行，影响了资源的调查和开发，这是不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林业的要求的。我看到祖国林业事业发展的需要，感到需要创造出一种识别树木的新方法。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理解到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于是下决心和林业工人一道苦心钻研，在树木学方面，特别是对亚热带、热带树木的识别，采用树皮与枝叶相结合的方法来识别树种。采用这种方法比原来采用花果识别的方法有许多优点，不仅解决了过去工作中不易解决的问题，而且工作效率提高了一至两倍。我体会到，在工作中，不能让洋教条的框框套住自己，认识是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从实际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发来解决問題。

起初，我們想到热带林常綠，全年都有树叶这个特点，因而試用枝叶識別树种，这样是解决了一些問題，对于比較矮的树能采到枝叶的可以認得出来。可是碰到春多云雾多，树又高大，爬又爬不上，这时枝叶識別方法又不灵了，工作又不得不停頓下来。自己看了許多书，写信向人家請教也沒有得到什么解决办法。怎么办呢？我又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再一次加深对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的認識，决定和工人群众一起繼續想办法，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經驗。我和工人同志一起反复观察树林中的树种，切开树皮来看結構，探索树皮类型，这使我联想起树皮类型和別的地方的一些树皮类型相似，是否可以采用树皮和枝叶結合的方法来識別树木呢？試驗結果，这是一个較好的方法，我們在工作中就把它推广了。結果四十万公頃的森林，仅仅花了一年半時間就完成了調查工作，收集了二千七百分标本，如果采用花果分类法，則至少需要五、六年才能完成。

由于这一次实践，我对用树皮識別树木这一方法的認識进一步加深了。但这些認識还是感性的，还没有提高为理論。毛主席教导我們：“認識从实践始，經過实践得到了理論的認識，还須再回到实践去。認識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須表现于从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認識，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②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以后，我就注意在实际中不

断总结，不断提高，于是我們又将树皮的顏色、裂紋、形态、結構、味道、有无乳汁等，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初步根据树皮的“六皮乳脂味，三紋綫沟微”的不同特征，即是从树木的外皮可以观察到的刺皮、斑皮、烈皮、光皮、色皮、薄皮等六种皮；和砍皮之后分泌出来的乳液、树脂、气味三种特征；又从韧皮或木质部的不同形态結構如直紋、环紋、斜紋、射綫、沟孔、微点以及顏色等等整理出十七个类型，作为識別树木的理論依据。当然，这是粗淺的理論，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它終究是树木学上的一个发展。实践証明，它能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又能更快更好地培养人材。

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进行教学改革

我比較长的時間从事实际工作，一九五九年起課堂講学多一些。一九六四年春学习了主席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从实践的切身体会，回过头来看教学工作，我感到树木学教学中的确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偏向。一九五九年我也搞过一年现场教学，那时，只是看到同学实际知識少，学了不能解决生产問題，把油桐果看作苹果，为让同学們多掌握一点生产知識，就多帶他們到实践中去学，但有的老师却冷嘲热諷，說现场教学学不到理論，只有課堂教学才能学到理論知識。那时，由于我是單純从多学一点实际知識出发的，还没有提到理論联系实际，教学和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頁。

产相结合的高度来理解，加上自己思想上也患得患失，因此，没有坚持下来。自从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进一步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以及有关教改指示后，才明确认识到我们教学必须改革，必须高举毛主席教育思想红旗，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判一些知识分子时说：他们“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①，这批评是十分深刻有理的，对我启发很大。过去我们的确只起了留声机的作用，不敢变动所谓哈经生的树木学学科的系统。同时，也认识到过分强调课堂教学，轻视现场教学，忽视理论联系实际，忽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与我们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绝不相符。在提高了思想认识之后，我和教研组老师一起对教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打破旧框框，改革旧的系统。以前按英国哈经生系统讲课，硬搬一套不切合我国实际需要的理论。旧框不破，学生学树木学难记难懂。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实际出发，因此，我以自己一些经验，根据树木营养器官特征，将叶的不同形态划分类型，加上不同结构的特点，分别归纳来讲课，破了只根据花果识别顺序讲课的旧系统；又与其他教师共同努力按地区分别试编出“枝叶检索表”，讲课与复习时按表查对，简化易懂，逐步解决过去难记或记不牢学不活的缺点。学生有了表，无花果有枝叶可认，老师不讲课也可认，老师不在场也可认，不同地区可按不同检索表查对识别。

二、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简化教学内容。过去我讲课很重复很烦琐，例如讲羽状复叶某些豆科树木十三种，从习性、干、枝叶、花、果、种子排下去就有二千八百多字，需时九十分钟，学生听时无味，听后也不易记。什么原因？是从书本抄来老一套的教学内容，重点不突出。我学习《矛盾论》，体会到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是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将这些树种重新分析，在叶上几个靠边，偏上，居中或下斜的叶脉里找出共同特征，由一般到特殊，再分清类型，由特殊到一般，只用二百余字，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同学听课，到现场马上认识树种特征，同学也欢迎。为了让学生记得牢，我还编了些顺口溜，如“叶背主脉看清楚，上下位置又如何，加上二回好复叶，抓到特征就弄妥”，同学也觉得很好。

三、过去老师教书只教书不教人，重业务轻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逐步注意通过专业课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和热爱林业的教育。我讲到祖国富饶美丽的海南岛的森林时，就运用回忆对比方法，向学生讲解国民党统治时滥伐森林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疯狂掠夺的情况，使学生不要忘记过去的悲痛历史。讲解了解放后党和政府加强护林，合理经营，以及目前迫切需要大批林业工作者开发我国林业宝藏，我们搞热带、亚热带林的同志，对今后支援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林业建设，更是责无旁贷。这样同学倍感亲切，加深了对党对祖国对林业专业的热爱，加强国际主义的思想。同时，我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野外实习时常常鼓励同学要到深山悬崖才能学到活知識，練好硬本領，應該不怕苦，不怕累，跑到深山去为祖国林业建設貢獻青春。

我在党的哺育下，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上距离党和人民要求还差得很远，工作做得不够，缺点也不少，特别是

世界观的改造，对我这个在旧社会呆了四十多年的旧知識分子來說，还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今后我一定坚持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做一个又紅又专的人民教师，朝着知識分子革命化的方向前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为支援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文艺理論课教学中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师 饒芃子

要教革命书，先做革命人

我自一九五八年以來，一直担任文艺理論課的教学工作。七年来，我在教学上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教訓。回顾已走过的一段路，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要搞好文艺理論課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記得一九五八年剛調来暨大的时候，中文系只有一門文艺理論課，就是讲授《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以下簡称《講話》）。当时系的领导对《講話》課很重視，曾多次指导我們要認真学好《講話》，教好《講話》。在备课中，他发现我感情上还是迷恋旧的文艺理論体系，就介紹我学习《改造我們的学习》、《反对党入股》、《整頓党的作风》等几篇文章，要我在教学上認真貫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坚持理論与实际相結合的原則，叫我千万不要迷信那些洋入股、洋教条，文艺理論課的教学一定要面向实际，面向斗争，讲授《講話》

尤其應該这样。这些意見，我当时听起来，都觉得很对，主观上也愿意按他說的去做。但由于我过去沒有阶级斗争和文艺斗争的实际体验，对这些話理解不深，为教学而教学，为联系实际而联系实际，沒有認識到在教学上能否貫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关键是教师的革命化問題。所以在教学实践中，責任感不够强，一碰到困难，个人患得患失的情緒就来了，觉得这样做是吃力不討好，不想坚持下去。这段教学沒有得到应有的效果。

后来在高等学校文艺理論課的教学中，有些人很強調“正规化”、“系統化”，我思想上也一度迷惑起来，錯誤地以为按过去《文学概論》那一套教，才是“理論”，才有“系統”，所以在一九六〇年把《講話》課改为《文学概論》課时，自己在教学上又走回过去的老路。当然，由于自己是經歷过一九五八年那样一段教学实践的，在走这一段回头路时，思想上也并不平靜，常常产生矛盾和斗争，也力图在《文学概論》

課的教學中，突出毛澤東文藝思想這條紅線。但因為自己始終沒有從舊的教學框框里解放出來，在思想上又沒有解決為誰而教的問題，教學中未能排除個人患得患失的雜念，只求穩妥，滿足於一般地能把文藝理論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沒有決心和勇氣在教學上大破大立，所以實際上並沒有也不可能做到突出毛澤東文藝思想這條紅線。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我下鄉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火熱的階級鬥爭中，深深感到長期的書齋生活已使自己遠遠地落後於當前的革命形勢，首先是自己在思想上、感情上與廣大貧下中農的差距很大，如不儘快地縮小這一差距，就很難在運動中做到全心全意地去為他們服務。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怎樣才能縮小這一差距呢？我帶著這個問題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說：“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①我把這段話和自己那時候的實際情況相對照，覺得自己當時工作上的矛盾就是不了解那裡的群眾，群眾也不了解我，我和群眾之間在思想感情上不但不能打成一片，而且有很大的距離，要解決這一矛盾，就得痛下決心，在群眾中“磨練”自己，逐步實現思想感情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變化。所以在和老貧農盧守珍“三同”的過程中，雖然客觀的條件比較艱苦，但因為能夠嚴格要求自己，時刻注意找自己與她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差距，虛心向她學習，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受到了一定的鍛煉，因而在運動中，個人雜念較少，能時刻感覺到自己是在幹革命，經常

有這麼一股感情，對革命有利的我就幹，對革命有害的我就鬥爭，最後能夠比較好地完成任務。

從農村回來以後，我總結自己在下面的一段生活，認為那時候在思想鍛煉和實際工作中，所以收效較大，是因為：第一、能時刻記住毛主席的指示，自覺改造自己；第二、為貧下中農服務的思想比較明確。來自實踐的這些感受，使我認識到在學校里要教好文藝理論課，最根本的問題也是要毛澤東思想掛帥，要樹立為革命而教的思想，只有摒棄個人主義雜念，在教學上才能夠做到敢於破舊立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過去沒有把課教好，就是沒有覺悟到這一點。如果教學也象在农村搞運動那樣，階級立場和感情都很鮮明，就不能對當前激烈的文藝鬥爭熟視無睹，也不能對同學們的文藝思想實際不聞不問，更不能為了個人一時的得失而放棄在教學上革命，正是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我下定決心要走出書齋，迫切要求接觸實際，要求參加文藝鬥爭。

我從農村回來後不久，又在文藝界參加了一個短時間的實際鬥爭，之後，學校里開始進行教學改革，由於經過一個時期實際生活的鍛煉，我在教學上有比較強烈的自我革命的要求，也認識到過去教文藝理論課，只是着重講授一般的文藝理論知識（當然這是必要的），而不注意結合當前文藝上階級鬥爭和學生的思想實際，培養學生分析批判的能力，幫助學生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觀，是不對的。所以当領導上決定把《文學概論》改為《毛澤東文

^①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3頁。

艺思想》时，我是很拥护的。后来领导上要我担任这门课的主讲教师，自己事先思想准备不足，以为我刚刚从农村回来，又正在校外进修，马上要我教课的可能性不大。任务下达以后，思想上斗争很激烈，认为原先没作上课的准备，现在不仅要我马上上课，而且是开新的课，能否把课教好，实在把握不大。特别是当想到这门课是教改的试点课，如自己一时准备不来，上不好，就会影响系里教学改革的进行，思想上负担更重。但自己不上谁来上呢？难道可以把困难扯给别人，把方便留给自己吗？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学习《关于重庆谈判》和《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①又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②。我用毛主席这些话对照自己的思想，觉得自己对教改虽然是热情积极的，但在具体问题面前，还是不能摆脱个人主义思想的约束，从而认识到有没有信心教好《毛泽东文艺思想》课，正好反映出我思想深处还是“我”字当头；认识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敢不敢挑重担子，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的问题。所以在反复认真地体会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要做到“完全”、“彻底”、这几个字的精神以后，就自觉地批判脑子里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我当时这样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既然是我们系教学革命的试点课，作为一个党培养起来的年青教师，在这重要关头，敢不敢去冲锋陷阵，敢不敢挑重担子，是党对自己的一次实际的考验。至于前进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

难，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在思想上真正过“硬”，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学工作看成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就能用革命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能够下决心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斗到底，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对克服困难也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突出政治，活学活教

在教学上有了为革命而教的思想，有了和个人主义思想斗争到底的决心，但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应怎样做呢？最初，我和教学小组的同志们心里都没有底。后来，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认识到我们是在为革命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大大加强了教学的责任感；对怎样教《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也有了比较统一的想法。大家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它是从文艺斗争、文艺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文艺斗争、文艺实践的战斗理论。因此，必须打破旧的一套“正规化”、“系统化”的框框，紧密联系文艺斗争，抓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条纲，才能教好这门课，才能帮助同学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武器。所以，它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也是一门思想教育课，教《毛泽东文艺思想》，一定要联系同学的思想，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在教学上要做到“有的放矢”，首先是要了解和熟悉学生的情况。开学以前，我和教学小组的同志们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开座谈会、个别谈心、跟班劳动、参加班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3页。

級組織的社會活動等，在同學中進行調查研究。開學以後，我又堅持參加勞動，參加他們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抱着“先當學生，後當先生”的態度，從各方面去了解他們的文藝思想情況，听取他們對課程的意見和要求，使我們能夠做到從實際出發來進行备课。

在課前的調查研究中，我們了解到同學們對學《毛澤東文藝思想》課，各有各的看法。有的是為寫文章而學習，有的是因怕犯錯誤而學習，也有不少人沒有明確的學習目的，而是為學理論而學理論，認識很不一致。大部分同學對幾年來的文藝鬥爭，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對學中文專業產生了畏難的情緒，怕担風險，怕受批判，有個別同學甚至後悔當初報考了中文專業，想轉系。面對着同學們各種各樣的思想情況，我們教學工作的第二步應怎樣走？那時候，正好各報刊都在介紹《郭興福的教學方法》，我們就組織學習《郭興福的教學方法》，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示。郭興福同志在教學中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是突出政治，他進行軍事訓練，不是就技術教技術，就動作教動作，而是把軍事技術和政治思想結合起來，以政治思想來帶動軍事技術，而且處處從階級教育入手，戰士們帶着階級感情和敵情觀念練兵，所以越練越硬，越練越強。郭興福同志教的雖是軍事技術，但他在教學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經驗，却帶有普遍的意義，它使我認識到要解除同學們學習上的各種顧慮，把他們學習的積極性真正調動起來，一定要政治領先，從階級教育入手，幫助他們明確為革命而學的思想。所以我在“導言”課中，一方面是着重給他們講當前的階級鬥爭形

勢，特別是文藝界的階級鬥爭形勢，要求每個同學都要明確為誰而學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結合分析他們中存在的一些文藝思想，指出由於過去沒有明確為誰而學的問題，有些同學在具體的文藝問題上已迷失了方向，启发他們一定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帶着階級感情和敵情觀念來學習《毛澤東文藝思想》。

經過“導言”課的启发以後，許多同學的思想動起來了。有的同學說自己過去由於不明確為誰而學的問題，真理謬誤不分，香花毒草難辨，把《早春二月》這麼一株大毒草作為香花來頌揚；有的同學說自己過去沒有用階級觀點看文藝問題，在廣東文藝界批判《三家巷》、《苦鬥》時，曾一度為作者抱不平；還有個別同學說自己過去之所以一心一意想學中文專業，為的是成名成家，出人頭地。於是，我們又分頭下去進行個別的輔導工作，針對具體的情況，幫助他們深入認識自己的問題。

隨着同學們學習熱情的提高，接踵而來的問題是教師如何在教學上活學活教，去滿足同學們學習上的要求。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說：“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①我想，要幫助同學把毛澤東文藝思想真正學到手，就一定要按照毛主席這一指示來做。所以在教第一單元“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時，我們就要求同學們

①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7頁。

联系自己的思想、专业实际，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但开始时，同学不很习惯，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可带，也不知道如何来活学活用。为了启发帮助他们认识文艺思想和文艺斗争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他们以《讲话》第一部分的精神，对照自己的文艺思想，找自己和毛主席文艺思想上的差距；另一方面是从实战出发，引导他们关心和参加当前文艺斗争。那时候文艺界正在酝酿批判电影《林家铺子》，我们就组织同学讨论《林家铺子》，让同学们充分发挥自由思想。讨论时意见分歧很大，争论也十分激烈。最后，我们从他们的文艺思想实际出发，给他们上“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总结课。经过第一单元的实践以后，在第二、三、四单元的学习中，同学们就能够比较自觉地带着问题学和活学活用了。

但是，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随着教学上一系列的改革，教师面对同学的机会多了，备课的时间少了，教学的难度大了，我的教学思想赶不上教改的新形势。教改以前，我们上课，都是一个人坐在“书斋”里备课，很少接触实际，也不习惯于解决实际问题。教改以后，每次上课，都面对着这么多的活思想，这么多的实际问题，怎样去解决？很显然，如果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教学任务的。在这样的困难面前，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

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①毛主席的话照亮了我的心，我想，我们现在才开始教学改革，在走着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很少有现成的经验可学，要做好工作，就应该象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一面教，一面学”，首先是要向我们教学小组的其他同志学习，也应该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备课、辅导、改作业、编资料，我都主动争取教学小组的同志们的帮助，同时也注意倾听和研究来自学生方面的教学意见，去年《毛泽东文艺思想》课之所以能比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就是我们教学小组的同志们和全体同学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

从《毛泽东文艺思想》课的教学实践中，我又深深的体会到：文艺理论课的教学，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引导同学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学和师生的思想改造、当前文艺斗争的任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过去文艺理论学习中的沉闷空气，使课堂充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教师和同学去开动思想机器，不断提高活学活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能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06页。

略論勤儉節約反对浪費

王 冕 农

我国的国民經济已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九六六年，是我国伟大的第三个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我們要努力爭取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农业、現代工业、現代国防和現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順利地实现这个宏伟的計劃，促进国民經济的新发展，必須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認真貫徹毛主席关于勤儉建国的指示，用革命精神厉行節約，反对浪費。

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教导我們：勤儉建国，勤儉办一切事业，是我党一貫的方針。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极大的犯罪。”①一九四三年毛主席指示：“在一切党政軍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費，禁止貪污。”②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毛主席又說：“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項工作时，必須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濫用和浪費。这不但是为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設新中国。”③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一九五五年毛主席教导說：“勤儉办工厂，勤儉办商店，勤儉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儉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儉的原則。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会主义經济的基本原則之一。”又說：“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節約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內，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計劃的时期內。”④一九五七年，毛主席說：“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經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節約、反对浪費这样一个勤儉建国的方針。”⑤几十年来，毛主席經常提醒我們要注意勤儉，反对浪費。而且把節約作为社会主义經济的基本原則之一，把浪費提到是极大的犯罪，把厉行節約，反对浪費作为勤儉建国的方針。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好各項事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9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4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2頁。

④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6頁。

⑤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36頁。

为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强调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呢？因为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是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宏伟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不能靠剥削本国人民；二不能靠掠夺殖民地，这都是帝国主义的罪恶行为；三不能靠借外债，依赖别人过活。唯一的办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凭全国人民辛勤劳动，利用本国丰富资源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自己积累。这就要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发扬“一厘钱”精神，做到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①必须保证一点一滴的国家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果。这样，才有可能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注意勤俭节约，大手大脚，滥用浪费，就会影响国家的建设速度，使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不能很快改变。所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一个战略性的方针问题。实践证明，凡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取得伟大成绩。如大庆和大寨，都是突出政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光辉榜样。大庆油田在开始建设时，客观条件十分困难。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以革命闯将的精神，战胜了一重重困难，攻克了一个个科学堡垒，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拿下了我国目前最大的油田，现已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型的石油基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大庆的道路，就是我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大寨大队原来的自然条件也是十分恶劣的，面对荒山秃岭、瘦土薄田，甚至在洪水冲垮了大部分房屋和庄稼，“人无住所畜无圈”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向国家要钱、要粮、要物资，而是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依靠集体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坚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搬掉了十几万立方米石块，筑起了百多条石坝，建起了“大寨式”的高产稳产农田，形成农业生产全面高涨和连续大跃进的局面。大寨的道路，也就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目前，全国出现许多大庆、大寨式的企业、大队和地区，都是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模范。广州市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突出政治，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结果。例如，在工业技术改造方面：一九六五年由于坚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少花钱，多办事，因而投资少，收效快，效果大。通过技术改造，挖掘了生产潜力，加强了薄弱环节，提高了生产技术装备水平，发展了资源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改善了生产条件和劳动条件；加速了工业生产建设的发展。技术改造后的企业每年增加的产值，相当于技术改造投资的九倍；增加的利润超过了全部技术改造投资；新增的出口产品，换回不少外汇。广州市在节约原材料、燃料、电力方面，采取了若干节约措施，也收到良好效果：煤炭，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9页。

年，通过改革炉灶，改进操作技术，降低煤耗，共节约了五十多万吨；木材，由于改进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出材率、利用率及积极提倡代用，去年头九个月节约了将近二万立方米；用电，各部门用降低消耗定额，压缩照明，错开班次等办法，去年仅九个月共节约了四千万度电。在开展废品的回收利用方面，也有一定效果，去年收购的废钢铁、次钢材就有几万吨，还有废橡胶、破布等几千吨，支援了生产建设。在劳动力方面，工交企业通过改革劳动组织，加强劳动力管理，压缩非生产人员，合理使用劳动力，节约了不少劳动力。在基本建设方面，大搞设计、施工革命，提高质量，降低造价，提高了投资效果，用同样的投资，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四年可多建几万平方米住宅。商业部门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也有不少节约。此外，在勤俭办企业方面，有不少企业贯彻了勤俭节约的原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成功乒乓球厂建厂时只有茅房几间，没有什么设备，没有什么技术，只有从别厂调来一个乒乓球试制小组。但他们坚持艰苦创业，资金不够从勤俭节约中积累，厂房不足自己盖，没有设备自己搞，几年来发展很快。劳动生产率一九六四年比一九六三年提高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五年又比上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产品成本比建厂初期降低百分之五十；乒乓球质量不断提高，去年十一月，在全国评比会上，被确定为向国家体委推荐的五种比赛用球之一。

当前，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还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国民经济的新发展，需要更多的建设资金，而且因为节约的潜力很大，只要认真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真正做到一丝不苟，精打细算，珍惜每分钱的使用，就可以从各方面节约出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使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广州市在工业生产方面，有些企业对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多，浪费大；设备利用率低；产品质量差、成本高；劳动力也有很大潜力。仅拿煤炭来说，目前许多企业燃烧煤炭后的煤渣，可燃物仍达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如果各行各业，将煤烧透，一年就可节约几万吨煤。在产品质量上，有些企业不注意好字当头，粗制滥造，这是最大的浪费。在基本建设方面，贪大贪洋的思想还没有彻底克服，有的项目规模过大，建设时间长，不能很快发挥效果；有的建筑结构不够经济合理；有的工业项目厂房标准过高。在商业方面，还有不少单位经营管理不善，流转环节多，积压损耗和浪费不少。以上情况说明，坚决贯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方针，制止一切浪费现象，对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建设有决定性的意义。

是勤俭节约，还是铺张浪费，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挂帅，还是以资产阶级思想挂帅，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勤俭朴素，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有了这种作风，在生产建设中就能顾大局，识大体，吃大苦，耐大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革命，斗志昂扬。就能不怕任何困难，顶得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勤俭办企业来说，例如广州氧化铁厂，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只有小型煅烧炉一座，瓦缸六个，水桶三对，厂房不到三百平方，生产方法十分落后，效率低，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销路很不好。但该厂突出政治依靠群

众，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精神，提出“越困难越要革命”的战斗口号。几年来，不仅改变了工厂的生产面貌，也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他们处处为国家着想，尽量少花钱，一九六零年上级根据生产需要，同意该厂购置空气压缩机，要一万多元，职工们为了节约国家资金，便自己动手，用旧汽车头改装，结果只花了四千元就改装了五台小型压缩机。一九六三年国家拨给该厂四万元扩大生产，他们却自己动手搞技术革命，结果一个钱也没有花，就使产量提高两倍多。他们不怕困难，敢于不断革命，几年来，针对生产上的关键问题，搞了四次重大改革，使产品的产量提高十二倍，质量达到国际上的先进水平，成本下降百分之六十五，销路甚畅，为国家积累了不少资金。因此，是否实行勤俭节约的原则，实质上就是要不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方向问题，而大少爷的大手大脚作风，是和这种精神根本对立的，它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沾染了这种作风，就不仅会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渐变质，而且还会使部分干部在政治思想上蜕化变质。因为严重浪费现象的产生，有的是由于求名求利，不择手段，不计工本；有的是由于大少爷作风，讲排场阔气；有的是由于工作极端不负责任，一懒二私，对个人“财产”斤斤计较，爱惜如命，对国家财产毫无热情。例如广州市针织行业有的人为了保持“质量”，追求名誉、奖金，不惜弄虚作假，将可以利用的次布掩藏起来，任由变质。可见，对国家财产的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是人的精神状态问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反映，是干部队伍中“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作风是和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截然对立的，是同总路线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人、改造人、兴无灭资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美帝国主义正疯狂地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把矛头指向我国，我们不仅要进行经济建设，还要做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不仅要保卫祖国，而且要坚决支援别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就可以增强国力，更有力地支援世界革命，更有利于随时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

如何具体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呢？

首先，要突出政治。必须深刻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大意义。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诸如：浪费“难免论”；浪费“合法论”；浪费“难反论”；浪费“例外论”；反浪费是小题大作等。坚持勤俭节约，既是经济革命，更是思想革命，只有提高认识，才能自觉地贯彻这一方针。

第二，广泛开展反浪费的斗争。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浪费如不彻底反掉，就谈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6页。

不上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必須放手發動群眾，大揭鋪張浪費的蓋子，挖思想根源，把浪費提到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來認識。同時，大力表揚和宣傳勤儉節約的好人好事，樹立標兵。通過反浪費，使廣大職工樹立勤勤懇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心為革命、一切為革命的人生觀；大整大改，挽回損失，堵塞浪費漏洞，解決好企業內部的管理問題。

第三，要有具體的要求。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就廣州的情況來說，當前主要抓好六個方面。一是以節約煤、電、木材為中心，全面开展原材料、燃料的節約代用；二是積極發展資源的綜合利用；三是挖掘潛力，充分利用閑置物資，加速資金周轉，騰出一部分資金、材料、設備用到生產建設上去；四是大力開展廢品回收利用工作；五是大力降低成本，減少商品流轉費用，減少事業行政費開支；六是降低建築標準，壓縮非生產建設規模。這几方面抓好了，就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力、物力、財力的作用，加速生產建設。

總之，貫徹勤儉建國方針，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关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資金積累，关系到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关系到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关系到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关系到增強國防和支援世界革命等重大問題。因此，我們要象大慶人、大寨人那樣，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堅定地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新發展，保證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

談談流动資金的節約

趙 桓

勤儉節約是社会主义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我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針。毛主席教導我們，要進行社会主义建設，必須貫徹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①。社会主义建設的領域是無限寬廣的，因而勤儉節約的門路也是無限多的，既有物化勞動的節約，又有活勞動的節約；既有生產資料的節約，又有生活資料的節約；既有使用價值的節約，又有資金的節約，等等。這裡僅就流动資金的節約問題，談談幾點粗淺的意見。

—

管好用好流动資金，合理地、節約地使用流动資金，對於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加速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

流动資金和固定資金一樣，是任何一個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所必不可少的資金。固定資金包括企業的廠房、機器、設備等勞動手段，它可以長期地在若干生產周期中發揮作用，它在生產過程中逐漸磨損，其價值也隨着磨損的程度，逐漸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流动資金是用于生產周轉和商品周轉的資金。工業企業的流动資金包括流动基金和流通基金兩部分。流动基金處於生產領域，包括原料、材料、燃料和在產品等，一般屬於勞動對象。流动基金只參加一個生產周期，它們在生產過程中全部被消耗，其價值也全部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流通基金處於流通領域，包括待售的產成品和準備用來購買原料、材料和支付工資的貨幣資金。商業企業的流动資金包括商品資金，包裝物品以及結算資金等，它是建立商品儲備，保證商品正常流通、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必要資金。隨着社会主义生產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國家每年都要增撥大量的流动資金。

在流动資金使用上，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一個重大問題。大家知道，我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資金，是根據勤儉建國、自力更生的方針，依靠企業內部積累來解決的。發展生產，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是社会主义內部積累的主要來源；而加速資金周轉，節約流动資金使用，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企業占用的流动資金，實質上都代表着一定的物資。浪費流动資金，就意味着浪費了物資，這就會增加國家財政支出，影響社會擴大再生產；反之，節約流动資金，也就意味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36頁。

着节约了物资，国家就可以利用原有的物资和资金来扩大生产、增加建设。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占用的流动资金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厉行节约，把浪费资金的现象彻底反掉，我们就可以拿出许多财力物力，更快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可以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更有成效地做好对付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更好地支援世界革命。

合理节约地使用资金，对于企业搞好生产，改善经营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党中央曾经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的根本方法”^①。企业在保证生产和流通需要的前提下，节约资金使用，加速资金周转，一方面可以促使改进劳动组织，节约原材料，合理地、均衡地组织生产，改善商品物资的采购、运输工作，及时组织产品销售和结算；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物资的采购和保管费用，减少利息支出，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相反，如果企业占用的流动资金超过生产周转的正常需要，或者是原材料储备过多，或者是产成品和在产品不能及时销售或利用，造成积压。这不但在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而且企业为了保管这部分积压物资还必须做许多维护工作，增加费用开支，如果保管不善，还要造成损失浪费。因此，认为流动资金多一些总比少一些好的观点，是不对的。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当前在企业的经营上，不少人由于个人主义的杂念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怪，不同程度上沾染上资产阶级的大少爷的坏作风、坏习惯，浪费国家财产，甚至有些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目的，任意糟蹋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浪费，影响国家的建设，因此，能不能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正确使用国家的资金，从根本来说，并不是什么技术问题和方法问题，而是对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对国家的资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因而是个立场问题，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具有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珍惜国家的每一分钱的资金，使它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高速度发展。

二

节约流动资金，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第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剷除了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而能够充分发挥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我国，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党所制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使我国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日益协调；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克服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这样也就完全消除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破坏和浪费。所有这些就给整个社会和企业最大限度地加速流动资金周转、节约流动资金使用，创造了客观的可能性。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载《新华月报》1954年第2号，第145页。

目前，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年年挖掘企业内部资金潜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就广东省的情况看，近年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使用情况虽然不断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流动资金占用仍然偏多，而且企业之间极不平衡，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比较大，除了有些企业严重糟蹋国家财产外，至于盲目采购，造成原材料大量积压；片面追求产值，不注意产品配套和产品质量，以至大量资金呆滞；在商业部门方面，商品不按经济区域流转，迂回运转，商品保管不善，霉坏损失；把流动资金挪用于计划外基本建设，或者随便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等等，更不是个别的现象。因此，当前节约流动资金的潜力是很大的，是大有可为的。正是由于这些事实的存在，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开展反浪费斗争，并要对企业单位的设备、材料和流动资金进行一次大清查，以便把闲置的设备、积压的材料和多余的资金清查出来，及时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去，这是当前增产节约运动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没有油水”的论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我们认为，节约资金的潜力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在一定条件下，就一个企业来说，潜力是有限的。但是从发展看，从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从整个社会看，潜力又是无限的。毛主席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①随着人们对流动资金周转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随着科学技术条件的不断改善，节约流动资金的潜力，就会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永无穷尽。我们不能超越客观的可能办事，但是，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下，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可以在同样条件下，创造出比较巨大的成就。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曾经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②只要我们正确认识这种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生产和流通的实际出发，采取一定措施，是可以把节约的潜力进一步挖掘出来的。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③为了管好用好流动资金，合理节约资金使用，必须从发展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出发，从解决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问题入手。

流动资金是为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的。流动资金的需要量，首先决定于生产规模和商品流通规模；在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商品流通规模下，则主要决定于流动资金周转的快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3页。

慢。通过加速資金周轉，可以相对地或绝对地节约流动資金：或者是在生产和商品流通任务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流动資金的占用；或者是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資金的情况下，更多地增加生产，扩大商品流通，做到多增产少增資，甚至增产不增資。因此，加速資金周轉对于节约流动資金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流动資金的周轉速度，仍然是取决于生产和流通的情况。馬克思說：“生产時間的延长，和流通時間的延长一样会减少周轉的速度。”^①反之，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的縮短，就能加速周轉的速度。所以要加速流动資金周轉，就要縮短生产時間和流通時間。

这从整个国民經济来看，最根本的就是要协调两大部类之間的比例关系，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順利实现。同时，还要合理布置生产力和按照經济区域合理組織商品流通，以减少不合理的运输，减少商品在途和原材料储备的时间，从而加速資金周轉。

从企业来说，为了縮短生产時間，加速生产过程中資金的周轉，就要合理地組織原材料供应工作，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方法，改善劳动組織，組織均衡、成套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为了縮短流通時間，加速流通过程中資金的周轉，工业企业就要不断改进产品的发送和运输工作，加强产品的銷售工作；商业部門就要正确执行国家政策，及时收购，积极推銷，合理設置商业网点，减少商品流轉环节，推动直达运输，并且正确組織結算工作，减少在途資金的占压等等。

总之，加强流动資金管理，合理分配和节约使用資金，有利于促进生产和商品流通，有利于国民經济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但是决定流动資金周轉的却是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情况，扩大再生产的順利实现是加速資金周轉的前提。毛主席曾經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經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經济。……忘記发展經济，忘記开辟財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問題的。”^②他又說：“县区党政工作人員在财政經济問題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稅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輕而易举。”^③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虽然說的是财政收支問題，但是对于流动資金的管理，也是完全适用的。我們在管理流动資金的工作中，絕不能孤立地在資金問題上打圈子，而必須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出发，从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問題入手。对于生产和流通上的合理需要，应该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保证給以满足；同时积极地改善企业經營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力求节约。这是管好流动資金首要的一条。

应当指出，衡量流动資金管理好坏的标志，要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設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而不是流动資金周轉的快慢。流动資金周轉的迟緩，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理的；周轉的加速，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和良現象。例如，商业部門不視市场需要，不管商品质量，盲目采购，造成商品庫存积压，資金呆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3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3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14頁。

滯，固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除了极个别商品的消费量达到饱和和点外，一般还是不足的，所以，总的来说是商品多比商品少好，应当在贯彻质量第一的原则下，努力增加商品储备。商品多了，就可以扩大基本建设，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家储备，这无论从政治、从生产、从建设、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从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来看，都是有利的，必要的。如果我们离开客观情况和政策要求，离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片面地从资金多少与周转快慢出发，认为要压缩商业库存，这就是完全错误的。

四

为了管好用好流动资金，进一步挖掘资金的潜力，必须突出政治，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家知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资金使用上的节约或浪费，首先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政治思想状况。因此，要挖掘资金潜力，必须首先清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加强勤俭节约的思想教育，从全局利益出发，互相协作，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把广大职工群众发动起来。这样，才能充分挖掘增产节约的潜力，有效地堵塞浪费的漏洞。

为了管好用好流动资金，加速周转，节约使用，必须加强计划管理，坚持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转，不能用于基本建设，以及流动资金的使用必须同物资运动相适应，不能随便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的原则。我们知道，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的性质和作用不同，是由国家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全面安排，有计划地加以分配的。如果把流动资金用来进行基本建设、增加固定资产，不但会使流动资金停滞起来，影响企业再生产顺利进行，甚至可能使生产和流通的某些环节发生中断现象；而且要影响基本建设物资的平衡，从而影响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顺利执行。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是资金运动与物资运动脱节，实际上是在计划外对国家物资和资金的分配，不但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节约使用资金，加强经济核算，而且影响国家资金和物资的平衡，造成市场上物资少，资金多的现象，不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加强流动资金管理，节约流动资金使用是一件大事情，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必须内外结合，把专业管理同群众参加管理密切结合起来。财政部门 and 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流动资金的主要职能部门，应当经常研究经济情况和资金周转情况，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合理分配流动资金，加强管理，并帮助和监督企业节约使用；但是流动资金是由工商企业使用的，因此管好用好流动资金的关键仍然在于企业本身。在企业内部，财务部门对管好流动资金负有重大责任，但是流动资金分布在各个部门各个角落，企业广大职工是流动资金的实际使用者，必须依靠群众，把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结合起来，实行统一集中下的资金分级分口管理制度，以充分发挥各个部门和广大职工群众在管理资金和节约资金使用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管好、用好流动资金。

邓望成生产队增产增收情况的分析

广东经济学会农村调查组

—

东莞县桥头公社桥头大队邓望成生产队，地处东莞东部，与惠阳、博罗县接邻，属丘陵地区。这里是东莞县的老灾区。全队有二十七户，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劳动力五十二个）。耕地二百一十一亩三分，其中水田一百一十一亩（有二十七亩是单造田），旱地八十九亩，自留地十一亩三分。解放前，这些耕地不是高旱的坑田、岡田、梯田、段田，就是受涝的低洼湖田和埔田，一个星期不下雨就成旱灾，下雨三天就汪洋一片。低洼的湖田和埔田更是十年九不收，往往是一年下几次种，插几次秧也没有收成。解放前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下，人们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饥寒交迫生活。许多农民在插完秧后就不得不出外做苦工，或到香港为资本家搬煤灰度日。遇上灾年，更是饿殍充途，流离失所。解放后和土改后，特别是合作化后，这里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但粮食亩产也只不过在五、六百斤左右。人民公社化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到一九六〇年，粮食亩产上升到八百二十斤，然而，生产仍然不够稳定，社员的实际收入水平还比较低。近年来，由于进一步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进一步贯彻党的“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不但粮食连年大幅度地增产，而且大幅度地增加收入，尤其是一九六五年出现了一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业生产全面高涨的新局面：粮食年亩产一千七百四十五斤，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八，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粮食不但能做到自供自给，每户有两个至四个月的余粮，而且每人全年还可以提供商品粮四百六十九斤（不算公粮）；一九六五年这个生产队生猪饲养量（包括公养、私养在内）达到一百六十一头，平均每户六头，每人一点三一头，每亩一点七四头。猪肉上市量一万零六百九十七斤（毛重计），平均每人八十七斤，每户三百九十三斤。劳动日值为一点二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百，每人平均分配二百零八元（收购农家肥收入算在内则为二百一十五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一，平均每户为九百九十五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五，收入最多的一户（贫农）达一千八百多元（一九六四年收入最多的一户是八百一十六元），全队所有农户都有结余（一九六四年有三户超支户）。如果加上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则更可观了；集体分配的生油每户二十多斤，社员平均每户有食糖二、三百斤。集体经济的

公共积累为五千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百零四。总之，这个队生产好，分配多，积累高，成为粮多、猪多、钱多、糖多的生产队，出现社员个个心向集体，人人干劲冲天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

邓望成生产队所以能够大幅度地增产增收，除了由于大搞水利建设，在技术改革上实行推广良种、大搞肥料、合理施肥、培育壮秧、学习潮汕先进经验等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外，在经济上采取了自力更生的办法，坚持勤俭办队，降低成本，正确贯彻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发展。现就该队增产增收的经济措施，谈谈他们的做法和经验。

(一)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降低生产成本。

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能否做到增产又增收，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总产量是否增加，二是生产成本是否比较低。实质上也就是如何用最少的耗费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来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这里先从生产成本方面进行考察。

邓望成生产队生产成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比較低的，一九六四年为二十六点六，一九六五年为十九点二三(农家肥不算在内)。生产成本所以比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坚决贯彻党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原则，特别突出的是破除依赖商品肥的思想，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劳动力(包括半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通过养、种、积、收等办法，大搞农家肥、自然肥来实现高产。在“养”的方面，最重要的是养猪，一九六三年生猪饲养量每户平均两头，一九六四年达到三点四头，一九六五年差不多翻了一翻，每户上升为六头。从一九六三年起，推行圈猪积肥，一九六五年全队收集的猪屎尿共二千多担。其次是养牛，一九六三年只有十二头牛，一九六五年差不多翻了两翻，达到三十二头。一九六五年共收牛屎尿约一千三百担。在“种”方面，一九六四年种了三十亩紫云英，共收九万三千多斤，一九六五年进一步扩大了种植面积，已种上七十多亩。在“积”方面，是积集土杂肥，一九六四年积了一万担，一九六五年共积二万二千多担，除大部分已投入生产外，尚库存八千多担。在“收”方面，根据按质论价的原则，以每担五角至一元的价格，收集家庭肥(即人粪尿、草木灰等)，一九六五年共收四百四十三担。由于农家肥、自然肥多了，商品肥的开支则相应减少了，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四年减少了八百一十六点三元的开支，商品肥开支在生产成本支出中的比重也从一九六四年的百分之四十七下降为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每亩水稻投放肥料的构成来看商品肥和农家肥、自然肥的比重变化。一九六五年每亩投放的肥料是：土杂肥一百五十担，猪屎尿七担，牛屎尿四担，家庭肥(包括人粪尿、草木灰)一担半，绿肥(紫云英)十一担，氮肥四十三斤(不包括秧地)，磷肥三十斤，氨水十二斤。每亩投放的肥料所含养分的比较如下面两表：

从下面两个表可以看出，每亩水稻投放的农家肥、自然肥与商品肥的比例，氮是三

点三比一，磷是四点一比一，钾是三十一比一，仅仅猪、牛粪尿和紫云英的投放就超过全部商品肥所含的氮量，而十一担紫云英的成本，不过是一元多，但四十三斤硫酸氨约值七元。土杂肥的投放更是数倍于商品肥所提供的全部养分，而土杂肥不过是多花一些劳动去积集而已。如果不是依靠自力更生精神，充分利用劳动力进行养、种、积、收，而购买同等养分的商品肥，每亩田仅氮肥一项起碼要多花三十多元的支出，而且对农业生产的作用还远沒有农家肥和自然肥好，这些有机肥使土壤松软，改进地力。如单纯使用化肥会使土壤板结，破坏地力，不利于农田的稳产高产。由此可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大搞农家肥自然肥等有机质肥料，并且使之经常化、制度化，这是发展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有效手段。

这个队降低生产成本的措施还反映在畜牧业以及其他各业的经营上。例如集体养猪，他们不购买商品饲料，而是依靠自力更生来解决。青饲料的来源主要是利用旱地种植各种饲料作物如萝卜、青菜、番薯等，一年四季均有供应，特别大搞冬种饲料，很解决问题。燃料的来源主要是利用甘蔗叶、禾草以及各种作物的枯藤。由于养猪的成本低，获利甚大，仅仅一九六五年养猪的纯收入就有三千多元，平均每人三十多元，集体和社员均增加了收入。

（二）开展多种经营，增产又增收。

这个生产队从一九六二年就注意了开展多种经营。经营项目包括种菜、花生、甘蔗、木薯、黄麻、沙葛、豆类、养猪、养牛、养鱼苗、养鹅、榨油、榨糖、做木、打铁、以及劳务活动等。多种经营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一九六二年占百分之七十点四，一九六三年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一九六四年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八，一九六五年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各年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数字看，多种经营的比重似乎是一年比一年低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它是逐年发展的。光就几种主要经济作物如木薯、甘蔗、花生、青菜的收入来看，一九六三年比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高，主要是受当时市场价格因素的影响，故收入比较大。如果按东莞一九六三年收购价格（牌价）计算，则其产值是逐年上升的：一九六三年为五千五百三十四元，一九六四年为七千四百三十一元，一九六五年为八千一百七十元。同时，后两年不但增加了新

每亩农家肥、自然肥的养分含量
(单位：斤)

项 目	氮(N)	磷(P ₂ O ₅)	钾(K ₂ O)
猪 屎 尿	3.5	2.45	2.8
牛 屎 尿	2.4	0.6	1.8
家 庭 肥	0.6	3.	7.5
紫 云 英	5.8	1.21	4.07
土 杂 肥	22.5	15.	15.
合 計	34.8	22.26	31.17

每亩商品肥的养分含量 (单位：斤)

项 目	氮(N)	磷(P ₂ O ₅)	钾(K ₂ O)
硫 酸 铵	8.6	—	—
过 磷 酸 钙	—	5.4	—
氨 水	2.	—	—
合 計	10.6	5.4	—

的經營項目，如种植青菜，而且价值較高的花生的种植面积、亩产和总产均比一九六三年大为提高。

再从畜牧业的收入来看，增长的幅度就更显著。如右表：

項 目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产 值 (元)	927	1793.58	4097.07	5399.91
比上 年增 长的 %	—	93.4	128.4	31.8

此外，漁业、副业等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仅一九六五年一年的收入就有六千七百八十二元。比收入較高的一九六二年还多三百四十五元。

多种經營一年比一年发展，为粮食生产提供了資金、畜力、肥料等，例如生产队的水电站就是在这段期間建起来的，它是促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大大增长，实现稳产高产的重要关键。畜牧业和油料作物(花生)的发展，又为粮食生产增加了大量的家畜肥和花生苗及餅肥。这样，不但农业内部比例更为合理，而且增加了收入。几年粮食增长情况如右表：

年 份	全年亩产	全 年 总 产	
		总 产 量	比上 年增 长的 %
1962年	924	86488	57.7
1963年	954	87567	2.4
1964年	1251	104614	19.5
1965年	1741	157790	50.8

可見，粮食生产和多种經營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离开了粮食这个“綱”来发展多种經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錯誤的，但当粮食生产有了相当发展以后，离开了“全面发展”来談“以粮为綱”是片面的。只有既抓好粮食生产，又抓好多种經營才能全面发展。当然多种經營是比較复杂的，它的发展与自然、地理、經濟以至历史等条件有一定的关系，但条件不是絕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人們对两者客观存在的辯証关系的認識，以及基于这种認識的行动。邓望成生产队的条件不算好，除了每人九分水田，八分旱地，和队里的四亩魚塘，几个光秃秃的小山头外，其他什么也沒有。所以問題不在于現成条件的好坏，而在于是否用辯証的观点来看待条件，敢于当革命的闖将，善于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坚决斗争，改造自然，使恶劣条件向好的方向轉化，使不利变成有利。毛主席早就教导我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資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来，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①这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員，听毛主席的話，坚持自力更生原則，發揮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下面，再进一步談談邓望成生产队是如何解决在开展多种經營中所碰到的几个問題：

第一、依靠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解决資金問題。

邓望成生产队在开展多种經營过程中，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資金的需要量与农业資金积累相对不足之間的矛盾，例如一九六三年仅仅經營捞养魚花，就需要一次付出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頁。

一千七百元来购买魚具，但一九六二年生产队全部的积累只有二千九百元，如果这项費用全部从公共积累中开支，則当年农业扩大再生产，特别是粮食的扩大再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們不是向国家伸手要钱，而是依靠广大社員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大寨精神，依靠他們穷干苦干实干巧干、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气概。生产队除了动员社員投資一百六十三元外，其余不足部分，則利用近一个月的农闲時間，組織三十多个劳动力出外搞劳务收入来解决。一九六四年为了解决公有私养的猪苗資金，組織三十多人到供销社干担石等工作，收入五百多元。此外还組織十多人到农械厂搞劳务，收入五百多元，作为偿还向該厂购买农具所欠下的借款，等等。这些經驗告訴我們，依靠群众的革命干劲来解决資金不足的困难，是一个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毛主席說：“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資金方面，国家应当給予农民以必要的援助，例如現在已經設立的貧农基金和其他貸款。但是資金的主要的大量的部分，还是应当依靠农民自己筹集。而这是完全可能的。”^①毛主席的指示，是集体經濟解决資金問題的根本方向，只要依靠群众，多想办法，象邓望成生产队那样做到长短結合，以短养长，資金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第二、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和利用自然資源。

种植各种經濟作物和飼料均需要土地，而粮食生产所占用的土地又要保證一定的数量，因此，如何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就成为能否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經營爭地的矛盾的重要环节。邓望成生产队解决这个矛盾的措施主要是大搞复种和輪种，其效果是相当显著的。例如有八亩二分高坑浅脚田，过去年亩产才四百多斤，一九六五年进行花生、水稻輪作，結果花生亩产三百五十五斤，水稻亩产也达到八百零四斤，不但多收了二千九百一十一斤花生，而且增收了三千三百多斤稻谷。同时，冬种大种飼料，发展青菜，解决畜牧业的需要，增加了收入。

在天然資源利用方面，除了利用瀘湖边的草地养牛外，还在附近东江河面捞养魚花。一九六三年生产队投放一千七百元資金，派出三个社員和別的生产队二个漁民合作，到东江去捞魚花，回来生产队的魚塘养殖，結果，不但很快收回了成本，而且获得不少盈利。仅一九六五年，这项純收入达二千八百八十二元，全队每人平均二十多元。从这里更說明了，大自然提供的資源是非常丰富的，它是开展多种經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加以充分利用，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是充分地合理地使用劳动力。

发展多种經營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事实上也只有发展多种經營才能使它得到更充分，更合理的利用。

如上所述，这个生产队的劳动力是不多的。但一九六五年的全年总工分却有二十一万二千八百多工分。总工分这么高，不是通过提高劳动日的工分量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挖掘劳动潜力来实现的。其办法是根据“农闲时大搞，农忙时小搞”的原則，把一些短期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35頁。

的多种经营项目安排在农闲季节,不与农忙季节争劳动力,使社员一年四季都有活可干。其次是利用社员的零星时间和广泛吸收各个家庭中的辅助劳动力,为集体经济创造财富,如公有私养二十六头猪,就得工分一万多。生产队三户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给他们干,如带小孩、晒谷等等,既减轻了生产队的负担,又使他们得到了一定数量的收入。一九六五年他们一共做了二千九百三十八分,年终结算时均有结余,其中一户结余四十六元多,另外两户各二十多元。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使集体和社员增加了收入。

下面,我们再从总工分的构成来看劳动力的安排,如下表:

项 目	工 分 量	占总工分的%	项 目	工 分 量	占总工分的%
粮 食 生 产	65667	30.86	林 业	6300	2.96
其中:自然肥	16365	7.7	劳 动 积 累	35345	16.62
经 济 作 物	46692	21.94	其中:水利建设①	11445	5.42
畜 牧 业	35001	16.44	基 本 建 设	23900	11.23
其中:养 猪	27301	12.8	干 部 补 助	2724	1.28
渔 业	6480	3.05	其 他	402	0.19
副 业	14193	6.66			

从劳动力的安排方面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内部的几个主要比例关系,即粮食生产直接用工与多种经营用工的比例是三十点九比五十一.一,粮食生产内部一般生产用工与“种”“积”自然肥、农家肥用工之比是二十三点二比七点七,粮食生产用工与养猪用工之比是三十点九比十二点八,生产用工与劳动积累用工之比是八十一.九比十六点六。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1)如果孤立地看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用工的比例,粮食生产所占的劳动量是少了一些,但如果联系其他因素来考虑,则不然,例如畜牧业生产用工百分之十六点四四主要是为粮食生产提供肥料的,经济作物中花生的生产也为粮食生产提供苗肥和饼肥,基建用工也有不少是直接为粮食生产服务的。这样粮食生产用工的比重实际上就不是百分之三十点九,而是百分之四、五十。看来,这种比例关系是比较能够体现党提出的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它既能保证相当大的用工投放于粮食生产,又能做到在粮食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后,使粮食生产的用工不会过多,以保证多种经营的发展。(2)邓望成生产队在水利接近过关和基本过关后,把夺取大量自然肥,尤其是把养猪、种绿肥作为保证农业稳产高产的战略措施来抓。表现在劳动力的安排上是投放了占总工分约百分之二十的劳动量(连养猪在内),相当于粮食生产一般用工的百分之六十多。从而增加了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收入水平,而且也为多种经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3)劳动积累方面,平均每人二百八十七工分,每个劳动力六百九十九工分,用工较大,将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相对减少后,就有相当部分可以转到当年生产用工方面来,加上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就能够

① 这里是参加公社水利建设用工。该队目前水利已基本过关,稳产高产农田占90%以上。

节省大量劳动力，用来发展粮食和多种经营，这样生产的发展就会更快了。

(三)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一般说来，社员收入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取决于生产，这是主要的，因为水涨船高，生产多了，分配才有可能多；二是取决于积累的多寡，一定的收入量，积累多了，分配就少；积累少了，分配就多，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过：“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①这是我们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根本原则。忽视积累而要分光、吃光当然是不对的，但片面强调扩大积累，而忽视社员的分配也是不对的，这会挫伤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壮大。这个生产队几年来在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是比较妥当的，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该队总收入、积累、分配的情况如右表：

项 目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总 收 入	35528.75	28582.1	24960.77	41924.67
积累占总收入%	8.16	10	5	11.7
社员分配占总收入%	68.6	58.14	57.6	63

四年中，积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均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一点七之间，社员分配则在百分之五十多至百分之六十多之间。从数字来看一九六五年积累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但如果从该队增收的幅度和数量来看，这是必要的、合理的，因为全年社员平均每人收入二百零八元，而一九六四年才一百零五元，比上年增长差不多一倍。总收入也增长约百分之六十，生产成本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六点多，因此，在满足了社员大幅度增加收入的前提下，适当把公共积累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十一点七，不论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壮大和社员积极性的发挥都是有好处的。正因为生产队既关心生产，又关心社员的生活，因此，社员越干越有味，越干越有劲。

(四)艰苦奋斗，勤俭办队。

艰苦奋斗，勤俭办队，是这个生产队能够大幅度地增产增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首先，一九六五年建七间猪舍，一间饲料房，除了必要的木料、水泥是买来的以外，其他全靠自己动手解决：泥砖是自己做的，石砖是拆坟墙得来的，从而节约了一千二百六十元的投资。其次表现在社员做到艰苦朴素，把积下来的钱投资于生产队，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中，社员投资共三千五百四十四元，占全队基建投资百分之十五。再次，表现在生产队的积累，大部分用于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生产性的基建投资共二万一千三百八十七元，非生产性的投资只有九百三十六元，占基本建设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二。最后，表现在管理费用比较低，管理费用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一九六二年是零点三一，一九六三年是零点五，一九六四年是零点八，一九六五年是零点四二，平均是零点五。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8页。

对《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必然一致嗎?》的商榷

萧 凡

項裕泰同志在《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必然一致嗎?》(《江汉学报》一九六三年第八期)一文中,不同意社会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必然相等的原理,认为在不等价交换的条件下,总价格与总价值就不可能相等;只有遵循馬克思关于个别商品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方法,才能发现二者相等的必然性;而且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时期才适用,到了垄断时期就不适用了。

我认为項裕泰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用不等价交换的例证,能否否定总价格与总价值必然相等的原理嗎?

項同志是以一个假设的不等价交换的例子来否定社会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必然相等的原理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分析一下他的例子是否妥当。其例如下:

“假设社会上有甲乙两堆商品。甲堆商品价值100亿元,价格被提高为150亿元;乙堆商品价值18亿元,价格被压低为150亿元。两者互相交换后,甲堆商品所有者多得到价值80亿元,乙堆商品所有者则损失价值80亿元,双方得失相等。然而社会总价值为280亿元,总价格却为300亿元。总价格比总价值高出20亿元。”(見《江汉学报》一九六三年第八期,第18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数。文中的重点,都是本文笔者加的,以下不再注明。)

这个例子,显然不是根据劳动价值学说的科学原理来假定的。

第一,把价值与价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并且混为一谈了。价值与价格不是一回事。价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价格是物质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①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毋庸赘述。但是,項裕泰同志在例子中却说:“价值100亿元”的商品,“价格被提高为150亿元,……”。人們要是問:“100亿元”的价值表现为多少价格?答:表现为“150亿元”。岂不成了笑话嗎?因为货币本身是没有价格的。100亿元就是100亿元,不会多一元,也不会少一元,更决不能表现为150亿元。如果項裕泰同志原意是想用这100亿元的概念(想像的货币),去表示某一种商品的价值时,那么,这100亿元并非就是該商品价值的本身,而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即是它的价格。如果由于物价上涨(上涨的原因可能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也可能是劳动生产率下降,供不应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0頁。

求等等因素，这里可以撇开不论。倒过来物价下降的诸种原因，也可以不论。）以致原来100亿元就能够买到的商品，现在要150亿元才能买到了。这150亿元也并非100亿元的价格，而是那个原来用100亿元能够买到的商品的新价格。即涨价后的价格。由此可见，项裕泰同志假设的例子中，不知价值是何物，一开始就把价格当成价值，把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并且混为一谈。实际上只有价格，没有价值，用价格去代替价值，价值就完全被取消了。应当指出，这是庸俗经济学家攻击、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时最经常使用的一个荒谬论据。而且早就被马克思所彻底粉碎了的。我们不能再以它作为论据来运用，去重复庸俗经济学家的错误。

第二，项裕泰同志在例子中，也把交换价值与价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并且混为一谈了。项同志是假设甲、乙两堆商品互相交换的。要知道，如果甲、乙两堆商品是直接相交换的话，那么无论它们是等价或不等价交换，都只有交换价值，而还没有产生价格这种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社会商品总价值与总交换价值相等，实质是同义语的反复，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项同志在假定甲、乙两堆商品直接交换的同时，又假定了它们的价格，而且在交换过程中发生了价格上涨和下降的变动。可见，甲乙两堆商品不是直接相交换的，而是以货币为媒介而进行交换的。然而，如果是以货币为媒介来进行交换，事情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商品的价值不是直接表现为交换价值了，（如果把货币算作是商品，那么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也可以叫做交换价值。）而是直接表现为货币名称，“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①可见，项裕泰同志把直接交换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等同起来并且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也就把交换价值与价格等同起来并且混为一谈了。

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明白，项裕泰同志假设的例子中所计算的总价值与总价格显然就是荒谬的。只不过是原来假设的甲、乙两堆商品的价格总和与后来假设价格变动后的价格总和不一致罢了，并非社会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的不一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项裕泰同志假设的例子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如果举例正确，用不等价交换的例子是否就可以推翻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的原理呢？同样是不行的。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也就不成其为科学的了。举例如下。

假设社会上有甲、乙两堆商品。甲堆商品价值为100单位小时，价格为100亿元；乙堆商品价值为180单位小时，价格为180亿元。在价格稳定，货币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待流通的商品总价值是280单位小时，待流通的商品总价格是280亿元。通过商品流通，两堆商品都按价值实现为货币了。这时，我们说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疑义。但是，在这种等价交换的场合，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即没有把货币算作商品，没有把货币的价格计算在社会商品总价格内，从而货币的交换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58页。

即其所包含的黄金量的价格，也没有计算在社会商品价格总额之内。因为在这种场合，计算与否都不会影响总价格与总价值的相等。同时，货币只是单纯地被当作流通手段来看待了。所以这种忽略就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如果在不等价交换的条件下，这种忽略，马上就会暴露出矛盾来。

现在假定，上例中原价格100亿元的甲堆商品，因涨价，卖得150亿元；原价格180亿元的乙堆商品，因落价，只卖得150亿元。那么，总价值不变，仍是280单位小时，但是实现为货币的总价格却增大为300亿元。比原来待实现的总价格增大了20亿元。这样，总价格与总价值是否就是不相等了？从表面来看，“280”不等于“300”，这是小学生的算术常识。但是，这里谈的不是算术的抽象数字。“280”这个数字是表明有280单位劳动小时所凝成的价值，“300”这个数字是表示价格300亿元，表示有“280”单位劳动小时的商品价值实现为300亿元的货币。我们知道，280单位小时的价值量，究竟表现为多少货币量，是一个与本题无关紧要的事。它可以表现为280亿元，也可以表现为300亿元，也可以表现为1000亿元等等。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总价格与总价值的相等理解为数目字上的相等。

现在困难的问题在于原来甲、乙两堆商品的总价值表现为280亿元的总价格，现在因为价格发生变动，价值总额不变，价格总额却增大为300亿元了。在这种场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总价格与总价值仍然相等呢？马克思在《评瓦格纳“经济学教程”》中，批驳谢夫勒用谷物价格因歉收而提高的例子来否定劳动价值学说时，就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谷物歉收，谷物价格提高时，第一它的价值会提高，因为一个定量的劳动，实现在较少的生产物内；其次，它的售卖价格更是会提高。但这与我的价值学说有什么关系呢？谷物越是在它的价值以上售卖，别的商品便会在它的自然形态或货币形态上，依相同的程度，越是在它的价值以下售卖，就令它们的货币价格不下落。价值总额依然不变，虽然这个价值总额用货币来表现，已经增大，……情形会是这样，只要我们假设其余各种商品的总额的价格下落，不曾把谷物的价值以上的价格，即价格提高，抵消掉。但在这个场合，货币的交换价值，会同样跌在它的价值以下；所以，不仅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额依然不变，甚至在货币表现上，它也是依然不变，只要货币也被算在商品里面。”^①（重点号是笔者加的）从马克思的这一精辟透彻的分析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第一，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提高，别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依相同的程度下降。这一点恰恰是项裕泰同志所不理解和坚决否定的。（参阅第22页。）只看到个别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经过一定时期，可以均衡一致，而否定个别商品的价格提高，别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依相同的程度下降，其原因就在于在项裕泰同志的头脑中只承认有想像的货币，没有真实的金銀货币。所以他想像的商品价格（想像的货币）可以任意涨落，但真实的金銀价格（现实的货币）却丢掉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的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5—1016页。

最明白不过了。“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提供的不足或需求的剧增而大大提高起来，那末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降低下去，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在货币上表现出其他各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例。假如——举例说——一尺丝織品的价格从五馬克提高到六馬克，那末銀子的价格对于絲織品来讲就降低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如此，它們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絲織品来却都降低了价格。这时若要交换到原来那么多的絲織品，就必须拿出較多的商品。”^①第二，如果假定别的商品的价格不下降，或者下降的价格不能抵消那种商品已經提高的价格时，在这种场合，价格总额增大了，但是，如果把货币也算在商品里面，那么，实际上就是意味着货币的交换价值下降，即黄金价格下降了；因此，第三，如果把货币也算在商品里面，商品的价值总额不变，它的货币表现，即价格总额也不变。也就是说总价格与总价值仍然相等。

根据这三点，回过头来再看我們上面假设的不等价交换的例子，就非常清楚了。社会上除甲、乙两堆商品之外，实际上还有第三堆商品黄金货币。比如說是180万两，价值是180单位小时，价格是180亿元货币。这样，社会商品的总价值是 $100 + 180 + 180 = 460$ 单位小时，社会商品的总价格是 $100\text{亿元} + 180\text{亿元} + 180\text{亿元} = 460\text{亿元}$ 。当甲堆商品价格提高到150亿元，乙堆商品价格下降到150亿元时，下降的价格(30亿元)不能抵消掉提高的价格(50亿元)，物价总额增大了20亿元。这时就意味着180万两的黄金价格下降了，从180亿元下降为160亿元。因此总价格的构成就变为 $150\text{亿元} + 150\text{亿元} + 160\text{亿元} = 460\text{亿元}$ 。即总价值不变，它在货币的表现上——总价格也依然不变。也就是说总价格与总价值仍然相等。

二、不能把个别商品价格，以价值为中心，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波动的原理，和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的原理混为一谈。

項裕泰同志一方面用不等价交换的例子，論証总价格与总价值沒有“自然一致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說“它們自然一致的必然性也是存在着的。”怎样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呢？項裕泰同志告訴我們：“只有遵循馬克思关于个别商品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方法，才能发现这种必然性。”(第21页)同时，他还要我們注意：“馬克思从未以社会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的相等来論証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性，从而推論价值規律的存在。”(第18页)

首先，应当指出，馬克思确实从未以社会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的相等来論証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性，从而推論价值規律的存在。但是也决不能反轉过来说馬克思是遵循个别商品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方法来論証总价格与总价值的一致性，从而推論价值規律的存在。

价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客观規律，如果认为它是馬克思根据某种假定的方法推論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把馬克思的价值学說歪曲成为主观臆造出来的。显然，这种看法是錯誤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3頁。

其实，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的原理，以及个别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涨落的原理，是两个不同的原理，不能混为一谈。既不能用前一个原理去推论后一个原理，也不能用后一个原理去推论前一个原理。项裕泰同志引证马克思关于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涨落，互相补偿，均衡一致的论述，从而推论“因此全部商品的总价格也可以经过一定时期，大体上均衡为商品的总价值。”（第22页）实际上就是把两个不同的原理混为一谈了。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只存在个别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涨落，互相补偿，均衡一致的矛盾运动，根本就不存在“商品总价格与总价值从经常不一致到平均一致的矛盾运动”。这是因为总价值与总价格这两个概念，只是把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个别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理论概括。当然，这种理论概括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有重大的理论上的抽象意义。它把资本主义现实中千百万种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价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抽象化。使人们从整体上一眼就能看清楚价格只不过是价值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马克思虽然未曾从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的原理去论证商品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性，但是，它为运用劳动价值学说去论证商品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性，论证平均利润规律不否定价值规律等等，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所以，就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的原理来说，它不是对那一个部门，那一类商品，那一个时候的商品来说的。而是把社会一切生产部门，当作一个总体来看，从而把社会一切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一切商品价值的总和，看作是一个价值——总价值，从而也就把一切商品的价格总和，看作是一个价格——总价格。总价格是总价值的货币形态。所以，总价格无论是多少，都只是总价值的货币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价格与总价值的相等是必然的。

其次，从商品总价格与个别商品的价格的关系来看，总价格是由各个别商品价格的总和而形成，但是，各个别商品价格的形成，却与总价格完全无关。它是由它的价值决定，由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形成。因此，无论个别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动，都只能改变某一时期的流通过程中待流通的商品（不包括货币商品）价格总额，但从一定时期的最终结局来看，全体商品的价格总和只有一个。这个价格总和，当然就是全体商品的价值总和的货币表现。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总价格与总价值必然相等的原理。

至于总价格与总价值相等的原理是否只适用于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时期问题，学术界已有人作过分析、批评。这里，不必多谈了。

政治和艺术的統一

樓 栖

一

一年来革命現代戏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不少新的課題。例如，怎样把工农兵英雄形象塑造得更为真实鮮明，生动高大，怎样把政治和艺术統一得更为有血有肉，完美和諧。值得我們进一步加以探索，以便把革命現代戏向前推进一步。

革命現代戏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革命性，革命性是革命現代戏的灵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原則。随着革命现实的飞跃发展以及文艺实践的不断深入，这个根本原則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深刻內容。

前次中南戏剧汇演时，舞台上塑造的許多工农兵英雄形象，其中最能激动人心的，都是在于它們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把现实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如《英雄工兵》、《电閃雷鸣》、《人欢马叫》、《朝阳》以及其他一些优秀剧目，对现实內容揭示得比較生动和深刻，給人的印象也比較强烈和鮮明。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现实斗争各个方面是十分复杂丰富而又生动活泼的，它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人物间的性格矛盾冲突而构成的。戏剧中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体现了现实中的矛盾和斗争。把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典型化，就是把现实斗争的內容作了具体、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概括。这样揭示现实斗争的內容，艺术才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二

文艺为政治服务，不仅在于表现什么样的事件和人物，而且在于怎样表现这些事件和人物。表现什么样的生活现象，站在什么立场、观点对待問題，怎样提出生活矛盾和解决矛盾，总要体现一定的政治內容，不論它是直接的还是間接的。现实生活总是錯綜复杂的，而錯綜复杂的生活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来评价，如果理解錯了，评价錯了，那是由于認識錯誤或受錯誤的政治观点所指导的結果。

艺术形象中的观点往往是含蓄的、曲折的、隱蔽的，恩格斯早已說过：“作者的观点愈隱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些。”（《給馬尔加丽塔·哈克納斯的信》）因为形象本身具有生动的說服力，作者的观点可以不必出头露面。許多优秀作品証明，艺术形象給塑造得越具体、越鮮明，作者的观点也往往越隱蔽。这样可以讓讀者从形象中去得出自然的結

論，以便更好地發揮藝術的感染力量。

可是，反映複雜生活的藝術形象往往也是複雜的，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某些比較複雜的人民內部矛盾，有時的確不容易處理。有些同志覺得沒有把握，沒有信心，因而有意迴避，不敢碰它，而選取另一條較為輕便的道路。或者不敢揭露矛盾，內容四平八穩；或者按照政策圖解生活，人物很簡單，情節不生動。說理多，行動少，對話多，生活少。形象不鮮明，觀點很突出；但它往往不能給人留下什麼印象。幕落了，戲完了，曲終人不見，再也沒有發人深思的東西。有人認為，這樣的戲是“政治上的成功，藝術上的失敗”。問題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一出戲正如一篇文藝作品一樣，包含三種元素：生活、思想和藝術。生活賦給它以血肉，思想賦給它以靈魂，藝術賦給它以形象。這三種元素在一出好戲里融化成渾然的一體。如果把它分成內容和形式兩部分，那麼，生活、思想是內容，藝術表現是形式。革命文藝作品要求“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正的藝術品是一個有血肉、有靈魂的完整形象。政治內容如果不體現在丰满的生活血肉里，具體說來，如果生活內容顯得空虛，矛盾沒有充分揭露，人物性格不夠突出；那麼，政治內容必然顯得蒼白無力，革命思想也缺乏動人的光采。革命文藝的政治性是以反映鬥爭生活的真實性和具體性為血肉的。沒有鬥爭生活的真實性和具體性，就不可能充分表現革命文藝的政治性。架空的政治性只是公式、概念，沒有感染人的力量。

現實中的鬥爭生活總是具體而生動的，革命現代戲的反映生活，不僅要求真實、具體，而且要求生動活潑。舞台經驗證明，一個熟悉鬥爭生活的優秀演員和一個缺乏生活經驗的普通演員扮演同一角色，效果很不相同。如果沒有生動的表演，就沒有藝術的創造，也不能真實的反映生活。藝術真實要以生活真實為基礎，在生活基礎上加工提煉，才能創造藝術真實。藝術真實來源於生活真實，却又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集中，也更有感染力。因此，革命現代戲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應該是完全一致的。真實性不僅是政治性的要求，同時也是藝術性的要求。生活反映得有血有肉，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矛盾衝突的發人深思，英雄人物的精神風采，情節開展的生動逼真，就能充分體現生動活潑的政治內容，從而激動觀眾的心靈，發揮藝術的感染力量。如果藝術上失敗了，政治不落實，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藝術上失敗、政治上成功的論點是站不住的。因為它把政治和藝術分割開來，可能導致以政治代替藝術的錯誤結論。而“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滿足於正確的政治觀點而忽視藝術表現的做法，必然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三

革命現代戲要求“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但這樣不等於說，我們都能達到這種統一。只重視政治而輕視藝術的藝術實踐，不可能導致兩者的統

一，而只能导致两者的分离，因此它是錯誤的。认为可以有“政治上的成功，艺术上的失敗”的作品，这不是辯証的观点，而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文艺作品中的政治是具体的政治，是統帥而又渗透到艺术形象中的政治，正如艺术是从属于政治的艺术，是从具体生活中体现政治观点的艺术。資產階級所宣揚的艺术至上論、艺术与政治无关論，以及修正主义者所宣揚的艺术即政治的謬論，大家都知道它們的虛偽性和反动性。如果反过来，只重視政治而輕視艺术，那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表面看来，它仿佛很重視政治，但在实质上却还是輕視政治。因为既然輕視艺术，政治不能統帥艺术，不能在艺术中起到应起的作用，政治也就落空了。

政治是統帥、是灵魂。它指导一切人的具体活动，是促使人們行动的动力。一个人对现实斗争的态度，以及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关系，总有一定的原則，一定的观点。在文艺作品中，这种观点表现得特別明确。例如爱情关系的处理，从表面上看，这是私人生活的小节，不一定会牵涉到政治原則吧；但《英雄工兵》中的丁战和高翔，《針鋒相对》中的江少虹和宋常华，《杏花营》中的小男和春牛，《百炼成鋼》中的小兰和洪新，《一笔貸款》中的玉英和云山，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同志关系来处理爱情关系，必要时能坚持原則，展开斗争。这些爱情关系都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内容。至于《彩虹》中的彩虹和胡标，夫妇間展开一场激烈尖銳的生死搏斗，其体现的政治内容就更不用說了。如果把爱情关系处理成为追求个人幸福、儿女私情，談情說爱，纏綿悱惻，甚至毫无原則，喪失立场，而且贊美它，不批判它，那就表现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傾向和立场观点，从而体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内容。

文艺作品中的政治内容，有时以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如阶级斗争或其他較為重大的题材；有时却以間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日常生活或較為普通的题材。有些文艺作品以政治内容代替生活内容，政治性似乎很强烈，但生活味很淡薄。从表面上来看，仿佛政治灵魂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直接出头露面，說教宣传；可是，灵魂沒有血肉的依附，变成沒有軀体的游魂，因而喪失了它的生命力。灵魂只能指导行动，而不能代替行动，正如政治只能統帥艺术，而不能代替艺术。反过来说，任何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受一定的政治思想所指导的，因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在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人們的具体活动总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和阶级斗争相联系的。不受一定的政治思想指导的行动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有的。問題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政治思想。正如在阶级社会中的艺术永远是从属于政治的艺术，不可能有超阶级的艺术。

四

戏剧界有一个常用的術語，某出戏里沒有戏。也許是由于内容太平淡，情节不动人，也許是由于主题不集中，矛盾不尖銳，也許还有其他別的原因。戏里的人物一登场，大致就能預料它的发展和結局。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处理不够完美，更主要的是由于

生活深度揭示得不够，思想深度挖掘得不够。形象不高大，性格不动人，很难閃耀出人物的思想光采。一般說来，反映敌我矛盾的题材，对立面鮮明，斗争复杂尖銳，在艺术处理上經驗比較丰富，情况比較好些。因为矛盾可以充分揭露，冲突可以尽情开展。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题材，往往由于作者的經驗不足和思想顾虑較多，处理起来較为棘手，例如担心矛盾冲突过了綫，走了火，违反政策，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等等。有时只好迴避矛盾，沒有冲突；或者矛盾来得容易，解决得更容易，只抓到一些表面的生活現象，不敢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例如某些思想問題不能解决时，让支部書記出场，三言兩語就解决了矛盾。这在实质上是政治性不强，革命性不高的一种表现。因为作者对斗争生活深入不够，理解得更不够，处理起来才会患得患失，顾虑重重。这是沒有突出政治的結果。政治不挂帅，政治变成貼标签，那不是突出政治，而是貶低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十分复杂細致的，言教身教，具体深入。象焦裕祿同志的光輝事迹，有感人肺腑的伟大力量。这是問題的一个方面。可是，問題还有另一方面。离开深刻的生活矛盾冲突去追求艺术性(即所謂“戏”)，去追求戏剧效果，那是舍本逐末，有时会适得其反。因为政治統帅艺术，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处理的所謂“戏”，是生活集中的概括。为“戏”而“戏”，实质上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問題往往从这里产生，錯誤的政治观点就可能从这里渗透进来。問題很明显，不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就会給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敞开方便之門。处理工作問題是这样，处理艺术問題更是这样。

戏剧的反映生活，有它自己的特点，它要受到舞台的限制，演出时间的限制，人物不能太多，场幕不能太多。因此，主题要求更集中，性格要求更突出，情节要求更紧凑，意义要求更深刻。戏剧的艺术性在这里，“戏”的意义也在这里。

五

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到处大学解放軍，突出政治，已經成为我們社会生活的特点。工业战綫学大庆，农业战綫学大寨，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鋒，学习王杰，学习焦裕祿，处处有标兵，有样板，先进人物，风起云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深入渗透到现实生活里，成为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阶级教育，一抓就灵，突出政治，成績显著。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不論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两种思想的矛盾，都有复杂丰富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具体，越深入，越曲折，越細致，政治思想工作也越来越生动活泼，具体而微。现实生活給革命現代戏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广阔题材，值得戏剧工作者深入开掘。要把现实生活揭示得深刻，人物形象塑造得鮮明，就得从各项具体工作中，从日常生活中，深刻理解突出政治的意义，才能正确反映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第一，劳动人民改天換地的雄心壮志、革命豪情是革命现实的主流。怎样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以生动优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时代精神，关键在于戏剧工作者是否和工农兵相結合，对时代精神是否有深刻的

感受，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斗争生活时是否能高瞻远瞩。部队剧团和农村演出队以及工农兵的业余创作较能表现出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特点，即使处理日常生活的题材，也较能突出它的政治意义；生活气息相当浓郁，细节真实鲜明，很能发人深思。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往往显得完美和谐。

现实中的先进人物，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都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往往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艰苦钻研，心灵手巧，助人为乐，道德高尚，胸襟开扩，志大才高。这些先进人物，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生活道路，也有不同的精神风采和个性特点。把这些先进人物加以典型化，就可以把政治和艺术统一起来。因此，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是政治和艺术统一的一条正确途径。

政治和艺术的统一，不仅是革命现代戏的要求，同时也是革命现实发展的要求，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者的统一，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但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通过深入的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问题将会逐步获得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政治内容将会饱和着生活血肉，和艺术形象融成浑然的一体，闪耀出动人的光彩。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革命现代戏也将不断的向前迈进，走向无限广阔的前途。

评李渔的戏曲理论

黄海章

李渔(一六一一——一六七九?)号笠翁,浙江兰谿人,为清初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和作家。对剧本的创作和演出,都有丰富的经验。著有《笠翁十种曲》^①其戏曲理论,见于《闲情偶寄》^②中,颇有精到的见解,同时也包含着不少的错误。

他的戏曲理论的优点是:

(一)总结前人的经验,充分阐扬“本色”的论点。

明人论剧,极重“本色”。徐渭以为:“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僮妇女皆喻,乃为得体。《香囊》^③如教坊雷大使之舞,终非本色。”(见《南词叙录》)臧懋循之论元曲,亦以为行家胜于名家。“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有。能使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飞。名家者,出入乐府,文采烂然,在淹通宏博之士,皆优为之。”(见《元曲选序》)黄周星更为干脆地说:“曲之体无它,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经,多发天然’而已!制曲之诀无它,不过四字尽之,曰:‘雅俗共赏’而已!论曲之妙,无它,不过三字尽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怒则欲杀欲割,生趣勃勃,生气凛凛之谓也。”(见《制曲枝语》)

从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来,其注重本色可见。笠翁对这个论点,充分加以发扬。他说:

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鄙,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语,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以上所引,见《闲情偶寄》。下面引文,俱出同书。)

戏曲所以要崇尚“本色”的原因,主要是在能感染观众,收到演出的效果。词采愈典雅,和观众形成愈远的距离,演出的效果,就微不足道了!笠翁阐扬明人“本色”的理论,

① 《十种曲》为:《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意中缘》、《玉搔头》。

② 《闲情偶寄》,内容包括戏曲、建筑、园艺、烹饪等。其戏曲理论部分,分词曲部和演习部。对戏剧的结构、音律、对白、表演、歌唱等问题,都有所论述。

③ 《香囊》,为邵宏谥所作。止工修词。

強調面对观众，強調演出，这是他突出的所在。

再从他对金圣叹批評《西廂》的意見，更可看出他的主旨。他說：“圣叹之評《西廂》，乃文人把玩之《西廂》，非优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圣叹既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文人把玩的《西廂》，止求文詞的美丽，但止可供案头的欣賞，而不适合于舞台的演出。优人搬弄的《西廂》，則須用浅显的曲詞，參以极有风趣的宾白，和諧适的音乐配合起来，才能感染观众。这其間有很大的区分。笠翁着重“演出”，也就显然可見了。他形容演出的效果說：“如其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絕，即使鼓板不动，场上寂然，而观者叫絕之声，反能震动天地。”可謂生动逼真。

(二)他認識到戏剧結構的重要性。而在結構当中，尤在“立主脑”、“减头緒”、“密針綫。”換句話說，是在突出主题，删除枝节，前后各节，取得紧密的联系。他以为一本戏中，人物虽多，情节虽众，然作者用意，“止为一人而設，止为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如一部《琵琶記》，止为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为重婚牛府一事。如果戏曲失却了中心，主角配角不分，主要的事件和附从的事件攪做一团，則“如断綫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緒，观者寂然无声”，戏剧的演出，也就完全失败了。

“减头緒”和“立主脑”，是紧密地联系着的。因为尽量减少头緒，便可使主要的人物事件，更加突出鮮明。他以为荆(《荆釵記》)刘(《白兔記》)拜(《拜月亭》)杀(《杀狗劝夫》)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綫到底，“始終无二事，貫串只一人”。使三尺童子看后，剧情都能了了。如果不讲根源，单筹枝节，关目过多，角色过繁，必至宾主混淆，綫索紛乱。写剧本的人，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密針綫”是要前后折互相照映埋伏，不惟人物事件发展的过程，不会发生矛盾，而且步步相銜，节节相生，使观众脑子里头有一条清楚的綫索，剧情了了，观者的印象，也随之深刻起来，这也是結構严整的一种表現。

(三)他认为戏剧要能逼真地刻划出人物的心理，和运用适当的語言，来表达人物的身份。

他举《琵琶記·中秋賞月》一折为例：

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悅；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说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说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两人之语，犹不可挪移混用，况他人乎？

牛氏、伯喈，由于心中对月亮的感受，各有不同，所以悲欢异致，丝毫移易不得。

笠翁又說：“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說张三要象张三，难通融于李四”。也是同样的意思。

至于語言的运用，随角色的身份而不同。如：在花面口中，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須斟酌其辞。“……以生旦有生旦之体，淨丑有淨丑之腔故也”。总之，“說

何人，肖何人；說某事，肖某事”。

我們知道，《紅樓夢》中的薛蟠，決不能為文謫諷的語言，而賈寶玉，也決不能說出一派粗話。小說中的人物語言如此，戲劇也是如此。

(四)他矯正過去偏重詞曲的傾向，提出賓白的重要性。以為：“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賓白。”戲曲由於說白的工妙，能使劇情活躍，聽眾神飛，加強了不少演出的效果。

此外如說：“凡作傳奇只當求於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是教作劇者要在現實中發掘題材。又認為：“古人呼劇本為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即奇之別名也”。是教作劇者要破除因襲，刻意創新。從原則上說，也是對的。

以上是笠翁論戲曲的優點。下面且指出他的錯誤。

笠翁論劇，有一個最根本的錯誤，是對於戲劇的嚴肅社會意義，不能有明確的認識。以為它的目的，是在“消愁”；它的功用，是在“為聖天子粉飾太平”；此外便沒有什麼了。他平生最反對悲劇的排演。如《風箏誤》下場詩說：

傳奇原為消愁設，費盡杖頭歌一闋。何為將錢買哭聲，反因變喜成悲咽！惟我填詞不賣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

《與韓子蘧書》也說：

大約弟之詩文雜著，皆屬笑資。以後向坊人購書，但有展卷數行而頗不疾解者，即屬贗本。

可見他以為戲劇創造的目的，是在消愁；是在使人發笑。他所以不贊同悲劇，因為要賺人眼淚。觀眾花錢而買得哭聲，亦復何苦。他的《十種曲》，全屬於喜劇的範圍，就是要逗得人們哈哈大笑，和彌勒佛一樣。假如戲劇的目的真是這樣，豈非淺薄無聊！我們知道，悲劇的意義，是很嚴肅的。劇中的正面人物，為實現他偉大的社會理想，和周圍腐惡的勢力，作劇烈的鬥爭，最後犧牲生命，也在所不顧。它雖然以悲劇終場，然而使人們對他所付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獲得深深的感受，覺得劇中人未完的事業，還要靠後來者繼續不斷地鬥爭，才有實現的希望。它在群眾中起了絕大的鼓舞作用，並不是徒然“將錢買哭聲”而已！說到喜劇的內容也富有深刻的諷刺意義。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痛哭”。如果使人看了發笑，便算了事，豈非抹煞了喜劇的社會意義。笠翁在《論結構》第一項，標明是：“戒諷刺”，誠然，他的意思是指作傳奇的，不要存心刻薄，借此來為私人“報仇雪怨”，然而通過喜劇來對腐惡的政治，殘酷剝削的統治者，以及社會上諸種不合理的現象，來進行諷刺，才具有偉大的內容。笠翁對此，不但毫無認識，而且以諷刺為大戒。用這樣的眼光來評論喜劇，也就非常可笑了！

他談到自己的劇作，以為是：“借三寸枯管，為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佛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笠翁文集》）戲劇最大的功用，既然在“為聖天子粉飾太平”，那麼，不管政治上亂得一團糟，老百姓如何遭受踐踏，也須得粉飾一下，才不辜負聖天子的期

望！笠翁所处的时代，是明清交替的时代。那时民族矛盾，极其尖锐，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笠翁对清王朝之大量屠杀汉民族，（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惟不感到愤慨，不但不起来斗争，而且要为入关的圣天子输其赤胆忠心，为他来“粉饰太平”，真是一点民族意识也没有了！和他同时的黄宗羲、顾亭林，他们的民族气节，固然是笠翁所不敢望；即如吴梅村出仕清王朝，他所作《通天台》、《秣陵春》，也还流露出许多故国兴亡之感。而在笠翁所作戏曲中，却连一些儿影子也没有！也只好作一个新的封建统治者的帮闲文人，携着家妓，奔走排演，企图博得王公贵人的欢笑了！

谈到“木铎里巷”，似乎作者也认识到戏剧教育群众的伟大意义，其实不过用它来宣扬圣天子功德巍巍，能使老百姓过着太平的日子，要他们做贴贴服服的奴才。这种教育，也不过奴才的教育吧了！笠翁对戏剧本质的认识，既然如此，尽管他对戏剧的主题、结构、人物心理的刻画、语言的运用等等一套理论，比较明人完密而有系统，也不能掩盖他认识上重大的错误。这一点是以前研究他的戏剧理论的人，所没有充分注意到的。

至于戏剧的题材，应该由现实中去吸取，原则上固然无可非议，然而他所取材于现实的，都是社会上琐碎的事实。从他的作品中，既不能看出当时民族斗争的真相；也不能看出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什么暴露和讽刺。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典型意义。

说到戏剧求新求奇，虽然可以不落窠臼，但也要看它所谓新奇的内容是什么？他的《十种曲》，最著名的是《风筝误》，演出的次数也最多，直到解放后，还是不断地上演。但是除了以情节巧合见奇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内容！这样表现“才子佳人”的戏剧，在今天已无存在的必要了。我们对笠翁戏曲理论重大错误的所在，应该提出来，加以严格的批判，不要和过去一样，一味替他捧场。



从分配工作中体会到的 一些问题

孙 孺

如何面向农村、深入农村，研究农村经济，为五亿农民服务，是每个经济理论工作者面临着的新任务、新课题。许多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经过这段期间的实践，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要做好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工作，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到农民群众中去，投身于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学习、研究广大农民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提出来的许多新问题。最近，我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个问题的体会也同样比过去深刻了。的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到农村去是大有可为的。当然，农村经济问题相当复杂，需要我们研究的方面是很多的，而且也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能得出理论的概括。这里，只就参与秋收分配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谈谈初步的体会和提出一些问题。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问题，毛泽

东同志早就指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①在秋收分配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使增产的生产队，保证社员个人能够增加收入。

我所在的大队，属阳春县三甲公社，叫曲岡大队。三甲公社地处山区，粮食生产情况不很差，但社员的收入水平比较低。曲岡大队在公社最南部的丘陵地带，粮食生产和收入水平是全公社中比较低的。全大队有二十九个生产队，五百一十五户，二千一百六十三人（按参加分配人口计算），耕地面积三千一百九十八亩，其中水田二千三百多亩。近几年来，粮食年年增产，社员的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其分配情况如下表：

项目 年份	粮食(稻谷)分配情况			现金分配情况			
	总产量 (万斤)	亩产 (斤)	每人每月平均口粮 (斤)	可分配总金额 (元)	占总收入的%	劳动日值 (元)	平均全年每人分配 (元)
1963	137.33	620	30	94,955	58	0.41	46
1964	153.50	692	35	91,832	48.7	0.37	45
1965	161.35	716	35.6	110,866	56	0.42	51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8页。

这个大队的稻谷生产，从亩产量看：三年来增长了百分之十五点四，一九六五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二；从总产量看：三年来增长了百分之十七点五，一九六五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一。社员从集体得到的现金分配，三年来增长了百分之十点八，一九六五年比一九五七年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基本上是增产增收的大队。但从二十九个生产队分别来看，今年的口粮分配水平和现金分配水平是不平衡的。在口粮分配方面：每个社员平均每月在三十斤以下的还有一个队，三十斤到三十九斤的有十六个队，四十斤到四十九斤的有十一个队，五十斤以上的一个队；其中最高的为六十斤，最低的为二十七斤。在现金分配方面：每个社员全年收入五十元以上的有十五个队，五十元以下的有十四个队；其中最高的为七十二元，最低的为三十五元。

从国家的税收、生产队的积累和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来看，其比例如下（以总收入金额为一百）：

（一）生产成本及管理费用占33.6%

（二）上缴国家税收占6.0%

（三）生产队扣除占4.3%（其中公积金3.1%，公益金1.2%）

（四）社员个人收入占56.1%（包括大队干部的报酬在内）

以上是曲岡大队一九六五年分配的概况。总的说来，是粮食有所增产，但社员的口粮和个人收入水平比较低，生产队的积累很少。因此，如何做到在粮食逐步增产的同时，增加生产队的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就成为这个大队能否进一步调动群众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能否进一步巩

固和壮大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曾对这个大队中比较落后的曲岡片的十个生产队作过初步的调查。这十个生产队一九六五年每个社员年收入平均为四十四元，比去年增加了六元。其中超过五十元的只有一个队，四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七个队，四十元以下的两个队。分配水平低的原因，看来主要有几方面：

一、基层领导干部政治挂帅不够。表现在大队党支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斗争问题认识模糊，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没有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中，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组成农村的革命队伍，开展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使社员的收入较快地增加。《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做五亿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引导农民学会用毛主席的思想去改造思想，去提高觉悟。农村党组织应该把领导农民大学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①我所在的大队的实践经验也证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不管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不仅能够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能够学了就用。这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具有最高的信仰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后，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革命的志气就高了。他们是最真诚地把毛主席的

① 《引导广大农民大学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1966年1月25日社论。

話作为一切工作、行动的最高指示，农民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立即能轉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我們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广大农民，我們就能够进一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經濟，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陣地。”①

二、这十个生产队基本上都是单一生产，除粮食作物之外，去年沒有搞什么多种經營，因此副业的收入很少，副业收入在农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很低，十个生产队平均計算，去年副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其中平均每人每年分配不够四十元的茂合生产队和下金生产队，副业收入就很少，前者为一百四十四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五；后者为一百一十二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还有几个分配水平較低的队，全年副业收入都不足一千元。副业收入太少了，农业总收入和社員的分配水平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从这十个队的經驗說明：只有粮食的增产，还不可能使社員的收入較多較快地增加。必須坚决貫徹“以粮为綱，多种經營，全面发展”的方針，才能使生产队大幅度地增加收入，从而又多、又快地提高社員个人的分配水平。由于我們进村后，对这个問題思想上沒有足够的重視，对这方面抓得迟了一点。事实告訴我們，只要及时抓一抓，就可以改变局面。例如社員个人分配水平較高的怡龙生产队，本来种的竹子不少，过去一向有生产竹制品的习惯和技术，但是这几年来都是由社員私人用来搞家庭副业，沒有組織集体生产。这次在秋收一个多月前抓了一下，組織了集体的

副业組，生产了一批籬底竹筴，只有十多天的時間，就增加收入三百多元，而且几乎不用什么成本支出。因而这个队的分配水平就达到了五十五元。各生产队經過秋收分配的总结，社員們进一步認識了发展多种經營对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重要意义和对个人收入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发展多种經營的积极性。单就开山一項來說，在公社的統一规划下，今年全大队計劃种五百亩檸檬桉，另外間种山毛豆，估計几年后，每亩可得純收入一百元到一百二十元，全年收入可达五万元到六万元，全大队一千二百人計算，每人平均收入就达四十至五十元。这样，要达到每个社員个人年收入一百元的指标是有可能的。

三、沒有認真貫徹勤儉節約的方針，以致农业、副业生产成本支出过高，也是造成分配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从这十个生产队来看，今年农业、副业成本支出平均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五，其中农业成本支出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点七，副业成本支出占副业收入的三十八点五。从各別的具体情况来看，有些生产队的成本支出更高。例如其中的七联生产队，今年农业收入为七千零八十八元，副业收入为二千一百九十八元，总收入共九千二百八十六元。在十个生产队中，不論农业收入和副业收入都占第一位。参加分配人口也差不多，但分配水平却只有四十一元。主要原因就是成本支出高：农业成本支出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七，副业成本支出占副业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点三二。而相反，分配水平最高的怡龙生产

① 《引导广大农民学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1966年1月25日社論。

队，农业成本支出只占百分之二十七，副业成本支出只占百分之九点七。成本支出大的原因，根据这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社员议论的总结，认为大致是：（一）依赖商品肥，牲畜肥流失很大，有些社员个人每年拾来卖给国营农场的牛粪就达一万斤以上；（二）农具保管不善，年年损坏、遗失，年年购置，一个生产队，每年都要购置三十多担竹籬，十多担秧盆，犁耙损坏率也大；（三）有些生产队，连苗种也要到市集上去购买，而不是有计划地自己培养，甚至连番薯苗种也要到外面买来种植；（四）没有订立各项开支制度，有些生产队，到市集上去买卖东西，户户都有人参与，随便开支补助费用。

四、经营管理和劳动力组织不够妥善，也是分配水平低的一个原因。有一些生产队，种下去的作物，没有很好管理。例如，有些生产队种下去的甘蔗，没有管理施肥，每亩产量只有二、三千斤；有些生产队养了塘鱼，由于没有专人管理，收获率很低；如此等等，就大大影响了生产队的收入。其次劳动力组织不够完善，大大影响了劳动生产率。各个生产队大致估算了一下，认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浪费了。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劳动分工，没有根据各个工种定额定分，只按劳动时间记工分。例如在我们初进村时，正是中耕耘田时候，全队出勤社员都挤在同一块田里，耘田的进度很慢，又抽不出劳动力去积肥。问社员，为什么不分一些人到第二块田去做？社员说：田有好坏，有远近，谁也不愿吃亏，只好大家都一起做。针对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中耕时，我们和社员商谈，采取了划分地段，根据田的远近、好

坏，定额定分，将劳动力分成若干小组，分工包干的制度。这样，社员就出勤早，收工迟，耘田进度就提高了将近一倍。在秋收抢割时也是这样，这里过去收稻谷，没有合理组织劳动力，只是按工种按天记工分，全队人挤在一块田里。平均每只禾桶，一天只能打谷七百至八百斤。今年秋收时，采取了按禾桶分组（每组七、八人），根据田的好坏、远近，按打的谷多少记工分的制度，每只禾桶每天就打到谷一千二百斤到一千五百斤，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生产队，不管自然条件如何，只要政治挂帅，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降低生产成本，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合理安排、使用劳动力，精打细算、勤俭办队，就能够有可能实现增产增收增分配。

上面谈的只是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分配领域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在这个领域中还有许多课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例如，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分配工作如何贯彻阶级路线问题，如何制定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三级所有制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也不够，还谈不上有什么体会，但我相信只要我们走出课堂，走出书房，经常到群众中去，到现实斗争中去，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就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所了解，有所发现，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也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

张 庆

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我感到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交给农民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哲学工作者重视的课题。这是我们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也是革命和建设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应当打起背包，到农民群众中去，到革命实践中去，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交给农民群众，并从中锻炼改造自己。

实践告诉了我，农村真是随处都有活的辩证法。就以我工作的生产队来说，有一次，队里正在给禾苗施化肥，突然来了一阵雷雨，当时我想，这一下化肥可白施了，心里很急，就去请教老农，他们回答说：“田里水少，下点雨正好，化肥保证跑不掉！”我想，这不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活的辩证法吗？的确，在农村的社员和基层干部当中，有不少是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同志，他们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有许多自发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但是，怎样使他们从这种自发的唯物辩证法上升到自觉的唯物辩证法？除了广大农民群众本身积极学习毛泽东思想之外，也需要我们哲学工作者帮助他们总结提高，使他们自觉地“骑在客观规律的马上”。

过去，我自己虽然也曾学过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道理。但是，那种

理解仅仅是空洞的、抽象的。从过去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容来说，都是出校门，进校门，整天和“本本”打交道，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实践锻炼。说到哲学知识，不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就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在讲哲学和写哲学的时候，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生味十分重，空洞的东西十分多，讲来讲去，就是表达不出象工农群众那种真挚的感情，写来写去，就是写不出象工农兵那样好的文章。试问，哲学工作者不去克服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落后状态，怎能改造客观世界呢？

看看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则和我们大不一样，他们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以我工作过的生产队来说，仅仅经过了八、九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干部队伍和广大社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从而改变了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这是在农民群众中所引起的一次伟大的思想变革，也是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的例证。这个事实，使我进一步联想到：五亿农民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主体，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我们哲学工作者，如能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革命和建设，那么，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是无可估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从书

畜、課堂里解放出來，並為廣大工农兵群眾所掌握，才能最大限度地最有成效地去改造客觀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工作者幫助農民學哲學是有深遠的革命意義的。

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幫助農民群眾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是一件革命的工作，這就要求我們要突出政治，以毛澤東思想掛帥，堅持興無滅資的鬥爭，並且長期地深入地參加農村三大革命實踐，虛心向貧下中農學習，自覺地接受實踐的鍛煉。

向農民學習什麼？我覺得主要的是學習他們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鮮明的階級感情和艱苦樸素的優良品質。在我所接觸的貧下中農中間，他們絕大多數人是聽黨的話，熱愛毛主席，愛憎分明，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當着上級黨委號召社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候，我們生產隊里的貧下中農核心小組成員都渴望能夠迅速買到《毛澤東著作選讀》，當地不能買到，就派幾個青年到附近的墟鎮去買，甚至騎單車跑到幾十公里以外的廣州去買。等到買回來之後，他們高興得了不得，什麼勞苦疲累都忘記得乾乾淨淨。在他們看來，買到毛主席著作就是人生的最大幸事。還有，當着上級安排這個生產隊首次種綠肥的時候，開始時我思想上有點擔憂，打算回去一般貫徹一下，試探而行之。誰知在貧農小組一討論，一對比，辦法和計劃就想出來了。為此，我才鬆了一口氣，更重要的是使我看到貧下中農那種忠於黨、熱愛毛主席、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感情和決心。而這些東西，是書齋和課堂中所不能見到的。我們只有善於向實踐、向農

民學習，才能夠確立起和農民相共鳴的階級感情，才能和貧下中農有共同的語言。這是我們幫助農民學哲學的首要條件。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當群眾的先生，首先要當群眾的學生。我們要把毛主席的哲學思想交給農民，除了要根本改變世界觀和階級感情之外，還要深入地了解農民的具體需要，運用他們的語言，用當地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生動具體地幫助他們學習。學的時候，要十分虛心，老老實實地拜農民為師，踏踏實實地向他們請教。否則，農民是不收你當學生，不叫你做同志的。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樹立群眾觀點，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

理論聯繫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幫助農民學哲學，同樣要注意聯繫實際。農民學哲學，是為了用，為了解決三大革命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只有聯繫了實際，農民才能學懂，才能嘗到學哲學的甜頭。而理論脫離實際，卻正是我們的基本弱點。比如種綠肥吧，我們只能照上級的指示，一般地講講綠肥如何重要，講了半天，總是說不到點子上。而農村基層幹部三言兩語，運用當地的實際事例，通過好壞事例的對比就把問題解決了。關鍵在於他們了解實際，善於抓群眾的活思想。實踐證明，脫離了實際，就會把活的理論變成死的東西。

抓農民群眾的活思想，有的放矢，這是貫徹理論聯繫實際原則首要的一步。要抓到活思想，除了調查研究，最重要的還是長期地深入地參加農村三大革命實踐，和群眾一起鬥爭。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解決革命實踐中提出來的一切問題的鑰匙，用那一把鑰匙，這要看

鎖的性質。群眾思想上有什麼樣的鎖呢？只有亲身參加他們的實踐才能摸到。話不在多，在精。鑰匙不在多，在對得上號。

干事情要依靠積極分子，要抓典型。幫助農民學哲學也要這樣。種田有樣板田，幫助農民學哲學也要有樣板。事實證明，樣板的威力是很大的。我工作過的大隊，有一個生產隊的保管，一條腿殘廢了，靠持拐杖走路。但他學毛主席著作非常積極。學了《為人民服務》之後，他認識到當保管就是為人民服務，努力克服困難，把生產隊的管理工作搞得井井有條，農忙時主動送工具，收割時主動看谷場，受到貧下中農的表揚。我們利用這個事例，向廣大貧下中農作宣傳，對全大隊學習毛主席著作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我覺得，特別要注意在黨團員中，在农村基層幹部中培養積極分子。他們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农村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帶頭人，他們的情況如何，對於农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有重大影響。他們是黨關於农村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人，政策的威力能否充分發揮，他們起很大的作用。他們是农村三大革命實踐的直接領導者，能否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斷發展農業生產，與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有很大關係。他們的 worldview、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如何，影響着農民革命積極性的發揮。在實際工作中，他們也迫切要求掌握唯物辯證法。

農民群眾生產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文化水平較低。我們應根據這些特點去開展工作。幫助他們學哲學要講求實效，做到少而精。要密切結合當時當地生產上、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問題，用什麼，學什麼，邊學邊議，學用結合。先要求懂，懂字當先，用字第一，只有懂了，才能用。形式要靈活，多樣化，要根據不同對象，採取不同的方法。可以組織學習小組，也可以結合各種會議學有關的思想。可以集中起來學，也可以在田頭學，或送上門去學。特別是文盲或半文盲，還可以把掃盲和學習哲學結合起來，一舉兩得。有人以為，學文化，就得從看圖識字做起，先學“人、口、手、刀”之類，再學字義比較抽象的詞匯，否則就是違反了學文化的規律。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由於學習文化結合解決問題，學了馬上就用，加以毛主席的話，農民最愛聽，認字反而來得快。許多毛主席著作學習積極分子，由於他們迫切需要掌握毛澤東思想，迫切要求掃除學習時文字上的困難，學文化的勁頭很大，文化水平因之也提高得很快。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幫助農民學哲學也要走群眾路線，不能演雙簧，更不能唱獨角戲。講什麼，怎麼講，要和當地群眾商量。做了以後，效果如何，怎樣改進，也要和群眾一道總結。只要走群眾路線，聽貧下中農的話，什麼困難都可以克服。

学术研究

一九六六年第二期（总第二十六期）三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 0.35 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